

# 炎黄春秋

第 **4** 期  
2010年

**李锐：向周有光老人学习**

**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

## 目 录

### 亲历记

- 8 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尹曙生  
12 我亲历的批判心理学运动……………任仁眉  
15 在耿飚领导的中央宣传口的日子……………江春泽

### 一家言

- 19 向周有光老人学习……………李 锐  
21 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萧功秦

### 求实篇

- 28 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何 伟  
34 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孙 康  
38 从三个联合公报看美台军售……………朱 良  
41 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张殿清

### 三人谈

- 43 网络问政三人谈……………智效民 丁东 毕星星

### 沉思录

- 46 追寻思想的光明……………张宏遵

### 春秋笔

- 48 “高沟事件”始末……………王永华  
52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杜奎昌  
58 羁居越南的三万国民党军……………毛德传  
61 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薛开震

### 怀人篇

- 64 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铁 流  
69 文革中彭德怀二三事……………陈幼松

### 往事录

- 70 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黄 铭  
75 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孙建人 王祖远  
80 清末“永平秋操”……………高智勇

### 海外事

- 82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金 津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 [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6.90元

#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 郭道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1980 年 3 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 20 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 1980 年 10 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 40 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 198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 1000 人,地方、省军级干部 3000 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 256 人,国家机关有 446 人,军队有 373 人,共分成 35 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 16 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 5600 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 1548 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 30 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

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 一、对文革前 17 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 17 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 年,反右一下子整了 55 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 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 17 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弩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 2 组第 1 期简报,简写“中直 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

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

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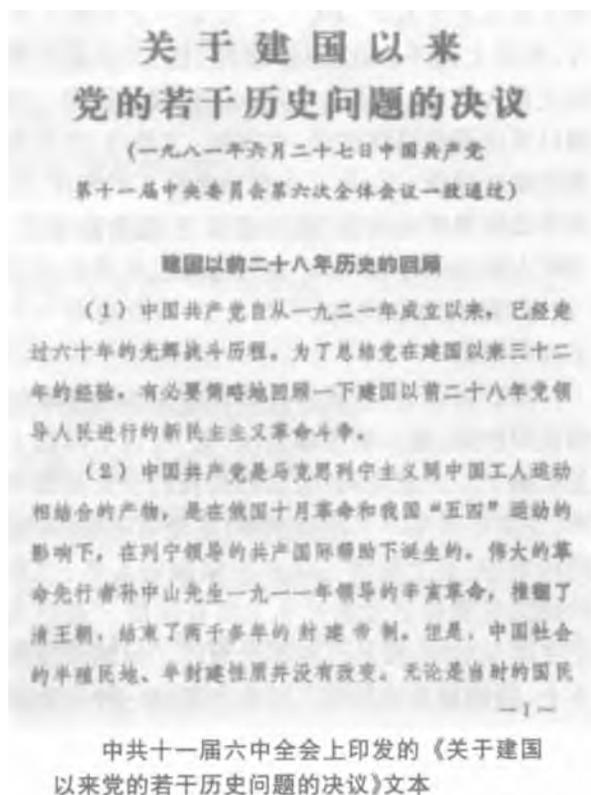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称为“国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 熟悉农民和地主 ,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

3. 熟悉农业 ,不熟悉工业 ;

4. 不懂政治经济学 ,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 ,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5. 不研究经济规律 ,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

6.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 ,主张“外行领导内行” ,批“臭老九” ;

7. 搞农民平均主义 ,1958 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

8.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 ,大批国际修正主义 ,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

9. 1964 年提出四个现代化 ,1966 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

10. 钻进线装书 ,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 ,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 ,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强调“矫枉必须过正” ,“有土皆豪 ,无绅不劣” ,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 ,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 ,否定合二而一 ,攻其一点 ,不计其余 ;“左”比右好 ,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 ,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 ,值得深思。(中直 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 ,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 28 年 ,打倒了国民党 ,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跟着他干了 27 年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 ,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 ,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 ,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 ,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 ,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

1.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 ,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

的历史现象 ,不能只是正确思想 ,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 ,是绝对正确的 ,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 ,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 ,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 ;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 ,导致迷信 ,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 :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 ,就都是正确的 ;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 ,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 ,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 ,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 ,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 ,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 ,也不合情理 ,这等于说 :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 ;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

6.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 ,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 ,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 ,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 ,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

###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 ,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 ,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 ,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 ,则殊多非议 ,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 ,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颀伯同志说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 ,而是以整人开始 ,以整人告终 ,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 1956 年 11 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 ,周总理讲话 ,肯定近年工作冒了 ;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颀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

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

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不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

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

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

---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 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 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 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 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 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 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 尹曙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了200多万犯罪嫌疑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70多万,判管制、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30多万,判有期、无期徒刑的120多万,还有30多万,罪行轻微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7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很难判刑。如在肃反高潮中,肃出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涉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他人多数进了看守所、拘留所,长期关押不放。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不能判刑、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的人,成了一个难题。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就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内部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在中国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大张旗

鼓地办起来了。

“指示”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在内部肃反中肃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能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什么是反革命分子?什么是坏分子?中共中央十人小组(中央成立的专门领导肃反运动的组织。10个人是:陆定一、罗瑞卿、刘澜涛、周扬、肖华、钱瑛、梁国斌、高克林、李楚离、杨奇清。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办事机构设在公安部),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把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托匪分子、汉奸、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界定为反革命分子。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坏分子的罪名。它界定的坏分子罪名除“叛变投敌分子”比较好理解外,其它三项很难界定、很难掌握(在刑法条文中没有坏分子罪),为以后政治运动中随便给人戴上坏分子帽子,提供了政策依据。

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为什么要加上“其他”这个限制词?上述“暂行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原来如此。所谓“其他坏分子”,就是指除反革命分子这个坏分子以外的那四种人。难怪中国老百姓把那些进了看守所、拘留所的人统统称为“坏蛋”,还是有根据的。

内部肃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比,肃出来的反革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只是历史上有些“污点”而已,不能逮捕判刑,只能送去劳动教养。到了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又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

考的问题。经过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提议,报经毛泽东批准,劳动教养成了处置右派的主要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内部红头文件规定的,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由中共中央授意,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为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办劳教开了绿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一、对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这四条规定的劳教对象的范围太宽、太广,可以把任何一个有点缺点、错误的人送去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改造。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有多少人被劳动教养?大约是45至5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被判刑劳改的是少数,继续留单位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被送去劳动教养。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相当多数”是多少?以安徽省为例,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反右派运动中,安徽省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987人外,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劳动教养。因为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被劳动教养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多少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和批准劳动教养的人员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劳改犯人、劳教人员被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3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5万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劳教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没有规定劳教人员的劳教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才规定劳教期限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劳教人员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对这么多劳教人员总得有个处理办法,于是每年由中央下达对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使劳教人员有个盼头,不至于绝望、走绝路。但是中央每年下达的解除劳教比例很小,下面又不认真执行,被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很少。1959年,中央给全国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所以很多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的人,20多年后才随着所谓“纠正”错戴右派分子帽子才被解除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3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数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被“改正”的那一天。

在送往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000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000多人中,有1000多是女劳教人员。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位女劳教幸存者的情况,并以此纪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残酷迫害致死30周年的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

1971年8月13日,笔者在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秘书组接待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自称是王昭的侄女,是来领王昭骨灰的。我很诧异。王昭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2月12日被残酷迫害致死。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严格保密,不对外宣布,遗体火化时对殡仪馆谎称是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向中央报告说王昭是因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除了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少数领导知道真实情况外,别人是不知道的。笔者在军管会秘书组当秘书,对王昭被迫害致死情况一清二楚,也知道王昭根本没有家居江南的一位侄女。几经盘问,她终于说出事实真相。而我对她说的她的不幸遭遇也就一清二楚。是王昭救她于水火之中,使她幸存下来。她来领王昭骨灰,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恕我不能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和确切住址(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子女都很出众),就叫她张秀吧。1956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员。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公社管文教的副主任。她不喜欢这位副主任。而副主任则穷追不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希望他今后不要再纠缠她。这位副主任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以检查教学为名,到学校检查学生作业。在检查一位六年级学生的作文时,看到这位同学在参观公社丰产田写的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公社粮食大丰收,收那么

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呢?”张秀作为语文老师,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吹牛皮的话,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粮食多,而是少,不然为什么要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呢?这位公社副主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说张秀思想反动,竟敢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话,煽动学生反对“大跃进”。张秀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学生在作文上写的那句话,是从《人民日报》上学来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该县秋收要收11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秋收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这位学生看了报纸报道,把毛泽东说的最后这句话,改动一下,变成自己的问话。而张秀老师就没有看过这篇报道,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否则她也不敢在这句话后面打问号,在课堂上说那样的话。这位公社副主任将张秀打成右派坏分子,以不适合做人民教师为由,决定送她劳动教养(在“大跃进”运动中,劳动教养遍地开花,机关、工厂、公社、生产大队都可以自办劳动教养。经过正规手续批准的劳教人员近百万,没经过批准的有几百万)。她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劳动教养。由于她长得漂亮,先后被几个品质恶劣的管教干部强行奸污。为此她两次自杀未遂。1961年,王昭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大刀阔斧地纠正原青海省委的左倾路线错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整顿政法部门,撤换公、检、法部门不称职和违法乱纪的领导,并派工作组到劳改、劳教单位进行内部整风。工作组将张秀被几名管教干部强行奸污的情况发了简报,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管教干部要处理,张秀也要处理,说她和管教干部发生性行为,是拉拢腐蚀干部的流氓行为。王昭不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在政法干部大会上说:“要处分就只能处分那些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管教干部,而不能处分她。因为她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她不干行吗?她为什么几次自杀?还不是忍受不了折磨?!”

王昭说的话,救了她的命。不久她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江南老家,1962年,经过申诉,纠正

了给她戴右派分子帽子的错误。她重新当上小学教师。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昭首当其冲。那些过去被王昭整肃、受到过处理的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把他到青海纠正左倾路线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为牛鬼蛇神张魂,向反对王昭的群众组织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王昭被残酷批斗,非法拘禁,摔断了胳膊。他的警卫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一个夜晚,乘看押他的造反派熟睡之机,将他救出来,秘密送到洛阳治病。就在他治病期间,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不断掀起武斗。为了控制《青海日报》,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这时,军队也分成两派,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夺了司令刘贤权的权,控制了驻军部队,下令驻守在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撤出报社。“八一八”造反派不干,1967年2月23日军队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几天内逮捕近万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青海省“二·二三事件”。196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是,同时也颠倒黑白地把王昭定为幕后黑手。王昭不服,不听好心人劝阻,执意从洛阳到北京申诉,结果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在接见青海“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

头时,要他们在保证王昭人身安全条件下,准许将他押回青海。不久经中央批准被逮捕。张秀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知道王昭被捕,以后又打听到被迫害致死。为了感恩,她要领走王昭骨灰加以保存,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万万不能的。我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你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这件事,否则后果很严重,你赶快回去!她接受了我的劝告,泪眼婆娑地离开军管会。

“四人帮”垮台后,王昭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其家属从殡仪馆苦苦寻求,才找到骨灰。骨灰运到北京时,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并送到八宝山公墓一室安葬。

“劳动教养”这一行政法规已经存在50多年。在法学界、理论界对这一法规的合法性一直质疑不断。尽管现在的劳动教养比较规范,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同1954年颁布并作过4次较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相抵触。我坚信,随着我们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总有一天违反宪法的劳动教养制度一定会寿终正寝。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好生活

#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30029号

# 我亲历的批判心理学运动

● 任仁眉

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是从北京师范大学发起的,那是1958年的夏天。开始我们单位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到北师大去开批判会,会议在大礼堂开,可能是全市性的,规模不小,参加的人很多;会议气氛凝重而严肃,在批判发言的过程中,时常有人领着喊口号,此起彼伏的,以增加批判的效果;大家的心情紧张而忐忑,好像心理学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或不法资本家,有同仇敌忾批倒批臭的气概。批判大会过后,回到单位又开各种层次的批判会,有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开的批判会,也有老师和同学们各自开的批判会等等,总之,那个暑假的生活内容,全部是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等到这年秋季开学,我们单位全体老师和同学,就到农村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非党员教师,对发起这次运动的政治背景不清楚,更不了解有那些隐秘的玄机,但我估计在这次批判心理学的运动中,想要批判的基本要点,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一定是有指导的,否则还怎么开批判会。而我所知道的情形,只是在我所参加的各种批判会中公开发言的内容。当时批判心理学的根据就是阶级分析理论,所有发言都是围绕着阶级分析这个观点。批判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人类是否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心理学认为,人类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从大自然中发生发展演化的结果,从低等动物开始,经过亿万艰辛地与生存环境的搏斗,造就人类成为自然界中最具智慧的生物,这些智慧体现在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中。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情感和意志等各种心理过程的一般规律。例如,心理学研究人(包括动物)是如何感知客观世界的,记忆过程有哪些步骤,以及思维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等等认知方面的问题。批

判者则认为,人类没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人都是以阶级划分的,只有阶级的人,没有抽象的人;再者,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可能只有单独的心理过程存在,而必须与心理内容相结合才行,因此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打上了阶级烙印;心理学只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共同规律,不研究与之相应的心理活动的内容,这就是宣扬抽象的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理论。其二,人类心理活动是否有生物学基础。心理学认为,心理是脑的机能,大脑的活动直接影响心理的活动,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受到生物的和生理的规律制约的,因此研究脑和心理的关系,是心理学义不容辞的方向。批判者却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人是阶级的人,人的心理活动只能受社会的阶级地位制约,不能受生物规律制约;宣扬心理是脑的机能的观点,就是心理学中的生物化倾向,违背阶级分析观点。总之,以阶级分析理论为纲,批判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和生物化倾向是这次批判运动的核心内容。

在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认为,要把阶级分析理论贯彻到心理的全部过程中是有困难的,难以理解;如果让低级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注意和记忆等不受阶级性制约,有共同规律,只让高级的心理过程如思维、情感和意志等,受阶级性的制约,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是当时在接受批判以后的群众中,比较普遍的退一步想法。如果按照这个想法定调,那末,心理学还是有一半可以保留的,至少教科书上关于低级心理过程的那些部分还是正确的科学的。然而,当时的批判指导者,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他们是想把心理学彻底批倒批臭,扫地出门的,因此上面提到的看法遭到了迎头痛击。有人在批判会上高声说道,阶级分析的理论,对心理活动是贯彻始终的,不

分什么低级或高级,高级心理过程受阶级性制约,低级心理过程也一样,感觉过程也是受阶级性制约的嘛。例如,资产阶级闻着香水是香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很美,而无产阶级则闻着香水是臭的,因为他们觉得抹香水很丑恶;资产阶级闻着大粪是臭的,因为他们觉得很脏,而无产阶级闻着大粪是香的,因为大粪可以肥田,这就是阶级不同的人,感觉就不同嘛;心理活动怎么会只有过程,没有内容呢,把内容一说,阶级性就很明显了嘛;心理学只研究过程不谈内容,是极其错误的,就是想要宣扬抽象的人,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经过这番劈头盖脸,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批判,不同的看法只好销声匿迹。我们知道,感觉过程是心理活动最初级的过程,就是人们的视听嗅味触,这些都被率领在阶级分析理论的麾下,心理学就毫无藏身之处了。

另外,在批判心理学生物化倾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想法。有人认为,如果说心理活动都受制于社会性和阶级性,与生理机制和大脑活动无关,那么,在神经科病房中,那些由于神经系统受到损伤,而丧失相应的心理机能的病人,如何解释呢?批判者说,很好解释,这些病人不是因为大脑受损伤而丧失相应的心理机能,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不正确,所以才丧失心理机能,麦贤德(当时报纸上宣传的战斗英雄)就是例子。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当他与敌人战斗时,他的大脑被严重损伤后,心理机能并没有丧失,而是能继续指挥战斗,不下火线。拿出战斗英雄的事例作为批判的依据,是很有效的招术,因为当时谁也不敢拿战斗英雄说事,从此,心理是脑的机能这个定义,也没人敢再提了。

要批判心理学的生物化倾向,巴甫洛夫学说是一定要涉及的。因为院系调整后,巴甫洛夫学说是作为心理学唯一的自然科学基础,如果它不被批倒批臭的话,心理学的批判就会是不彻底的。在批判巴甫洛夫学说的发言中,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把巴甫洛夫学说与当时正在社会上批判的,经济挂帅和物质刺激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巴甫洛夫是用狗做的经典实验,在建立条件反射过程中,必须要用强化物进行的,强化物常常是一块肉。有人就义正词严的说道:巴甫洛夫

建立条件反射时,必须要有强化物,要给肉吃,不给就不能建立条件反射,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宣扬经济挂帅,物质刺激吗?这不是宣扬修正主义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服从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需要这一套,不需要经济挂帅物质刺激嘛。此言一出,举坐皆惊,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批判,说明发言者的挖空心思的深度,以及对批判的无限忠诚。话说到这个份上,已无商量的余地,巴甫洛夫学说只好甘拜下风,退出心理学的领域了。

在批判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有人觉得仅用嘴巴进行批判还是不够的,要把手和脚都参加进来。我们单位,有建立多年的巴甫洛夫实验室,有研究动物行为用的实验房,有仪器设备及饲养的动物。有人就把饲养的实验动物,装在笼子里,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贴上标语,打着锣鼓,在校园内游行,嘴里还不断地高喊着,看哪!这些畜生,每天吃香蕉,吃苹果,吃牛肉,吃人民的血汗,剥削人民,这就是心理学的方向,这就是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当当!通过这次动物游行以后,饲养的动物纷纷被处理,实验室被拆卸关闭,有关生物和动物方面的研究也随着叫喊声和锣鼓声下台了。

这场所谓的“学术”批判,是由反右运动后的政治形势,加上有些人中了极左思潮的毒,跟风随大流上演的一场政治闹剧罢了。如果当时没有政治背景的支撑,而又有自由辩论的气氛,批判会一次都不可能开完,发言者就会被轰下台。批判会的发言内容,用不着专业人士进行反驳,一般老百姓也能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因为这些言论连常识都不顾了。老百姓绝对不会认同资产阶级闻着香水是香的,而无产阶级闻着大粪是香的论点,他们也一定不会相信只要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定,大脑损伤后,就不会出现心理方面问题的说法。从理论上讲,想用阶级分析理论来替代或排斥心理学是反科学的,会走向极其荒谬的地步。心理学是研究心理活动一般规律的学科,心理学认定人类心理活动是有共同规律的,不同阶级或不同国籍的每一个正常人,都继承着祖先遗传下来的各种共同心理特性,他们是由生物的、生理的以及社会的活动规律制约的。试问,如果

不同阶级的人,就有不同的心理规律,那末,不同阶级之间还有可能交往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批判还能听得懂吗?中国工人阶级制造的商品,外国资本家还能购买吗?还能开展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吗?不可能。人类正是因为有共同的心理特性,有共同的需求,才有可能进行交流,开展竞争,互相批判和争斗;正是有共同的规律和共同的需求,才可以互相协商、妥协、和解以达到和谐和双赢。这些现象不正在我们的身边进行着吗。人类出生以后,都处于各自的阶级地位中,这是后天的生存条件,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可以变化的,并不一定是终身一贯的,它们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但是,精神领域是广阔多样而内容极其丰富的,在精神领域的一些方面,进行阶级分析,是可以的,但绝不是精神领域内的所有方面都应该被纳入阶级分析的旗下,尤其是各种心理过程,无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因为它们是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形成的规律,已经牢牢地刻印在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之中。换句话说,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对香水和大粪的态度如何,闻着香水都是香的,闻着大粪都是臭的,因为根深蒂固的感觉过程规律,不会由于后天的,不一定稳固的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受到影响的。

批判者之所以出现如此低级的常识性谬论,还有一个错误的结,就是把形式和内容混为一谈,把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揉在一起,难解难分。他们说,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各种心理过程和心理学把每一种心理过程分离出来研究,就是要研究抽象的人,反对阶级分析。这句话的前半部还算正确,但是整句话就不正确了。其实,发生心理活动时,不仅有心理过程和心理学内容存在,还有神经电生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流体力学等等过程相伴随,这些过程虽然都是同时发生的,又都可以一样一样地分析出来进行研究,心理过程也是一样。分析和综合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每一个事物或事件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如果不进行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呢。心理学并不完全排斥阶级分析,后天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生存的文化氛围和自然条件

等,都可以对心理活动产生影响,这些也是人类的共同规律。

批判虽然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危害却是长久的,使心理学停滞和倒退20年,使心理学工作者浪费20年的时光,代价是巨大的。1958年夏的批判运动结束后,秋天开学时就让全体老师和同学,甚至1958年刚入学的新同学,都到农村或工厂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为期一年。回校后社会上开展了对巴人人性论的批判活动,这对心理学来说是在劫难逃的,差不多又进行了半年多光景。到了60年代初,可能是上面的观点或者政策有所变化,心理专业的日子好过了一点,不让开课的人,如右派分子也让开课了;不让开的课程,如动物心理学也让开了;过去每年只招10名学生,这两年也增加了招生名额,好像是心理学又有了用处。但是好景不长,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一切又回到1958年,右派分子不能开课了,动物心理学停开,教师们抽调参加四清运动,大大地削弱了教学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没有多久,哲学系的工宣队领导就宣布撤销心理专业,从此心理学被赶出校门,全体教师和留校学生参加运动,参加劳动。在这期间,多位老教师受到皮鞭抽打的侮辱,甚至勒令一位老教授,刮掉脸上的胡子,举着牌子,一个人在湖边游行,遭到围观殴打,致使这位老教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另外,在各种批判会中,心理专业也是被批倒批臭的靶子,最爱提的就是,心理专业17年培养的学生有2/3都是“废品”,并有黑名单一张,指名道姓,谁谁是“废品”等等。其实,所谓“废品”就是这些年留校的以及分配到全国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他们都是教心理学的老师。从这张名单可以看到,当时学心理学的和教心理学的人,是被人无端指责的对象,这些人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在干校劳动时,有人在小组讨论会上不知轻重地说,心理学的规律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楚直白,难道还要批判吗?此话一出口,就受到大范围的围攻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新动向。批判中,有人声色俱厉地说,要用铁扫帚钢扫帚把心理学扫到垃圾堆中去,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给社会也带来许多恶劣的影响。在文革中流行的“老子英雄儿

# 在耿飏领导的中央宣传口的日子

● 江春泽

1977年初某日,北京大学人事处通知我:“中共中央宣传口来函,借调你去工作。你明天上午9点钟去钓鱼台报到,有人在东门口等你,领你进去。”对于这个通知,我虽感到突然,但觉得,动乱结束了,党中央夺回了被“四人帮”把持的宣传阵地。在这个时候能有机会为党出力效劳,也是很荣幸的,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我按时到达钓鱼台东门口,果然有人在等候,领我入门,去钓鱼台内的17楼报到。在“文革”期间,17楼曾经是江青活动过的地方,现在是中央宣传口临时办公场所。按照指引,我先去办公室办了必要的人事手续,领了钓鱼台的出入证,看了分配给自己的一间办公兼卧室的房间。然后,被领到业务处处长办公室,听候分配具体工作任务。业务处长王揖原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中央宣传口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任务。他说:“由于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诬称为‘阎王殿’,被彻底

砸烂了。现在百废待兴,来不及恢复宣传部的正式机构。在粉碎‘四人帮’后第10天,中央决定由中联部部长耿飏兼职,牵头组织个临时班子,协助中央统管全国的宣传工作,这个机构就暂称为中共中央宣传口(部)。起先,是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后来迁到钓鱼台17楼。它具有临时性,机构是很精简的,全部人员只几十人,没设什么司局,只设办公室和业务处两个摊子。办公室负责文秘、人事和行政等工作;业务处负责理论、新闻宣传、文艺等方面拨乱反正的调研工作、组织起草和审查重要稿件、了解全国报刊动向等,定编20人,都是从部队和地方临时借调来的干部。”他告诉我,我被分配在业务处,主要是关注理论方面的调研工作。因为人少,分工不能太细,其他方面也要关心,每天都要浏览全国的报刊,协助领导发现和评论问题。

当时,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小组成员有:耿飏、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5人,由耿飏牵头。主

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就是全面贯彻阶级分析造成的谬论,他们用出生的阶级地位来判断一切,完全违背了科学的心理规律,造成了昨天还是革命干部的儿子,参加红卫兵,今天就变成为走资派的儿子,成了黑五类这种可笑的事件。在儿童教育领域中,也完全违背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不按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适当的教育,而是不管多大的孩子,一律用成人式的阶级教育,孩子们根本听不懂,完全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在有些精神病院,不承认心理是脑的机能,认为精神有病,就是思想有病,把精神病患者看成是生了政治思想病,不用适当的医疗手段,而是成天向患者宣传毛泽东思想,背毛主席语录等等,把病人折腾得不能睡觉,其医疗效果可想而知。

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过去50多年

了,文革结束后,当年那些批判的言论,不攻自破,再也没有人提起;当年充当批判炮手的人们,也很自然地回到了心理学的工作岗位,把过去那套被自己批倒批臭的理论,得心应手地用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现在把这段已经遗忘的历史翻出来,是希望像这样可哭可笑的事情不要重演,也希望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要真正地想明白再说再做,如有压力,就什么也别谈,什么也别做;不要人云亦云,言不由衷,跟风随大流。研究科学的人说话是要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当然,更不要居心不良,别有所图,否则那就成科学的罪人了。折腾一个学科,付出的代价是无可计量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及心理系1954—1994年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持日常工作的是朱穆之和王殊。

根据当时的文件规定，中央宣传口的任务是，协助中央掌管宣传工作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具体工作大致是：第一，了解和研究全国宣传工作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第二，了解和研究社会各阶层思想动向，向中央提出一个时期或某一重大事件的宣传意见、要点和计划，并检查实施情况；第三，协助中央组织审查中央报刊、通讯社、广播的重要社论、文章、报道、图片、电影与电视的新闻纪录片等；第四，了解和研究对外宣传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协助中央审查对外宣传的重要稿件、图片和新闻纪录片等；第五，了解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的内容，发现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并提出改进的建议；第六，协助中央向中宣口所联系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外文出版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机关传达中央指示、组织落实和检查执行情况；第七，协助中央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向中央提出的有关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此外，还执行中央临时交办的任务。围绕着以上任务，我们的经常性工作，一是评阅报刊，每天都要浏览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刊，从中发现宣传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二是对中央级报刊送审的社论、评论文章等协助领导进行初步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供宣传口领导参考；三是参与起草一些有关宣传工作的文件或参与筹备一些重要会议等等。

中央宣传口的工作制度规定，每周一上午开办公会议。除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外，所联系的中央单位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当时，经常来出席办公会议的有：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华楠（兼）、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王殊（兼）、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临时负责人林修德，以及国家出版局负责人等。通常，由耿飏主持办公会议，主要讨论一些重大的宣传工作问题。有时讨论某个特殊议题，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



耿飏(1909-2000)

长胡耀邦也来参加。胡耀邦在发言时，往往站起身来，离开座位来回走动，富有激情，手势很多，给人印象很深。为了便于工作，王揖和业务处的工作人员每次都要听会和做记录。所以，那个时期的办公会，我都在场。

当时，中宣口的内部学习制度是，全体工作人员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耿飏也经常参加。只要他到会了，大家都是听他发言。我记得，在学习会上，耿飏曾经很具体地描述过他参与粉碎“四人帮”行动的过程。

他说：10月6日中午1点钟，叶剑英给他打电话问：“交给你一个任务，怎么样？”耿答：“坚决完成。”叶帅说：“好，待命吧！”晚8时，耿飏由卫戍区一位武官陪同，带着华国锋的介绍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邓岗办公室。耿向邓岗出示介绍信说：“华主席派我们来协助你工作。”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姚文元去电话。”邓岗拿起电话筒，正想拨号，但立刻就放下了话筒，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看来，邓岗是个明白人，他立即醒悟过来，知道完全没有必要再给姚文元打什么电话了。确实，此时此刻，党中央已经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行动，姚文元已束手就擒了。耿飏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接收顺利，未遭遇任何反抗。耿说：“那好，你通知核心组成员立即来开会。”核心组成员被紧急召来以后，当晚就在会议室和衣而眠。当时，广播电台是最重要的媒体，是机要重地，把核心组成员集中控制起来，同时在技术上再采取些其他安全措施，媒体就不会大乱了。当晚10点钟，中央在玉泉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叶帅的建议：华国锋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数日后，华国锋指派耿飏负责中央宣传口。耿飏对华国锋说：“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打仗可以，搞宣传工作恐怕不能胜任。”华国锋说：“你主要管管大的方针政策，再找几个笔杆子协助你。”所以，就找来了朱穆之、王殊等协助他。就这样，搭起了临时的中央宣传口架子。

这段时期里，耿飏和宣传口的一般工作人员

是经常见面的。当时,他还同时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有时候,中央宣传口的干部也集中到中央联络部去,听耿部长传达文件或做报告。十届三中全会上,耿飚被选入了政治局,分管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工作,就不再兼管宣传工作了。中央全会后,他还来过一次钓鱼台,与宣传口的工作人员道别。但这次来,与以前来不同了,有一个连队的卫兵把17楼整个围住了。大概按照保卫制度,政治局委员就不那么“自由”了,一般工作人员也不可能与他一起学《毛选》了。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大人出山”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前奏。会前,我就隐约感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以及邓小平再次复出工作问题,上层似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后来,我听到机关党支部非正式地传达过一个文件,是邓小平与胡乔木的谈话,邓自己说,他即将重新恢复工作,而且还是“当大官”。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邓大人”再次出山了。对此,中央宣传口业务处的同志们群情振奋,欢腾雀跃。在党支部书记何凤岐(原中央联络部五局局长)的领导下,大家自发地买了啤酒、凉菜,在办公室叙谈庆祝。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顾十年动乱以来惊心动魄的历史,惋惜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被夭折,又庆幸小平同志能再次恢复领导职务,中国从此有希望了。大家热血沸腾,信心满怀,那天的欢庆会一直畅谈到深夜。

当时,凡是中央一级党报党刊的重要社论,或者重大事件的评论文章,一般是请人民日报社的大手笔来钓鱼台执笔。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朱穆之、王殊以及业务处领导王揖,要与他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每修改一遍即送红旗杂志社印刷厂排出清样,对清样再讨论、再修改、再排印。如此反复多遍,直到中央政治局审阅、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后才能发表。我记得,十届三中全会的社论,是请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住入钓鱼台来执笔的。先后修改了26稿,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夜向全国广播、次日中央一级党报发表,执笔人才得以“解脱”回家。

由于宣传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这种工作程序,在国内重大事件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发表时,我就不是把它当做新闻来阅读,而是要了解这篇社论

经反复讨论,最后是怎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定稿的,尤其是对一些有过争论的问题最后是怎样说的。我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也加深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这期间,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推动实际工作,于光远同志曾领导和组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举行了四五次关于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以及其它的专题讨论会。我参加了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曾将讨论情况和观点归纳整理为一篇内部报告,于1977年11月14日呈交中宣口领导。朱穆之在此报告上批示:“这是所见同类报告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并转其他领导阅。

除了评报,业务处的工作人员还要参与起草一些文件。我记得,王揖曾请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深记者王英秀来钓鱼台住了一段时间,主笔写一个《宣传工作十要十不要》的文件,并指定我参与。当时,写这个文件的背景是继续肃清“文革”时期新闻宣传假、大、空的遗毒。对外宣传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文革”中把国内一套“左”的观念强加于外国人,而且不加区别对待。针对存在的问题,王揖要求写出一个既破又立的文件。我记不清这个稿子有没有被通过和下发。在同王英秀共处的日子里,我还听她说了不少新闻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冷西如何受毛主席信任和重用,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流畅。“文革”前,吴冷西常常随毛主席外出巡视,一路上毛主席指点江山的谈话,吴冷西都记录下来。回报社值夜班时,他边写边送去排印,写一页送一页,不必再作修改,次日就见报。在当时报社人们的心目中,吴冷西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王英秀还说过,吴冷西如何赏识邓拓的才华,等等。

那段时期,钓鱼台17楼的电影厅里经常放电影,往往一次要放映两个片子。有些新片是外国片,就通知中央各宣传单位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来观看,使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改变原来的封闭状态,如《巴登将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放映这些影片的目的是,决定哪些影片可以公演,这也是中宣口业务处的工作内容之一。由于在十年动乱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打成“黑线”“毒草”,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和著名演员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非常优秀的影片被禁止上映了。人民群众的

精神生活单调枯燥,急需精神食粮,文艺界人士也急需昭雪伸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宣口对17年的电影片子一部一部地重新审视。每看完一个片子后,业务处工作人员要整理出该片的有关材料,包括:该片的原作者、改编者、主演者,剧情主题和中心思想,何时首映,“文革”前哪位中央领导人看过,有过什么评论和批示,文革期间在什么场合遭到批判,是批判剧作还是批判人,是批判作者、编者还是批判导演或主要演员,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把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再请有关当事人来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就这样,一部一部的片子先后获得了“解放”。我记得,当时有个21岁的打字员看了《洪湖赤卫队》、《刘三姐》、《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影片后,惊叹道:“哎呀!原来‘文革’前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呀!”因为她太年轻了,从懂事的时候起,除了八个样板戏就什么电影也没有看过了,现在才了解,建国前后,党在文艺战线的成绩也是辉煌的,而不是被“四人帮”妖魔化的“黑线”与“毒草”。

1977年12月,中央宣传口协助党中央在钓鱼台召集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党内外知名人士开座谈会,总计330人。这次座谈会是分界别举办的,在12月13—14日、21—23日、25—26日,共搞了3次座谈。与会者根据切身体验,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流毒,提出改进社会科学研究、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直接接触到不少德高望重、学艺高

超、誉满神州但在“文革”期间却受害深重的大名家,如胡乔木、于光远、钱锺书、周扬、齐燕铭、薛暮桥、陈翰笙、许涤新、孙冶方、严中平、尹达、刘大年、黎澍、王惠德、陈岱荪……领略了他们的风采,也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座谈会的记录都归档了,我个人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宣传工作的时效性,文稿修改的反复性、审批的严格性,工作人员加夜班是经常的。况且每天该阅读的文件资料量很大,可以说简直看不完,所以,工作人员平时一般都住宿在这里,周末才回家。我们不仅每天必须浏览全国各地的最新报刊,还需阅读大量内部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只供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阅读的《动态清样》,内容是新华社记者对24小时内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我每天从清晨阅读和工作到深夜。我感到,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不了解国内外全面真实的情况,怎么可能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呢?又怎么可能超前提出可供操作的决策建议呢?因此,我很珍惜这一工作条件,在繁忙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思考,努力充实和提高自己。我从一个封闭的学术环境转到主管全国宣传工作的首脑机关,能阅读到大量内部文件和广泛的国内外新闻,及时摸到国家大事的脉搏,了解世界发展的动向,真是茅塞顿开,大大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当代社科人文”系列丛书

(总第10辑)征稿启事(社科人文类)

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学术专著的社会化利用,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社科人文”系列丛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9辑,共计90余部图书。选题(丛书)新的一期图书正在组稿中,相关事宜如下:

一、书稿要求:条理清晰、论证有力,能够较好反映目前社会领域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具有时效性,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

二、征稿范围:书稿主要以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历史与年鉴等论著,以学术研究著作、学术论文集等为主。

三、其它事宜:1. 保证尊重作者著作权,签

订标准出版合同;2. 组稿、征稿长期有效,来稿来函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回复;3. 寄稿须知:书稿打印、复印、剪贴、抄写、磁盘均可,发电子邮件更佳,请注明联系人、地址、电话;4. 未尽事宜,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

投稿邮箱:北京市通州区杨庄南里长城国际B6单元705信箱(101121)

当代社科人文丛书编稿中心(收)

咨询热线:010-52995426 58438169

传 真:010-52995426

在线投稿:bookcb@163.com

联系人:林老师、江老师(编辑)

网 址:http://www.bookyswh.com

# 向周有光老人学习

● 李 锐



2009年9月28日,李锐(左)与周有光(右)见面时向周老赠书,周老抱拳表示感谢

去年8月,友人送来周有光前辈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信,我被这位104岁老人的精神所感动,马上遵嘱代转,并让友人表达我对周老的敬意。9月25日,不顾我的劝阻,周老在儿子周晓平(75岁的著名气象专家)和蒋彦永教授的陪同下,硬是坐轮椅来到我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受教非浅。

周老谈到早年去美国留学,主修经济,有幸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过接触。那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处于一个新高峰,站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时期大量人才流入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是偶然的。我很同意周老的看法。19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这个国家,建国二百年来,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一个统计资料可予说明,即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占70%(德国人占12%,犹太人占18%,中国大陆一个也没有)。这也可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靠科学知识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周老

说:“我在美国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什么都是自下而上,尊重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国去,人家都请我参加学术性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里面有许多美国的大官,他们也是学者。可是他们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我们中国刚好相反,大官坐在前面,教授坐在后面。”周老还谈到这样一件小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

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这也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更是凡事都要有领导,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英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词)。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闲谈中周老还谈到:“社会科学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本来研究中心都在欧洲,后来跑到美国去了。自然科学三百年前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科学是比较晚的。”周老还谈到,“由于几百年走改良道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法国和西班牙就差,拉丁美洲都不行。”

周老出版的著作有三十多种,有的已被译成外文。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真是令人敬佩不已。记得去年一月,在《炎黄春秋》的茶话会上,邵燕祥曾建议向周有光老人约稿。周老比我

长 11 岁,思维依然极其敏捷,他说他是 85 岁以后,才着重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这真是与时俱进了。他现在每天用电脑上网并写作(我却是一个电脑盲)。去年底,我收到周老寄来的《朝闻道集》,夹条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包括老人在语言、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真知卓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东西文化中的优劣长短。他不同意季羨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目前流行的所谓的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羨林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文化将取而代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周老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文章中,周老阐述了这一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周老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谈话中他认为:“现在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不是国家的,哪一个国家的。现在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后者是各个国家不一样的。我

们每个国家都在共同的现代文化当中生活,同时保留了本地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效的成分。所以现代人在双层次文化中生活,当代文化同古代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说不清楚了。趋同文化快得不得了,一个地方搞一个东西,其他地方都学习了。”周老谈到自己这样的经历:“我到医院去看病,等医生,等拿药,我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手里不拿手机的,手机跟人分不开了,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还有宽带(网),你不许人家发表文章,人家在网上发表,网上你可以控制,但现在有个新花样叫推特(我不懂这个名词,周晓平插话说:没有中文翻译,就是短的博客,传输信息的力量很大)。”周老接着说:“是一个微型博客。可以有一种好的印象和另外一种印象相互沟通,每个国家的透明性增加了。所以,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有很多人论证,中国 30 年之后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我插话:这是最好的估计。80 年代我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有 22 个研究所在研究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的 GDP 就会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一人均,中国还只能是下游,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周老在《全球化巡礼》一文后有一个附条:“从人均 GDP 看世界”,这个资料来源于 2001 年《世界地图集》。去年岁末,周老给我寄来一份最新的统计——世界各国人均 GDP,这份资料来源于 2010 年《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我比较了两个相距近十年的统计,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有光老人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学者。

# 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

● 萧功秦

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百年后的中国人又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对百年前的清末改革,自然比其他时代的人们怀有更大的好奇与兴趣。

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这两者都是属于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清末新政存在着以下转型中的基本矛盾:

首先,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执政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的幅度与加快改革的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执政者陷入权威危机,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其结果就进一步引起社会矛盾与人们的不满,处于这种情况下,清末执政者又会进一步饮鸩止渴地再次加大改革速度,其结果更无法驾驭改革,导致的整合危机更严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清末新政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作为同样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中国当下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与清末新政中类似的权威流失问题?

我的回答是,至少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

他生于1906年,1927年登上大学讲座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曾在上海参与“七君子”的救亡活动。1949年,他从美国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担任复旦大学经注学教授。1955年,被改行从事文学改革工作。周老一生学术贡献很多,由于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人统计,中国用手机发短信使用拼音输入法的占97%,操作电脑使用各类拼音录入法的占50%以上。关于手机对世界的影响,谈话中周老是这样评价的:“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周老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编审之一,故有“周百科”的美名。他还是该书日文版的国际学术顾问。令周老遗憾的是,中文版出版近30年,卖了还不到20万部,而日文版刚出版就卖掉70万部。日本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

都是东方国家,两国人求知欲却有如天壤之别,怎不令人叹息。

本书的出版后记名曰《一本讲真话的书》。周老曾对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个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周有光前辈以104岁的高龄发表新论,制造了跨世纪的传奇。我虽然同周老是初识,只有一面之缘,却有深切的感受,获得很大的教益。我希望所有求知的人都能读一读这本书,同时我还期待着周老有新作问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提高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应该说是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所带来的权威流失的。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在改革条件下,“实效”合法性是权威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研究发展中国的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时,这种“实效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独立意义。正因为“实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一个政府可能因为其施政的实效而提高了它在国人中的威望,反之亦然。此外,改革中的政府权威还会受到各种新的挑战,改革中的权威资源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哪一个方面超前一些更好?

一般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筹备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那种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立宪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分权性改革,它使地方咨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把中央集中行使的权力与地方总督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提前给抽走了,此后,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抑制,以至于即使中央的政令是正确的也无法推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从长远来说,这些政治诉求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问题是,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大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现在看来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

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

至于一个转型期社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我认为,步步为营,而不是一步到位应该更有利于保持秩序的整合状态而减少脱序的风险,用我们当代人的话来说,应该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这样就既能防止风险又能给人以希望与盼头。

另外,可以以社会各阶层对政治中心的认同程度,作为政治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如果社会阶层政治上互相对峙,政治态度分裂,政治取向与观念两极分化,此时搞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的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的平台而显性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对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浇油。我个人认为,与80年末相比,当今中国两极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思想日益成为主流。应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

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温和渐进的改革观,通俗地说,它认为从传统的旧体制要转变为民主体制,需要经过一个开明导向的新权威阶段;它认为,只有这种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稳定的权威存在,才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经济开放与繁荣,只有市场经济能发展起来,就有利于形成社会的分殊化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而只有社会多元化,才会进而促进文化价值观的契约化意识与宽容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习惯的形成,与所有上述这些因素的结合,才会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有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支持条件。一言以蔽之,新权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引向真正的民主社会的来临,而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范畴。只有经济分化引起的社会分殊化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指的是那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早期议会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开明权威主义。

并非所有的新权威政治都会导向好的结果，印尼苏哈托政权就是一个例子，它把印尼引向了现在的一片乱局，对此如何解释新权威主义的实效性呢？

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是一条理论上的“理想曲线”，至于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条理论曲线，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维护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而非要充当现实中的任何权威政治的辩护士。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治强人的失误或失败，反过来否定新权威主义理论这一“理想曲线”的意义。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政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一切改革都会失败，只有革命才解决问题。

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压力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地走向激进，而且每一次激进主义选择的失败，反而会使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在下一轮变革中占了上风。

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按当时的条件来说，过于激进了，一个受焦虑感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变法过程的温和派、有条件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结合到一起来，反对康梁这些激进派的变法。

清末新政中的激进的立宪派取得了对温和的立宪派与保守派的话语优势，并成为支配各阶层思想的主流，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崩溃与解体。辛亥革命选择的西化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是内阁制这种极端分权型的政府模式，导致完全无序的、不讲游戏规则的多党竞争。其结果演变为北洋军阀一直混战，此后整个社会在制度上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失范状态。此后，社会在失范状态下的两极分化，又使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文化地狱感，这种心态是产生形形色色乌托邦的温床。

这种激进化的变革趋势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左派又把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完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新世界作为政治目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激进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又在知识分子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使

人们要深切地反思激进主义政治的原因，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思考中国为什么会陷入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我才通过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我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在我看来，通过百年的反思，我最想对人们说的一句话是，激进主义很壮美，很浪漫，但让我们还是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吧。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我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我把近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在我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观点，作如下介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20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绝不是无条件的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各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下根来。“旧物”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如果把一切旧物当做不合时宜的东西废弃，其结果就如同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防护林带被砍光了一样，什么风都可以势如破竹地、毫无阻挡地吹入，但结果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除了留下一片水土流失的沙土。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

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一回事。

既然从清末改革说到当代改革,如果要问,对当下知识分子中在改革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大体上,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20世纪8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以新权威主义的面目,与自由主义之间有过一场社会大论战。目前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存在着一场新论战,新保守主义基本上站在自由主义一边。

就我的看法而言,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对权力腐败所持的特有的敏感与批判态度,而在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又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温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存在的权利。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中国社会的内部的载体。在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是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交换关系,以自主利益的存在为基础的。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示范作用下,对专制独断的批判,对集体压抑个人的后果的反思而引发的。这种缺乏根基的状态使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在判断中国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失去分寸感,有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己

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变成洋教条而不自知。例如有一位海外的自由主义学者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清洗‘四人帮’的方式不合乎法制原则。”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当强盗卡你的脖子,使你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而最终把强盗捆起来时,你会被指控为“没有经过批准而捆强盗”是违反了人权,因而不符合法制原则。每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当然会对这种无的放矢与刻舟求剑的“教条自由主义”观点感到好笑。当然,这种例子在自由主义者中也属个别,但这个例子反映的问题则具有普遍性。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存在着英美传统与法国传统,前者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关系与经验为基础,后者以泛道德主义的人权解放原则与斗争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后一种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解放式的自由主义,对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容易在危机时期转向激进主义,变为以西方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抵制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的一种制约力量。当然,自由主义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种务实的、温和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在自由主义内部中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在批判法国卢梭式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新左派是社会分化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



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军士兵

思潮。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社会主义的肯定。他们断言,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由于一般民众缺乏在商品市场交换中可做凭借的资源,这就使他们成为失利者并导致社会不公平。他们眼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似乎成了导致两极分化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普罗大众则成为牺牲者。他们正以此来与自由派争夺话语权力。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他们的民粹主义是与现代化历史潮流相背离的。他们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却以某种过时的平均主义的、小农式的乌托邦思想与政策作为基础。并且往往会从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中,来证明自己的主义的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一些有影响的新左派甚至会主张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制”中,去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基础。

几年以前,我的一位从美国得到经济学博士回国经商的朋友,可以说是新左派中最激进的一位。他曾对我说,搞开放就是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人,搞改革就是让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中国人。他还说,“文革”的失败就在于它还革命得不够彻底。在他看来,目前中国进行的改革将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牺牲品,他们从西方新左派那里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即“资本”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和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和成本。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当下出现的新左派中,许多都是我过去的的朋友,他们都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有不少还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从学理资源上的划分,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经济学的,他们从左翼的依附性发展的经济学中取得理论资源;另一类是研究文学的,他们主要从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中取得理论资源。这些新左派人士确实相当敏锐地看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时,会忽视当下中国财富分配过程中实际的

不公平,他们指出,在今日中国,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正是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不同意新左派的理念的人们有必要理解新左派的这一论点。因为这有助于认识历史上一切左派思潮在刚出现时的心态背景。(这里指的是其起源阶段,而不是其左派思潮的异化阶段。例如,“文革”时的极左派从思想史角度来分析,乃是激进左派的异化形态,与此完全无关。)

然而,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主义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征”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在目前的三大思潮中,我认为,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为中国下层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中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在评价新左派时,我们可以指出它的两个基本谬误。

首先是文化浪漫主义。即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以这种浪漫化的理念来作为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这里的文化浪漫主义,指的是主体的向外扩张,即主体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附加到某一外界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寄托自己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

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他们所谈的“文革”实际上与现实中已发生过的“文革”几乎没有关系。毋宁说，他们心目中的“文革”，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不自觉的艺术欣赏品。他们把与市场经济相反的东西予以浪漫的美化，这种新左派中某些人甚至对“文革”的极左思潮也会产生一种浪漫的幻觉。有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从海外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革”中人民生活得很好，一家生五六个孩子也过得下去，现在生一个孩子也养不起；他还说他们农村的许多房子都是“文革”时造起来的，还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换了印度死得会更多，等等。我们固然可以谅解这些朋友在海外生活得久了，可能失去了对中国的某些感觉，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们对“文革”的浪漫已经失去了边际，以致无法进行讨论。

新左派的第二个谬误是他们的完美主义。这里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经验世界的事物都是以并不十全十美为其特征的，但完美主义者则相信他们头脑中建构的完美的理想形态，可以取代不完美的经验世界。而这种他们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理”，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来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现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一个人们可以努力逼近的目标，但绝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社会。

更具体地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

的过度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

持新左派立场的朋友其实都是相当有道德感的。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他们的正义感与道德上的真诚有时表现得比自由主义还更强烈。但是，新左派的泛道德主义政治观一旦用于实践，其结果肯定会更糟。波尔布特无疑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好人”，他要消灭市场经济以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完美的新柬埔寨，其动机不可不谓良善。然而正是这位左派政治理想主义者造成的灾难，成为20世纪的完美主义政治失败的一个最典型、最残酷的例子。这使我想到20世纪初严复的一句话。严复早在1906年给熊纯如的信中就说过：“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由于好人者深。”这句话几乎就是对20世纪激进左派政治所作的预言，把它用在新左派这些动机良好的知识分子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我特别担心的是，新左派就其内在的逻辑而言，有着走向左的激进化的趋势。尤其在内部因素与某些国际事件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特别容易引发新左派激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会与传统的左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来取得话语霸权。事实上，海外有些新左派实际上更接近于国家主义，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强权意识结合到一起来了。这种新“左”与老“左”的结合的趋势特别值得世人警惕，其结果实际上是让中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重新回到类似“文革”的历史错误上去。

当然，以上我所举的都是新左派中比较激进的一些例子。我相信多数新左派人士并没有走到这样的极端。而且，我还必须说明的是，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可能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最近一位朋友相当公允地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人们只强调市场效率而完

全忽视社会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使“左”的主义取得道德话语上的霸权，“左”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人们不应忽视，历史上常常就是以这种方式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的。

有人问我：在这场思想论争中，您采取什么态度？我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具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共同的导向性，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前者反对后者的“制度决定论”，而主张权威杠杆对于推进现代化的作用，尤其当西化模式的激进自由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潮时，新保守主义就会强调现存的权威秩序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保证经济转向的“软着陆”是不可缺少的。新保守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的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反对态度。当新左派重新以“左”的方式来挑战改革的基本方向时，新保守主义与温和的自由主义会形成联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新保守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对激进主义的制约力量存在。但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自身缺乏对权威腐败进行独立批判的核心价值。这时它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与自由主义结盟，借助于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与价值来对腐败的权威政治进行批判。

我个人就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最近一二年来我发表的一些批判权力腐败的文章，使不少人以为我一变而为自由主义了。实际上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当新保守主义为了批判权力腐败而诉诸于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时，往往需要从自由主义话语中寻求支持，这样做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其次，更重要的还是，当下中国的自由派已经放弃了激进主义，变得更为务实、温和与重视民主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这就使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自由主义在某种危机心态的驱动下走向激进化，新保守主义者又会与自由主义分

道扬镳，就会像以维护正常秩序为己任的警犬一样，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

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与当下中国政治中心，均有着部分的一致性与重叠性，例如，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对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视，新左派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新保守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均各自与政治中心有其一致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对中国的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

从更深一层思考问题，三大思潮的存在，本身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两难矛盾，对复杂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文化悖论所进行的反思。我本人愿意比其他两派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理解。这也许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比其他两者更具现实主义的世俗理性，更少以某种先验的理念与“第一原理”来思考问题。因而也更具有对不同意见的同情理解能力。相反，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多少有过对自己钟爱的理念的“诗情梦幻”而往往咄咄逼人却不自知，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些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几乎到了互不来往的地步，原因正在于他们各自有其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实际上则源自于他们各自的“第一原理”。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多少都共享了一种同样的黑白两值分类的态度。这一方面，新左派似乎更突出。

另外，我还想说，新保守主义在批判新左派时，有着一一种自由派所没有的特别的优势，那就是新保守主义从经验论出发，对一切以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面目出现的主义，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先验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先验的第一原理，还是左派的先验原则，均具有一种解构能力。新保守主义是对一切教义化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是一种务实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借用一位西哲的话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如何在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的艺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 杨继伟)

# 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 何 伟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企业从政府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经营权，将国企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以后的改革没有继续深入下去。现在的大型垄断国企是原来的各个工业部转化而来的，继承了部的垄断权和国企优惠特权，不对其进行改革，反而将其“做大、做强”，加强他们的垄断力，使他们的势力膨胀，在某些方面可以和政府抗衡，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使原来国企变异为既得利益集团。列宁讲过，垄断会产生腐朽和寄生，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的。现在出现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国企改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 一、目前“国”企已发生变异

首先，垄断企业的主体已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之前，垄断企业的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以后，垄断主体是企业，他们代替原来的工业部对本行业进行垄断。

其次，国企的资本构成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前国企资本百分之百的是国有，在政企分开后，有许多国企已实行股份制，有的还有外国资本介入。

再次，目前的国企具有分配自主权。原来国有企业无自主分配权，在工资上是全国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无支配权。现在的垄断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权，利润不再上交国家，可以自主支配，出现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全国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些企业的CEO（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有的年薪几百万、有的上千万，把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财

产。他们以企业家身份获取高收入，又以公务员身份获取官员级别，退休后还获取省部级待遇，已成为官僚权贵阶层。

最后，企业具有经营自主权。在政企分开前，企业是一个加工厂，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进行加工，产、供、销、人、财、物均按计划进行，企业无经营自主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的计划对企业已无约束力，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自主定价、自主销售、自负盈亏。企业在价格和政策上可以挟持政府。据《商务周刊》的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而现在在北京成品油价格：汽油8300元/吨，0号柴油7630元/吨。石油出口价大大低于国内销售价，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所谓今之“国”企非昔日国企，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国企不需改革，可以保留不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国企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国家所有制，形成各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松行政捆绑，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这些行政性的垄断企业，应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但目前出现异化。可是现在有人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名义下捍卫国企，实际上是捍卫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加重了我国改革的难度，延缓了改革的进度，为改革出了一道难题。

## 二、目前“国”企持有的特权

这些“国”企虽然已不是原来的国企，但仍享受原来国企一些特权。

首先，这些国企获得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

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航空、金融、保险等,总之,都是国字头的。这些优势资源只能由国企垄断经营,民营企业不能进入,已进入者必须退出,如陕北油井,山西小煤矿、小钢铁厂,铁道部的自备车皮收回,等等。

其次,国企享受着国家投资的优先权。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13万亿元,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超过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向国企(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第5页)。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据说民营企业所得不足5%。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量注入国有企业。银行贷款80%用于国有企业,股票上市圈钱国企有优先权。使国企资产迅速增加,从1999年的9万亿元,到现在已达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

再次,国企获得银行大量贷款。国企利用这顶红帽子,银行可以毫无疑问向国企贷款,国企拿到银行贷款可以大力扩张,重新进行公私合营。目前出现的“地王”均为国企,国企在房地产已占据60%份额。

最后,国企具有股票上市的优先权。股票上市是企业圈钱的大好机会,所有企业都是翘首以待,而国企上市一般都有优先权,截止到2002年,国企在股市上圈钱已超过7000亿元。以后又圈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只知国有资产的核心部分几乎都已上市,其圈钱数字会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

现在有些人一再讲“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想回避所有制给国企这些特权和优惠。而以上这些现实说明,所有制对国企的这种优惠特权也是一种“国进民退”,说明政府在对待所有企业上还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 三、目前“国”企的垄断霸权

下面举出几个垄断行业霸权的事例:

(一)信息行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垄断霸权  
信息行业对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功不可没。但信息行业的垄断经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人们纷纷不满。

1.信息行业有“原罪”。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

资本原始积累称为“原罪”,是靠暴力对农民进行剥夺,所谓的“羊吃人”。除了暴力外,原罪还可扩张到权力、垄断力、贿赂力等等,总之,是借助不同形式的超经济“力”进行掠夺或非等价交换,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即为原罪。

我国电信企业的原罪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垄断力。北京开始有线电话初装费每台收5000元,如果想提前装机,还要再交2000元。虽然这种集资经过政府批准,但是不合理的。一是根据什么服务和成本收取这么多的钱;二是收取初装费并没有征得用户的同意,是单方面行为;三是既然是集资其产权归属于出资者,不应属于电信企业所有。这笔集资数量很大,据说占当时电信企业资产的1/3(其余国家投资占1/3,银行贷款占1/3),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虽然对电信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既不付息,也不还本,出资者既无知情权,又无所有权,这是电信企业依靠垄断力的一种掠夺,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有原罪的。虽然与私人的募资不同,但对老百姓来讲,其利益损失是一样的。

2.收座机的月租费,也不合情合理。电信企业规定不论该月用机多少,必须交月租费。据说不是为了钱而是根据国际惯例。请问国际惯例有收这么高的初装费吗?只能用中国特色来解释。电信企业一只手拿着国际惯例收座机费,另一只手拿着中国特色收初装费,为垄断力进行辩解。收月租费一年至少600多亿,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这一收费,既不是根据成本,也不是根据服务,是电信企业依靠垄断力来强行征收,也是一种非法的原罪。

3.手机的双向收费。据说当初中国手机双向收费,其起因于最初“大哥大”在中国是稀缺商品,价格高、数量少,属于奢侈品,所以双向收费。这在当时这样做也还说得过去。当手机普及化,已成为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时,在2001年,国务院总理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当消息传出后,香港的电信股大跌。为了维持香港的股市,国务院派当时的电信部长到香港稳定股市,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股价立即回升。从这里可以看出,香港电信股市的稳定主要不是依靠电信企业的业绩,而是靠国家的政策,是靠内地客户双向付费的

纳贡来支撑香港的股市。但问题在于两年已过了许多年,在股市的行情很好的情况下,电信企业还继续双向收费,这就属于一种公开掠夺,这虽不是原始积累而应属于现罪。因为利用垄断力进行积累,所以还是原罪。

4.收费不透明,收费偏高、收费偏乱。一些收费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没有经过听证,付费和服务不对称。与国外相比收费偏高,信息资费国外一般占居民收入的2%左右,而我国竟达7%—8%。国际长途收费比美国高、国内长途收费比印度高。这种高收入,2007年上半年移动的利润率达21.16%,平均每天净赚超过2亿元,在国内少有,在国外罕见。收费乱主要表现在套餐上,数量之多,花样之繁,混乱到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据《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9日报道,自6月份起,各省市在电信套餐清理过程中,超过4万个,还剩下多少,就不得而知。

(1)乱加价。北京各手机卡销售点,凡买10元卡加5元,买20元卡加2元,买30元卡加1元,逼迫人们去买大额卡。花30元可买100元的IP卡,但需另外加2元。买手机先交选号费,后买卡预交通话费,手机未用前运营商先收两费。另设时间限制,到期即便有余额也给停机,不续卡余额就没收,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国家发改委曾发出通报称,2006年全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上升65.59%,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2)乱涨价。有线电视初装时每月收费6元,不久就涨到12元,没多久就涨到18元。这种三级跳的涨价是否经过物价部门批准?根据电信行业的特点,线路铺设以后,扩大用户就不需要再加大投入;即便小量的费用支出,因用户扩大,其收入已远远抵消其支出,不是涨价而应降价。这是网络行业的一个特征,但目前信息行业是反其道而行之。

宽带互联网收费也应根据用户的扩大,不断降低收费标准。当时有些收费是以1美元折合人民币8元来计收费,现在比值已6元多兑1美元。如不降低收费实际上等于变相涨价。凡是信息行业按美元标准计算收费的都存在这一问题。

(3)乱设项目。信息行业设计的套餐数量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些套餐的上市收费标准、技术水平、质量、效益等等方面是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或备案的,哪些套餐是为消费谋利,哪些套餐是忽悠消费者来套钱,消费者是辨别不清的。信息行业有多少忽悠消费者进行圈钱的,只有业内人士清楚。

目前各行各业都利用信息出台一些收费项目,如电视上一些文体娱乐活动,号召人们参与,是公益活动还是牟利,人们就不清楚了。

5.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项目的增多,客户数量的扩大,在不存在边际成本的情况下,信息资费应逐步降低,欧洲境内已取消漫游费。而我国有些费用长期保持不降,如国际国内长途费、漫游费、宽带费、座机费、月租费等。

这是一个工商不过问,物价不监管,质检不稽查,主管部门还有些袒护的垄断行业,任其出台霸王条款忽悠消费者,追逐利润最大化,完成国资委的“保值增值”任务,而抛弃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使命。

## (二)铁道部门的垄断霸权

1.前几年有一件案例,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一个垄断部门被告上法庭,即一个律师状告铁道部春节火车票涨价是非法的,违背了市场原则。铁道部说,涨价为了使客运高峰分流。那末人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在客运低峰时不降价?春节涨价不合理:一是服务质量下降,一个一百多座位的车厢挤了二百多人,水泄不通,凭什么涨价;二是没有增加成本,在一个车厢增加一倍乘客的情况下,不提价就可以增加一倍收入,而费用并没有增加。春节客运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辛辛苦苦一年挣点钱,欢欢喜喜回家过年,铁道部门手握垄断权,利用春节火车票涨价,从他们口袋掏钱,这是趁火打劫,是敲竹杠。

当然我们的法院会“公正”地判决,律师败诉,铁道部胜诉。但社会不顾忌法院的判决,而支持律师的申诉,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铁道部以后取消春节涨价,得到社会的好评。

2.铁道部强行收购自备车皮案。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晋煤、内蒙古煤外运困难,铁道部和两地政府鼓励国营、集体、民营企业自购车皮,参与运输。这对当时解决铁路企业困境和缓解运力紧张,促进煤炭外运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已有46986辆自备车皮,占山西煤炭铁外运量31.8%,占内蒙古西部煤炭铁外运量的80%以上,解决了十

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铁道部收购自备车皮有三条理由：一是价格双轨，收费繁多，增加了货主负担；二是分散经营，单向使用，造成线路和车辆双重浪费；三是投入不足，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铁道部称：“对于不愿意转让自备敞车，从明年起我部将不再为其办理国铁过轨运输手续。”（铁道部149号文）为了迫使自备车主就范，2003年7月24日以部长9号令《企业自备货车经国家铁路过轨运输许可办法》规定：

①拥有自备敞车的企业注册资本额不低于2亿人民币；②经由干线利用率不低于80%。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自备敞车因达不到这两个条件的要求，而被停止运营，被铁道部强制收购。其弊端，一是铁道部收购自备车皮三条理由不充分，都是属于管理问题，价格应物价管，车皮利用率和安全都是铁路管理问题，与所有制没有因果关系；二是铁道部强制收购自备车皮，对党的政策是出尔反尔，不是改革是倒退；三是铁道部强制收购自备车皮，将影响十几万人的就业，使一些民营企业破产；四是铁道部独家垄断，不敢引进市场机制，没有竞争，不利于提高效率。

### （三）金融业的垄断霸权

徐水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孙大午是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农牧集团董事长、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该集团1995年被评为全国私营企业500强的第344位。孙大午在北大发表“三农”问题演讲而声名鹊起。由于四大银行不给贷款，从1995年以来，他累计吸收企业员工、家属及公众存款1.8亿元，解决经营所需，解决农民卖粮难。2003年7月5日，被政府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逮捕，并罚款、判三年缓期刑。这个案件有以下问题：

（1）孙大午的集资属于民间合法借贷，并不违法。一是利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4倍；二是集资用于发展生产，并没有以高利贷出，更没有进行欺骗外逃；三是诚信承诺，没有坑骗存款者；四是公众自愿存款，以卖粮作为存款，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也解决企业缺资金买粮的问题，这是一举三得，开辟民间借贷一条路子。也是国有银行垄断，



不给民企贷款被逼出来的。

（2）即便是孙大午违法，他对社会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潜逃，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审理，为什么要逮捕。

（3）在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政策与法律界限不清时，不应先抓人后定罪。乱抓人就是侵犯人权，抓错人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垮，抓错人，政府非常被动，会被推到被告席上。

### （四）石油行业的垄断霸权

1. 垄断国内石油价格。前面已指出，石油出口价低于国内销售价一倍多，使国内的加油站零售价都高于欧美等国一倍。靠这一垄断价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利润不上交国家，前两年还从国家财政部获取巨额补贴。

2. 陕北油田案。2003年8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当地政府违背中央指示精神，违法行政，强制收回油田的事件作了报导。此事件影响重大，涉及的范围广（15个县），人数众多（十几万职工，近二千企业家），资产巨大（近百亿元），经济损失严重（80%以上油井停产），社会秩序混乱（有5000人到省会西安上访，前后抓捕人数众多），国内外媒体大量报导，后果相当严重。对此事件应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1）整顿油田秩序很有必要。但是，不应采取先收三权（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后进行低价补偿的办法，对不服从者强行夺取，还以妨碍公务、抢占国家财产和非法集会等罪名，抓捕多人（仅安塞县前后抓捕50多人），还不准法院受理此

案。这完全是违法行政。

(2)上述地方政府单方撕毁合同,单方决定低价赔偿(约20%),单方决定兑付时间;不准法院受理,不准群众上访,公、检、法、司为其保驾护航。这违背宪法、合同法、司法程序,属于违法行政。

3.垄断加油站。中国石油垄断企业,对民间加油站以不供油进行排挤,迫使收归国有。中石化老总陈同海对国家资源处理有巨大权力,一次批给情妇的加油站,经转手倒卖就赚了1亿多元;后在青岛的中石化1000吨炼油厂建设中,其情妇利用陈同海的关系,低买高卖地皮就净赚两亿元。垄断必然产生腐朽,近年来不少国企CEO落马,这位陈老总因受贿1.9亿多元,被判死缓。

#### 四,今日的“‘国’进民退”

在今日,国企已开始变异为特殊利益集团时,还有人这一“国企”进行辩解和维护。

首先,抬高国企地位,将“公有制为主体”变异为国有企业为主体,提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难道已占GDP的65%、新增就业岗位的80%、税收总额已占65%的民营企业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当中国走入“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困境时,救活中国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民营经济发展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由于民营经济有这些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缩小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决定,这就是“国退民进”,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轮子一齐转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十六大的“两个毫不动摇”。今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这种差异是在国企拥有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占有社会大量财富、

获取国家巨额投资、取得银行巨量贷款、拥有上市圈钱的优先权等等情况下出现的。在这一尴尬局面前,一些人会感到颜汗。

其次,扩大国企作用,以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提高中国的竞争力”等,作为“做大做强”国企的理由。难道政府不应该一视同仁地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所谓做大国企只是将许多“小舢舨”组成“航空母舰”,进入世界500强,而不考虑这些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等方面质上的差距(2009年,中石油人均盈利为1万美元,埃克森美孚人均盈利为50万美元)。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扩大国有企业占有领域,缩小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出现“国进民退”就成为必然趋势。

目前对“国进民退”人们议论纷纷。我想“进”和“退”应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主要不是资本量和企业量,而是看控制领域的大小,党中央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这才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标准,按这标准要求,在占有领域上应是“国退民进”,而目前一些做法与其相反。

首先,明目张胆的“国进民退”。国资委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范围。有了这一修改,陕西就可将陕北油田、山西将小煤矿,以“整顿”的名义,用低价、强制收归国有(油井赔偿仅20%左右,煤矿赔价低5—10倍)。引起民企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力大受损失。

其次,潜在的“国进民退”。一些国有企业不按《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退出,仍然盘踞着应该由民营经济进入的空间,这是一种潜在的“国进民退”。

再次,隐形的“国进民退”。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占有比重增长的不快,不能表明不是“国进”。由于民营经济增长太快,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的相

对量没有明显增长,但绝对量在快速增长。这几年国企净资本从2万多亿元增长到5万多亿元,国有资产从9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可见增速之快。有了大量资本,国有企业就有条件在国有经济定位的范围外扩张,是与民争利,如进入房地产业,成为“地王”。这样的“国进民退”用企业数量是计算不出来的。

一些国企利用国有的牌子,获得“市长”的支持,再在市场获利。《领导者》杂志2009年第12期上登了一篇《从〈建国大业〉看国进民退》。其中讲道:中国最大的电影企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讲:《建国大业》9月16日全国首映,3天半票房收入就上了亿,最终票房5亿或6亿的说法四起。韩在多个场合对媒体笑言,电影投资3000万,只要票房达到1亿即可盈利。“说明主旋律影片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能赚钱了,实践成功了。”其实这部片子还是找了“市长”的。2006年开始创作《建国大业》就通过关系找到全国政协汇报。2008年10月剧本完成后,全国政协领导再次批示:在人民政协成立60年之际,拍摄此片意义重大,要支持。最后此片如何落到韩三平之手就不得而知,但国企的身份,行业老大的地位,应该是重要砝码。这种“国进民退”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示出来的。韩三平一再标榜:“我不相信国有企业做不好,我不相信公有制就彻底不行了。”但《建国大业》恰恰是头号国企撑大旗,“市长”支持,众明星赶集零片酬,才取得市场的巨额盈利,是行政、市场通吃的产物,其他的非国企,如华谊兄弟行吗?不要忽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是一个垄断国企,具有独家进口大片的经营权和CCTV 6频道的广告经营权,这难道不是国有的特权吗?这几年一些央企利润巨增,主要靠垄断和各种优惠特权,而不是经营效益所获。一些国企经营者、管理者散布这种言论,一是否定所持国有特权,二是表明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有方。其实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饰不了国企的特殊地位。

从以上简单列举国企的特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国”企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企。他们依靠国企的身份,从政府获取特权,而不承担企业经营不好的责任;他们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国有企业的特权,市场垄断的利益,他们双双占有。他们还用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两手从老百姓腰包

掏钱。这样的国企已经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国资委推卸不掉始作俑者的责任,把这样的国企“做大做强”岂能不挨骂?一些人维护国企,实际上维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利益,应当认清这一现实。

国企发生变异,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因为一些人还沉迷在旧观念之中,认为只要是国企在政治上就有保险,认为只要企业是公有,一切管理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就赋予国企许多特权和优惠,还在各方偏袒国企。其实这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一切都拿在自己手中,缺少管理市场经济的艺术。为此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书屋 2010年第4期目录

- |      |   |                                      |
|------|---|--------------------------------------|
| 书屋讲坛 | 三十年,一瞬间   | 陈彩虹                                  |
| 口述历史 | 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br>——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   | 梁建东                                  |
| 湖湘人物 | 彭柏山:一位小说家的逆变<br>弃武从文的小说家何海鸣   | 苗振亚<br>蔡登山                           |
| 流年碎影 | 走近张仃<br>杨宪益夫妇的译事<br>面列松山叠叠青<br>——殷海光先生衣冠冢筹建始末<br>快意之快                                       | 李兆忠<br>谷鸣<br>李文熏<br>黄永厚              |
| 灯下随笔 | 时代镜像中作家的立场与表达<br>别具一格<br>——《剑桥中国文学史》特色简介<br>文学史应当这样讲  | 焦雨虹<br>徐志啸<br>谢泳                     |
| 说长论短 | 心理的“柏林墙”先倒下<br>——《窃听风暴》维斯勒上尉形象剖析<br>《阿凡达》里的三种东方元素<br>美国环保动画电影的内容与反思<br>新世纪的豪华女奴们<br>《蜗居》启示录 | 刘畅<br>朱文信<br>吴迪<br>吴诗晴<br>刘剑梅<br>郑佳明 |
| 编读往来 | 关于文化嫁接的随想<br>——读万之《殖民文化嫁接的果实》<br>海德格尔的理论是士兵哲学吗?<br>——与李泽厚先生商榷                               | 陈东华<br>华今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 孙 康

如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算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掐头去尾,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中国也延续了 20 年之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如此之长,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 1981 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并未设专节论述此问题,但通过回答“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而间接地从三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是毛泽东判断失误和领导错误;二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容易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三是毛泽东的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错误的发生。20 余年来人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基本上在这个框架里进行。作为党的政治决议,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初全党和老百姓的认识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再来反思那 20 余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解释便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刻。这种历史局限表现之一,是未能将 20 余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没能揭示这种错误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笔者不揣浅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考察,力图揭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经济体制根源。

计划经济是一种以行政指令强制性配置资源为手段,以完成计划目标为宗旨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客观上要求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供需之间成为持续的常态现象。按此要求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功能和作用就是以计划来代替市场,并通过计划使资金和资源能够按照政府的发展指向得到合乎要求的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一种经济运行自发的产物,而是人为设计并依靠政治力量强制性地建立起来的。经济愈落后,物质愈匮乏,它愈容易建立起来,并有着当时当地的合理性。但就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它是一个“非常态”。这种非常态、非生长性的体制必须依靠人为的力量加以不断的维护才能延续下去。

## 一、阶级斗争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工具

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价值规律,违背了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将其强制性推向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必然会带来不满和抵制。人们会不断地对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提出疑问,人们在实践中会自发地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种体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代表社会发展要求和方向的,那么说有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这种倾向实质是一种要求进行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尊重价值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下,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那么只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思想凝固会带来判断上的失误,而这种“判断失误”又恰恰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所极为需要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分歧和争论,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之争。若“计划”到底,也就只能紧紧

握住阶级斗争这柄利剑。当年一再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旗帜,用意之一便是用它来维护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可以从两个方面有效地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可以对一切对计划经济体制不满和抵触的思想及代表人物进行打击和斗争,遏制一切企图走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要求。“阶级斗争”在提供理论解释的同时,也就提供了打击和遏制的

正当理由和打击的办法。阶级斗争的开展压抑住了人们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其实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如果讲求价值规律,讲求等价交换,就无法依靠行政指令进行资源配置,使计划体制运转不灵甚至失效。然而“大敌”当前,“阶级斗争”如此激烈,政治目标高于一切,还讲什么价值规律?甚至讲价值规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开展还会有效地压抑和淡化人们的物质欲求,淡化和压抑人们以劳动换取自己利益的渴望,使人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不惜代价,从而不再“斤斤计较”变得极为崇高。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鄙视一切物质利益的正当理由。鄙视物质利益,哪里是人的要求,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是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的要求。因此,这种体制需要有“对立面”,需要有“敌对势力”的存在。它存在时要时时强调它,它不存在时要“制造”它。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论著而后来重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巨大疑问。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不仅在国内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且在国际范围内强调阶级斗争,造成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非常激烈的紧张社会氛围。



我们都知道“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对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新概括,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其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早在50年代初已露端倪。为什么毛泽东就没有觉察出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一味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呢?应该指出,这有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冷战的格局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都会影响到他对时代潮流的判断。但我们仍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条件来看,它需要一定的封闭性。我们撇开那些政治因素不谈,单就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只有相对封闭,才可能是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内循环系统。这几乎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前提性的限定,否则无法“计划”,即便“计划”也难以实施。这从我们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到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入WTO的历史实践,也可反观相对封闭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那么我们要问,相对封闭的理由是什么?理论依据是什么?当然,没有什么比“阶级斗争”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了,况且这种解释又并不是毫无客观依据。然而“扩大”的后果则会产生层层递进的效应:首先是满足了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封闭性的要求,免遭“开放”带来的威胁;其次,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

们就要反对”的思维逻辑指引下,会更加有力地证明我们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当时认为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在外在的巨大压力下,这种封闭性的体制反而更具凝聚力,为实行进一步的高度集中统一找到了理由,包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异常“尖锐复杂”的政治氛围都会从不同的层面上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固然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毛泽东对世界潮流的认知,可毛泽东也是体制中人,他不能不考虑、不能不适应体制自身的要求。可以说毛泽东及其晚年思想的追随者们,非常清醒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不搞“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体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缺乏,需要用“阶级斗争”来“补充”

计划经济体制的相对封闭性不单纯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即体制内也要相对封闭。只有进行系统与系统、单位与单位、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条块分割,杜绝其横向往来,才会有个相对的稳定性,才能构建起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如此,还需要有一种固定性,即人员不能随意流动,否则“计划”无法制定,也无法实施。适应这种体制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的束缚性政策和规定,如户口、档案、粮油关系、单位等等。这样一种结构的社会当然是一种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社会。可以说它已将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剥夺殆尽。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凭什么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特别是劳动成果的分配主要由权力进行配置,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时候,怎样维持劳动纪律和激励干劲?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用“阶级斗争”来激活这个缺乏活力的社会,来给这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一发展模式后来被高度概括为六个大字:“抓革命,促生产”。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促进生产,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当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抵御了走向市场经济的趋势,捍卫了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整个社会,起码有两个效用。一是缺乏劳动积极性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剥

削阶级思想在做祟,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避开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怀疑和不满,又为在更大规模上开展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斗争找到了依据。从而为扫除一切与当政者意志不符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理论前提,实现高度统一,保证令行禁止,按计划行事。二是可以使社会有一定的“压力”,从而形成一种“驱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上表现为一种间歇性的政治运动。一场运动来了,打倒了一批人,又起用了一批人,这样社会便有了一种“张力”,它通过调动起人们的“仇恨”甚至“恐惧”来进行驯从的劳作,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去。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不搞那么多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维持不下去。因此,毛泽东晚年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就绝不是老人家的梦呓和疯话,而是对这种体制深刻洞察的结果,是他晚年无限忧思的根源。

## 三、计划经济体制派生出的弊端需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清除

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动力缺失,且会派生出一系列弊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曾以愤慨的心情列举这些弊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同上,第327页)邓小平指出的,最根本的是高度集权而权力又几乎支配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只要看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例如前苏联,不是都具有邓小平说的这些难以克服的痼疾吗?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派生出的种种弊端,不仅是后来的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绝

不能容忍的。然而不同的是,邓小平用体制改革的办法,从根本上一步步地解决和消除这些弊端,而毛泽东则将这些现象纳入阶级斗争的视野予以解释和惩治。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再次回避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而又暂时地遏制了这些弊端。其结果是更加有效地保护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 四、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应该进行阶级斗争的假象,提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基础

前面已经说过,计划经济体制是人为设计并依靠政治力量强制性地建立起来的。可是一旦建立起来,它便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规律向前发展,获得一种近乎本能的向全社会扩展的要求。很好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全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才可能更好地按集权者主观意志的“计划”行事。因此,以“阶级斗争”为开路先锋,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范围等等就不单纯是“决策失误”所能解释的,更大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意志使然。这样一种扩张趋向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或说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必然会遇到来自党内党外甚至基层社会的抵制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既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得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与之斗争,越斗争阻力和抵制越大,阻力越大越要斗争。这正像一个灯影愈往黑暗处扩张它所面对的黑暗越多一样,结果是“阶级敌人”越多,阶级斗争愈斗愈趋激烈。计划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范围的趋势,是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相一致的,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表现。

再看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态和个体处境,也是耐人寻味的。前面已说过,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一种“固定”性,每个个体几乎都被户口、粮油关系、单位、档案牢牢地束缚在一地,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而每次政治运动的发动,都意味着一种重新洗牌,都意味着一批人将倒下去,另一批人将冒出来。政治运动几乎成了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地位和命运的唯一机

会。有谁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即使改变不了,能看到那些春风得意者顷刻垮台也是一种心理满足;即使改变不了,能趁运动之机挟私报复打击怨敌也是一种收获。计划经济体制加阶级斗争,必然会滋生出一批大大小小的政治赌徒和装腔作势的“左戏子”。他们上窥风向、下摸苗头,时刻准备进行政治投机,其对政治舞台动向的关注热情绝不亚于现在一些股民对股市行情的关注。在最崇高的“革命”名义下,掩藏着的却是最最卑下的私欲。他们,就是为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社会基础和领头羊。政治一旦变成赌博,这种政治也就变得肮脏不堪,这种政治也就走到了尽头。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败坏了社会空气,腐蚀了人的基本品质。正直、诚信、平等、合作,勤勉而不是投机,实干而不是空谈,追求正义而不是追逐权力,这些走向市场经济必备的精神资源几乎被耗蚀殆尽,至今我们还在为这种政治后遗症支付着高昂的社会成本。

概言之,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阶级斗争来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缺乏,需要阶级斗争来补充;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需要借助于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态,为开展阶级斗争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些便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经济体制根源。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伟)

### 启 事

2008年精装合订本 85元,简装 80元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从三个联合公报看美台军售

● 朱 良

进入 2010 年，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 64 亿美元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美国这一行为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呢？可以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中找到答案。

## 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对外政策是联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占领台湾。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到 1969 年 3 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到了战争的边缘。毛泽东主席开始调整中苏、中美关系，改变对美、对苏两面出击的战略。而美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赶上美国，急于摆脱对越南的战争，也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对付苏联。

1969 年 12 月，我国恢复同美国的大使级会谈。1970 年 10 月和 11 月，尼克松总统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传达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1971 年 7 月，尼克松派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达成协议，尼克松总统将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

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历了 22 年相互敌对和隔绝，美国占领台湾多年，1971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时，美国仍在搞“两个中国”。因此双方有很多问题需要沟通、互相摸底。基辛格和黑格先后来中国做政治准备。

尼克松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访华。毛泽东首先会见尼克松，谈了“哲学”问题，指出现在中美两国不存在打仗问题，赞扬尼克松访华，幽默地说“你当选总统，我是投了一票的”。周恩来同尼克松就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做了长时间实质性谈判。

中美关系要正常化，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要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尼克松说，他希望在处理这一问

题上给他一些余地和时间的，公报措词不要被指责说尼克松访华出卖了台湾。公报草案关于这一问题的措词由北京谈到杭州，最后按基辛格的建议达成协议，即“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公报还写上中国方面希望的“反霸条款”，即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 -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联合公报》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文件，是三个公报中最长的一个。由于中美对外政策分歧很大，各自又有国际朋友或盟友要照顾，《公报》强调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用 500 多汉字写上“中国方面声明”和“美国方面声明”，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方面声明”一开始就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命外交路线。

《公报》又指出：“双方同意”实行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略别国等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等等。

##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长达七年

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经历了长达 7 年的时间。这里面有中美双方内部困难的因素：中国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批林、批孔、批周、批邓，周恩来和毛泽东病重、先后去世，美国 1974 年 8 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1976 年美国忙于国内总统大选。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滞缓的主要原因是：美

国外交重点是同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核武器等裁军谈判,并调整其同盟国的关系。中国方面则把“联美整苏”作为重点。1973年11月,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时间由你们定,我们不难。1975年12月,邓小平副总理对福特总统说:我们多次说过, we 有耐心;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一直是把“国际问题”摆在第一位,台湾问题是第二位。

所谓“国际问题”,就是中美联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问题。1973年2月,毛泽东同基辛格说:要搞一条线的战略。1974年2月,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曾批驳基辛格说的“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毛泽东说:美国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这是指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后,5月就访问苏联,同苏联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973年6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苏美达成了《防止核战争协定》。

##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197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失败,1977年1月,民主党的卡特就任总统。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六整版、大字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大文章。我国开始大力推进中美建交和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1977年8月,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在谈到反对霸权主义问题时,着重批评了美国对苏联的“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提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一)美国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二)美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军和军事设施;(三)美同台湾断交。

1978年5月卡特总统派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他说,卡特总统要他告诉中方:美国已下了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邓小平指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行,这是中国的内政。在此问题上,双方可以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

1978年7月起,黄华外长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六次谈判。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不能错过当年12月前后,因为明年初国会开会,将先辩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被推迟到1979年秋后。邓小平认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邓小平做出这个决断时,我们正准备采取一个重大的实际行动来扩大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表示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新草案,但《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并表示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他还指出,鉴于美方需要建交一年后才废除(美方称“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在这一年期间不要卖武器给台湾。12月15日,也就是在预定宣布建交公报的前一天,伍德科克奉命会见邓小平,要求澄清售台武器停止一年后,美国仍可以出售,并说卡特总统在回答提问时将公开说出。邓小平表示不同意,严正表明了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最后双方同意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搁到以后再讨论,不影响12月16日如期发表建交公报。12月16日,中方在宣布建交公报时,由华国锋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不符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建交公报很短,只有400多汉字,宣布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强调了五点,包括反霸条款和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

## 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中美刚建交,邓小平副总理刚访美,197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就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并使这个国内

法凌驾于美中之间的国际协议之上。《与台湾关系法》共 18 节。法案规定：“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解决台湾前途的努力”是“美国严重关切的事”。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行为”。“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79 年 4 月 19 日，邓小平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严正指出：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4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正式表明我原则立场，批驳了美方辩解，对美国总统签署美台关系法案深表遗憾。

## 1982 年《八一七公报》

1980 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表示，保证将忠实地履行《与台湾关系法》。里根当选总统后，1981 年 1 月邀请了台湾国民党主要成员之一的蒋彦士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经过交涉后美方没有让蒋彦士露面。美国还准备向台湾出售新式军用飞机。1981 年 6 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关键是出售武器的性能不超过卡特总统时期的水平，只要性能控制住，卖得再多也没用；其次是要逐步减少，直到停止出售。从 6 月开始，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

1982 年 9 月 1 日，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了。邓小平认为美国已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把这桩公案告一段落，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8 月 15 日双方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协议，17 日公布，简称《八一七公报》。公报说：“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做这样的声

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这一立场。”

8 月 17 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恒安石大使，指出：在公报中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当然不能一年只减少一美元。公报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我们理解所谓的“一段时间”应是有限的，不应该推向遥远的未来。关于“最后的解决”，只能是停售。《公报》提到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不是对任何人的一种承诺，不能曲解为是美国停止售台武器的前提。

《八一七公报》是双方的妥协产物，使我们有了一个同美国进行斗争的依据。但是美国是不准备实行这个公报的。以后有消息透露，《八一七公报》发表前，里根总统曾向台湾做出六点保证：（一）不设定终止对台湾军售的日程表。（二）任何时候对台湾军售不事先与北京磋商。（三）不在北京和台湾之间扮演任何调解角色。（四）不变更《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的承诺。（五）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六）不施加压力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

《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有过重要的发展。但是美国违反《公报》的规定。1984 年美国售台武器达 7.07 亿美元（1979 年为 5.87 亿美元）。80 年代中期，美国以转让技术的方式提高台湾武器性能。特别是 1989 年 6 月起，美国一方面要欧盟一起对中国停止军售，另一方面 1992 年 9 月（共和党）布什政府决定卖给台湾 150 架 F—16 战斗机，总金额 58 亿美元。

黄华同志在《亲历与见闻》的回忆录第 14 章“中美建交和八一七公报”中，以让人思考的一段话作为结束：“1982 年冬，有人写工作总结报告给中央，其中说，我国对美工作存在路线错误。我向邓小平同志写信，不同意此点。小平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大意说：对美工作，主要由我（指邓小平）主持。如果有问题，由我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到：不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政府都不遵守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对美国来说，台湾已不仅是新中国初期遏制中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且是以关岛为基地，从日本、韩国到台湾包围中国的链条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

● 张殿清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这句话成了我们改革以前消灭私有经济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不是这样的，是中文版将它的翻译错了。在《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我并不懂德文，而我对它又是如何知道的呢？那是在2000年12月22日，我去看望胡德平同志。他说：“最近，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他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在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请你明天到中央编译局去找一下殷叙彝研究员，请他帮助查一下在德文原版中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写的？”

然后，胡德平就用电话同他联系好。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找了殷先生。因为殷先生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因此他一见到我，就很快地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拿给我看。他说：“你看，马克思在这里用的不是Abschaffung（消灭），而是Aufhebung（扬弃）！”然后，我就将有关段落复印后，拿回去给德平看。当他看后又经过我的解释而显得非常兴奋，就说：“这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写篇文章并公开发表！”当文章写好后，他说：“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我国在建国后的重大实践问题，因此这就应向中宣部请示一下。但是，中宣部经过研究后给予的答复就是：目前，你们的这一文章还不宜公开发表，只能在内部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这样，胡德平也就只好选了某个内部刊物发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著作也证明，他们二人对于私有制的立场和态度，始终都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的论述。

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私有制的产生有着“历史必然性”，“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它必然要发展到“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马恩全集》42—120,121。110,106）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同上，2—44）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这样地写道：“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上，3—74,25,410）

1847年10月，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决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它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

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同上,4—352)。这就说,无产阶级或任何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消灭或废除私有制。

1847年11月,恩格斯写道:“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同上,4—365)这就是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只有资产阶级私有制才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资产阶级私有制才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以上所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他们在对待私有制特别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论述。

让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论述。

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写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异化过程,即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这种颠倒的过程只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同上,46下—38,361)

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又说:“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同上,46上—398)

1863—1864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然会出现彻底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它的现实条件,为它提供一种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因而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同上,49—126)

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他的这一著作中,不但没有提到要消灭私有制,而是相反,马克思强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广泛而彻底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不是通

过暴力手段去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市场的竞争使低级的或不发达的私有制逐渐地变为发达的或最高形式的私有制,而在这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因素也就在其内部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最后,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脱胎出来,或者说,由于自然的历史过程,最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必定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或让位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上,31—410,16—255)

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生产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同上,20—14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就更是强调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而不是“消灭”。

例如,关于从个别资本或私人资本发展到股份公司的问题,马克思在该卷中写道:“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同上,25—493)

关于股份制度,马克思写道:“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同上,25—496)

关于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马克思在该卷中说道:“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同上,25—686)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经济形式,马克思说道:“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的形式。”(同上,25—999)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私有制”的理论,同样,它也不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或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网络问政三人谈

## 网络问政与民主进程

### ● 智效民

从去年两会前夕到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已经与网民交流两次,对话的领域比较广泛,回答了不少公众关心的问题。比如,他去年说: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制度至今没有出台,给公众留下了一个悬念。今年有人问到为什么管不住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时,他表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随后他解释说:要想治理腐败,管住官员们的“三公消费”,“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如何落实公开透明和民主监督,他又给公众留下一个悬念。

有一种看法,认为领导人在与网民公开交流时,表达一些顺应民意的话是作秀。我不这样看。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直接交流,毕竟开辟了一条百姓问政的通道。领导人的承诺能够很快兑现固然最好,暂时不能实现,民间也有了一个问责的依据。回想进入网络时代之前,中国老百姓连这样面对领导人公开问政的机会也没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了官民之分,就产生了民间对官方问政的需求和冲动。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谤木”,向帝王谏言。“谤木”是“华表”的雏形。可惜现在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已经演变成一种建筑装饰,一种摆设,失去了“谤木”的原始功能。中国古代,如果说华表的作用是“下情上达”,那么《邸报》的作用则是“上意下传”。据说在西汉初年,为了加强地方与京城的联系,各地行政长官都要向长安派出常驻代表,其任务就是及时把皇帝的谕旨、诏书和大臣奏议等政治情报,以文书的形式传送回去。由于这些常驻代表的住处叫“邸”,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驻京办事处”,因此人们便把这种文书抄本称为“邸抄”或“邸报”。到了明清两代,尽管《邸

报》在内容上增加了社会新闻,在出版上使用了印刷技术,在发行上也有民间报房,但一直没有摆脱“政府公报”的性质。专制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上意下达的功能远远强于民意上达的功能。

而欧洲在15世纪末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开辟了民间与官方平等对话的通道,对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人说“媒介技术的革命是人类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官民走向平等对话的趋势不可逆转,对于推动全人类政治民主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低估的作用。和谤木、华表相比,和奏折、上访相比,网络无疑在对话的公开性、平等性、方便性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当今发达国家,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迅速适应网络,他就会被选民抛弃。视频、论坛、微博等网络新宠已经成为政治家竞相涉足的领域。被称为“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的奥巴马,几乎是“(手)机不离手,博(客)不离口”,就连一向保守的英国王室也设立了皇家微博网站,像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开通与民众交流的网络专栏。这让人想起一句老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两年,中国领导人开始与网民对话,应当说是明智的,顺应了网络时代的历史潮流。在与温家宝的两次对话中,网民的提问,比两会结束时中外记者会上中国主流媒体记者提问,还是实在得多。我相信,网民还提出了更尖锐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但被筛选掉了。网络对话虽然只是百姓问政的初级形态,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开端。在我国各级政府领导人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情况下,官员不易养成接受公民问政的自觉和谦卑。如果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党政负责人与网民对话定期化,常态化,对官员正视民意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必有某种促进作用。

## 公布三公消费的明细账

● 丁东

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第二次在线交流。有网友提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温家宝说:“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他提的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在当今世界的大国中,三公消费开支庞大,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他大国不是没有官员乘坐公车、公务招待和公费出访,但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并且受到议会、媒体和公众的严格监督。个别官员违规,轻则丢官,重则坐牢。而中国的公车数量之多,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公车总数之和。中国官员组团出国,名为公务,实多为旅游,成为全球各地特有的风景。公款吃喝,更是在中国内地官场上司空见惯。对此,公众并非麻木不仁,早就深恶痛绝,却没有条件监督,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至多在网上表示不满。三公消费的主体是官员。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实质是官员利用公共权力自肥的方式之一。最初可能只是不想接受公众监督,到现在已经积重难返,演化为不敢见光的“家丑”。

中国三公消费的总额到底是多少?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2006年,竹立家教授综合各方面数据,包括公开的和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推算2006年三公消费的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其中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是3000亿元左右,公款吃喝2000亿元左右。在当年4万亿元的财政总支出中,大约占22.5%。财政部门认为没有那么多。民间有人认为实际数据比这个还要高。不管怎么说,公开的媒体上总算有了一个三公消费的数据。各方面人士涉及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以这个数据立论。

四年过去了,舆论对三公消费的批评不绝于耳。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等官员组团公费出国的行程和费用偶然流出,每人费用高达8万元,考察地点多与业务无关,引起舆论大哗,最后只好免去这些干部的职务。辽阳等市试行公车改革,领导干部最高补助一年7.6万元。虽然这个方案可以节约行政开支,但补助数量之高还是令人咋舌。争论之余,一些地方公车改革搁浅。

今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宣布,各地区各部门通过财政预算压缩出国(境)、车辆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158.06亿元,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近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了49.0%、45.5%和37.6%。公款出国(境)旅游得到进一步遏制,200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件103件,涉案人数319人,追缴涉案金额537.1万元。显然,中纪委、监察部手里有各地区各部门2009年三公消费的数据,也有往年的数据,否则怎么算出158.06亿元?手里也有党政干部公费出国的具体数据,否则怎么算出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分别下降49.0%、45.5%和37.6%?2009年三公消费总额有所下降是好事,但自我表功为时过早。被压缩掉的三公消费固然不合理,尚未压缩的三公消费未必都合理。靠党权力自我约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稍有松懈,便会反弹。如果真想解决问题,中纪委、监察部应当把各地区和部门三公消费的实在数字公布出来,不要光在百分比上做文章。

国家的财政部和地方的各级财政厅局,是专门管理钱袋子的部门,手里更不会没有相关账目。现在每年向两会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包括2010年的预算报告,都把公车购置和运行、公费出国、公务接待费用混在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国防这些大项里,即使有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可能看出来,公众更是一头雾水。人大代表审议财政收支,监督三公消费,就成了走过场,摆样子。

中国之所以出现三公消费膨胀的奇观,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国家征多少税,征来的钱怎么花,

无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公民只能履行纳税人的义务,却无从行使监督的权利。这种格局绝非中国的政治优势,而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现在中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某些地方政府在财政公开方面也有进步,向人大代表公布的预算开始细化。我建议,中央政府今年就责成财政部门专项公布三公消费的明细账。公布的方式可以通过纸质公报,也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方便所有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查询。网络不受篇幅限制,再厚的本子也能容纳。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真有诚意。如果再拖两年,政府换届,总理的公开承诺就没有意义了。

## 保障公民自由任重道远

● 毕星星

自由曾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字眼。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它就是反对封建领主的鲜亮口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它也是号召群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有力武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当时的热血青年不惜前仆后继。然而1949年以后,自由逐渐成了一个危险的字眼。谁要主张自由,等于把自己摆到了权力的对立面。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和前提”本来是强调个人自由的。而以往思想领域的若干次运动,也都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旨归。谁要讲自由,就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嫌疑。生生地把自由这个美好的人类理想,推到资产阶级那一面去了。为此,听到温家宝总理在近日和网民对话中,强调“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还是感到眼前一亮。

温家宝总理申明: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享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并不等于现实。且不说文革中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家主席照样被侮辱关押至死,即便在当下,无视宪法规定,随意侵害公民自由的事件还是屡

见不鲜。比如公民以言论获罪,比如通讯自由受到粗暴干涉,比如发一个不符合当地长官胃口的短信,立刻被公检法逮捕判刑,比如记者采写了某个地区的负面新闻,党政长官可以派出警察千里追捕。比如违法强制拆迁。比如在扫黄打非中随意干涉公民私密。民间力量得不到发育,民间组织发展受到压抑。至于游行示威,自打出台了一些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中国大陆的公民合法行使过游行示威的权利。显然,所有的游行示威都被视为不轨行为。这些地方法规的立法动机不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是让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被悬置。久而久之,

公民个人的自由意识也日趋淡薄,甚至视主张权利、主张自由为畏途。宪法规定的种种自由,无法行使,成为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能够重

申宪法和法律的应有之义,值得关注。

当今对公民自由的侵害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公权”侵害“私权”。任何侵犯公民权利公民自由的行为,一旦打着国家的旗号,冠以人民的名义,立刻冠冕堂皇畅通无阻。近期发生一系列国进民退、企业兼并重组事件,国企标榜“整合资源”,无所顾忌地吞并私营企业,公民的个人财产被堂而皇之地鲸吞,却求告无门。国家机关对于公民自由的侵害,往往打着“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旗号,使自己成为正义的化身。温家宝总理在对话中说,“整个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我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正确解读。自由至上,任何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不应受到妨害,哪怕施虐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现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在一些官员心目中,好像只有物质生产是实在的,公民自由此类问题虚幻不着边际。依我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样重要。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个人自由不断增大,公民自主性不断提升,公民的权利不受伤害,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环境里没有民主权利,不能自由言说,自由表达,自由发展,不能免除恐惧不安,那么,国家的GDP数据再高,有幸福便是有限的。(责任编辑 徐庆全)

# 追寻思想的光明

● 张宏遵

新世纪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时光总是以它匆匆的脚步，客观地丈量着人类的胸襟和智慧，公正地在岁月的年轮上镌刻下人类的每一段精彩，同时，也无情地记录下每段平庸和荒唐。

近三十年，中国人在探索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有着不俗的表现。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序靠前，从而确立了一个经济大国地位。奥运会、国庆六十年大阅兵，尽显豪情风光，让国人挣足了面子；全球金融风暴中，中国以8.7%的增长速度让世人另眼相看。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种种桂冠更令人心动神摇，感觉真好。

当我们沉醉于这些成就和赞赏的同时，静夜扪心，自当心知肚明，我们面临的难题不少，麻烦不断，矛盾多多。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执政党如何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如何认识和遵循执政规律、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我们仍停留在一个必然王国，远未获得认识和实践上的自由，以致每临大事常常表现得捉襟见肘，进退失据，宽严皆误。我们在取得某些进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陷入了泥淖，自觉不自觉地从一个迷失走入了另一种迷失，从一种束缚走入另一种束缚。现实生活中更是大面积、扩张式地呈现出权力崇拜，物欲横流，价值倾斜，信仰缺失，精神迷惘，恶俗泛滥，道德沦丧，底线坍塌，人性扭曲，斯文败坏的乱象。整个社会的精神层级和思想格调在矮化，在萎靡，在溃瘍。当一个民族仅仅靠着最原始的冲动来维系和动员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离精神的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

凡此种种，都冷峻地提醒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华民族，急需一种精神的引领和思想的光明，急需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邓小平生前曾经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

那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话，在当下颇有重要警示意义。

解放思想，一要解，二要放。解就是要解开枷锁，解除禁锢；放就是要放开眼界，放开脚步。今天，解放思想有不同于三十年前的地方，我们既要从小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不合时宜的理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特别要从狭隘的既得利益和平庸的政治短视困境中解放出来。

思想是不能禁锢的。解放思想就要破除迷信。要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的迷信，破除各种形式的个人迷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没有神，任何人都不能出口即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克思是科学家，不是佛祖禅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不是宗教教义。我们要当马克思的学生，正确的态度是学习马克思，实践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思想是不能垄断的。世界上正常人都会有一个脑袋，都会有一种思考，思想无法归于统一，定于一尊。说把思想统一到什么什么上来既无必要也做不到。在交流中丰富，在比较中鉴别，在撞击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是思想的内在逻辑。科学和真理不是按地位和权力来分配的。并不是谁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真理就越多。手里有没有真理，不能靠自我称许，也不能靠权力来裁决，只能让实践来证明。

思想是不能封闭的。解放思想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敢于吸收、借鉴、运用这些文明成果，是智慧的表现，是开明的表现，是有自信心的表现，是强大的表现。反之，拒绝、排斥、贬低这些文明成果，是愚昧的表现，是浅薄的表现，是狭隘、弱智、低能的表现。当然，借鉴、学习这种外来文明，一定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否则就会水土不服,出南橘北枳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所谓“中国特色”变成排斥外来文明、保护落后的代名词。

思想是不能控制的。解放思想就要解放嘴巴,就要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社会,不怕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就怕三缄其口、万马齐喑。要鼓励说真话,允许说错话,反对说假话,避免说大话、空话、套话。不允许说错话,等于不让人说话。封住人的嘴巴,有可能封住了一句错话,但也不可能封住了一条真理,同时也封住了通往真理的道路。

解放思想并不玄妙虚空。其要义在于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回归人性。真理是朴素的,人所共知的常识往往更接近真理。常识不一定就是真理,但一切荒诞的东西都是违背常识的。走近常识、尊重常识,也就是走近真理、尊重真理,偏离常识,常常就偏离了真理。规律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执政党有其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有其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发展规律。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我们的认识、决策、行动尽可能地符合客观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承认不承认,它都起作用。谁嘲弄规律,就会被规律所嘲弄。是否掌握了规律,自己认为不算数,要靠实践检验。至于讲人性,就是要以人为本。我们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人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全部目的和归宿。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正义、人道主义,是人类的天性。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就是不断实现和满足人们的这种人性化诉求。与此相悖的,专制、特权、奴役、剥夺、等级、尊卑、歧视、压迫,都是反人性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美好,正在于它能提供

和创造最符合人性的东西,否则它就一无可取。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我们的认识更合乎人性要求。否则,这种解放就没有意义。

解放思想就要知行统一。解放思想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应该是行动准则。一打宣言,不如一个实际步骤。不能将解放思想仅仅写在纸上,印在书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如果那样,解放思想就成了一种装潢,一种政治语言秀。

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亿万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思想的主体。解放思想,创新思想,不是几个天才人物的专利,而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离开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思考,解放思想就是空话。

当前,国际金融风暴未平,世界风云际会,各种思潮汹涌激荡。当此之时,我们需要企业家、实业家,同时也需要政治家、思想家。因为思想家是引领人们走出黑暗的灯塔,是照亮人类心灵和智慧的火炬。一个没有思想光明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思想光明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如果说,政治家是以审时度势、选择航道把握未来,企业家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奠基未来,那么,思想家便是仰望天空,追寻北斗,照明未来。神州大地思想真正解放之日,就是东方巨狮醒来之时,中华民族振兴之时。

中国未来的前途在哪里?借用一句诗人的话说,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这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在哪里,在我们十三亿中华儿女追求思想解放、追求思想光明的不懈奋斗之中!

(作者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人日报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 “高沟事件”始末

● 王永华

江苏省涟水县高沟镇，历史上是有名的美酒之乡。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教运动中，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闻名全国的政治风波，即“高沟事件”。然而，长期以来，该事件在共和国史书乃至江苏地方史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及一些亲历者回忆录的逐渐问世，我们对这起事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地方志和个人回忆录的梳理，试对“高沟事件”做一揭示。

## 一、社教工作队与基层干部的重大分歧

按照中央“前十条”精神，1963 年 7 月起江苏省四清运动试点正式铺开。11 月中旬淮阴地委组织了 200 多人的社教工作队进驻涟水县高沟公社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试点。到 1964 年 3 月底工作队撤离，该阶段的运动历时 4 个半月。

四清运动工作队进驻高沟公社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双十条”，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清理的结果，认定绝大多数干部存在严重经济问题。据第 41 期《农村社教运动通讯》所记：大队、生产队干部大吃大喝浪费的粮食 54 万斤，肉 1 万多斤，酒 1 万多斤，钱 10 多万元。绝大多数大队，在生产队核算后，大队干部仍然实行吃饭不要钱。全公社无限制扩大小私有土地的形式达 20 多种；有 30% 的生产队，小私有土地占耕地面积 15% 以上。公社平调大队的粮食，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粮食、种子、土地、劳力、资金、物资等等来搞大队的“集体副业”，而这些“副业”的收入，很少分给社员，多数被大队干部挥霍浪费掉。据此，工作队认为高沟公社的阶级斗争及阶级斗争在党内、干部队伍内的反

映是严重的，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然而，工作队在运动中没有遵照“前十条”关于必须团结“两个 95%”（即团结 95% 的干部和 95% 的群众）的规定，而是凌驾于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之上，包办代替，利用贫协组织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进行监督，乃至限制干部的人身自由，开干部的批斗会、算帐会，搞扩大化和逼供信。而有些贫协组织的成员思想素质较低，揭发出来干部的许多所谓“问题”中，纠缠着个人的历史恩怨，而在运动中却一律以阶级斗争问题看待，从而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据第 34 期《农村社教运动简报》所载：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 1345 人，被认定犯有严重问题和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有 261 人，在运动中被行政开除的有 10 人，受到其他行政处分的有 8 人；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和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有 167 人，占党员总数的 32%，在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有 32 人，留党察看的有 12 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的有 21 人。

在社教运动中，在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上，社教工作队与公社党委存在严重分歧：要不要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工作队是不是一切要通过和依靠党支部与基层干部？对干部的说服教育是不是取消思想斗争，要不要依靠贫下中农，要不要发动群众？对干部“四不清”的经济退赔是应当从严还是应当从宽？运动后期，对少数坏干部，要不要调整其领导职务？运动是妨碍生产，还是促进生产？上述分歧造成工作队和当地干部严重对立，运动结束工作队撤离高沟镇后，矛盾终于爆发，有些基层干部对贫协组织、对贫下中农进行“打击报复”、“反清算”。据第 34 期《农村社教运动简报》所载：至 1964 年 7 月中旬，打击报复贫下中农事件已发展到 18 起，遭到打击报复的贫下中农有 531 户，其中遭绑吊打的 74 人（内有被打伤的 13 人，

被打流产的2人) ,被克扣口粮、扣工分罚款的199人 ,被逼外流的83人。因扣口粮而浮肿的23人 ,被逼自杀未成的3人 ,被诬陷的29人。之后 ,淮阴地委、涟水县委、高沟公社党委处理了5件。这就是“高沟事件”。

## 二、“高沟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

1964年7月2日到8月8日 ,江苏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会。7月21日 ,在这次会议

分组讨论中对高沟社教发生争论 ,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在淮阴专区小组会上做了《一场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发言 ,总结了经验教训 :要彻底解决公社党委的问题 ,要自始至终地发动群众 ,要善始善终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 ,要追根子。这篇“上网上线”的发言 ,与当时正在南京视察四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思路是吻合的。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 ,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会后 ,刘少奇视察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等地 ,对四清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中回忆 ,刘少奇在南京视察期间发表了多次讲话。刘少奇认为 ,“也许不止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干部 ,占基层干部的多数 ,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干部很少 ;因此 ,如何认识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依靠”的关系 ,应该是“靠得住就靠 ,不可靠就不靠” ,而且“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 ,再来依靠”。刘少奇还提出了著名的“追根子”说法 :生产队有严重问题 ,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 ,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 ,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 ,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 ,不可不追。



刘少奇的讲话对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在会上作的《一场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发言 ,受到刘少奇赞赏。江苏省委将这场争论整理成会议纪要送中央领导审阅 ,7月29日 ,王光美打电话给江渭清 ,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 :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8月下旬 ,在中央召开的六个大区的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的负责干部座谈会上 ,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

按照著名党史专家高华在《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一文中的看法 ,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为顺应中央“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 ,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 ,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 ,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 ,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中还道出了刘少奇抓“高沟事件”的另一层原因。刘少奇在南京批评了江苏的社教运动 ,江渭清向刘少奇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 ,江渭清坚持说 ,不能这么讲 ,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 ,60%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 ,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 :“你这是没有下去 ,不知道实际 ,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 ,回答 :“我经常下去 ,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 ,江渭清

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什么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

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8月22日，江苏省委批转《淮阴地委张景良同志在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批语中提到：“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发生十几起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事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个事件说明，高沟公社党委、涟水县委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高沟公社党委对待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直是抵触和反对的。而涟水县委没有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对打击报复事件又未能及时制止，客观上纵容包庇了坏人坏事。”“在运动中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及时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严肃处理，以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维护革命群众的利益。”但是中央认为这个批语是“不够坚定明确的”，江苏省委随之检讨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质缺乏深刻地分析”，“对中央、主席、少奇同志的指示领会不深”。

9月2日，中央发出539号文件转发湖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和江苏张景良的“发言”。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张景良的发言是一篇很好的发言，要求对“高沟事件”按现行反革命事件处理。

9月22日，江苏省委正式作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决定，并向中央和华东局作了报告。江苏省委在《关于处理涟水县高沟公社反革命事件的报告》中进一步认定，高沟公社的打击报复事件是以蜕化变质分子、地富反坏分子为首，纠合一部分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和投机倒把分子，为反对“四清”、反对贫下中农掌权、破坏社教运动成果所进行的反革命复辟行为。“高沟事件”实质上是一场

“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在这一处理决定中，省委指出：现在既然阶级敌人摆开阵势向我们反扑，我们也就应当摆开阵势进行反击。鉴于此，为了夺回公社领导权，省委派出淮阴地委第二书记杜文白、地委秘书长张景良、省监委副书记康迪率领工作组前往处理。工作组到高沟公社后，先后召开公社党委会议、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以及大队的支部大会，对事件的嫌疑人和责任人进行了组织处理。据《江苏省农村社教运动大事记》载：到9月30日止，先后处理结束30起，共有23个干部被处理，其中撤职18人、开除党籍3人、逮捕法办2人；另外32起正在处理。撤消高沟公社党委书记司德义、副书记万百川、副社长李云亮的职务，涟水县委书记孙燮华以及县委常委、副县长秦达志均停职检查。

### 三、高沟社教被推倒重来

省委工作组确定对高沟社教推倒重来，由工作队在高沟镇代替包办一切。工作队领导人在运动中“宁左勿右”，提出“刨根子”、“挖须子”等口号，以“夺权”为重要内容，采取敌对待我矛盾的方法，把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普遍提高到“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上来进行斗争。据1964年12月25日《社教情况简报》载：全公社21个有夺权斗争对象的大队，有16个单位已基本进入高潮，2个单位向高潮发展；夺权的对象，一般都斗争了四五次，重点对象已斗过七八场。斗争手段主要以“打蛇先打头”的办法，集中力量首先斗倒主要“敌人”；少数大队采取从下向上搞的办法，先斩断主要“敌人”的须子，然后集中力量围剿“首恶”。

在省委、地委不断“升温”、“加压”推波助澜下，1964年11月省地两级又从各地抽调10591人组成的工作队，由地委书记孙振华、省委监委副书记康迪带队到涟水蹲点，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也来到涟水，进行第二次社教运动。在第二次高沟社教运动中，一大批干部受到打击。据当时总结材料称：全公社被逮捕17人、被判刑9人、被定反坏分子交地方监改5人。先后受处理的党员干部296人，受撤职以上党纪处分78人，其中清除出党13人、开除党籍52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4

人。党员劝退 91 人,预备党员除名 19 人,党员不予登记 6 人,党员暂缓登记 52 人。运动中受审查的人员及其亲属自杀的 6 人。

“高沟事件”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一起后果严重的冤案。它不仅使得一批基层干部群众遭受打击迫害,而且对于推动江苏省四清运动向着“左”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高沟事件”影响,江苏省又相继出现了沛县“龙垌事件”、无锡县“安镇事件”等“反革命事件”。

高沟社教运动结束不久,就有不少人向当地党委、政府来信来访,要求对这起案件进行复查。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 年 5 月 9

日淮阴地委和涟水县委才开始深入调查,并进行详细的档案清理。据《涟水县志》记载:1980 年 2 月淮阴地委向江苏省委作了复查结果报告。1980 年 6 月 13 日,江苏省委根据实事求是精神与有错必纠原则,批准“高沟事件”的复查报告,正式发出《关于对“高沟事件”平反的通知》,对“高沟事件”中在政治上受迫害的县委书记孙燮华、副县长秦达志、公社书记司德义等 5 人及其他受牵连的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吴江文稿(全三册)	俞可平主编	200.00	18.00
李昌传	周士元	68.00	8.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上、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	侯井天	98.00	11.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上下)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	杨继绳	39.80	8.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6.00	7.00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7.00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一场突破禁区与僵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身处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大讨论的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回顾 30 年前的讨论内幕。

《走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北京市内乘车路线:公交车 13 路、21 路、32 路、65 路、68 路在三里河东口站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

#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 杜奎昌

上个世纪初以云南为中心发生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打倒了废弃民国、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为捍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曾参与过其事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期间或护国运动结束之后，通过写文章、发表讲演或与记者谈话等各种方式，说了不少有悖于护国运动真实情况的言论，这就为后人如何正确认识或评价护国运动留下了许多谜团。本文笔者近年来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对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有关言论作了一番研究，于此产生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简要介绍于下，敬请方家指正。

## （一）发贺电催促蔡锷及云南军民匆忙起义

1915年8月，当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的行径制造舆论时，梁启超便在他的天津寓所同前云南都督、时任北洋政府经界局督办的蔡锷，以及前贵州巡按使、时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的戴戡等人，商讨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并决定由蔡锷回昆明依靠具有革命思想的云南军民，首先在云南发起讨袁的军事行动。据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府公报》第43册收录的资料表明，蔡锷是1915年11月中旬在向袁世凯请假并得到批准后到天津治病的情况下，由戴戡等人陪同于11月19日离开天津潜往日本，继而从日本经上海、香港以及越南海防等地，于12月19日这一天到达昆明的。

蔡锷出走日本之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天津于12月18日到了上海。当梁启超获悉蔡锷已经到达昆明的消息后，便前往南京，通过由冯国璋执掌大权的江苏督军行署，于12月20日给蔡锷发来谎称冯国璋已起兵讨袁，催促蔡锷和云南军民也要赶快揭竿而起的电报。梁启超的这个电报是这样行文的：“宁已起兵，望公速发。”按当时用韵目代日标明发报日期的做法，20日的韵目为“哿”，所以梁启超把他的这个电报称做“哿电”。电报中的“宁”字，是南京别称的用语，这里用来指代冯国璋。当时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尽管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持有不同看法，但不论是当时还是在整个护国运动期间，他都没有起兵讨袁的这种迹象。

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在天津商议讨袁的同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以及云南军民，也正在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酝酿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按照唐继尧及其僚属拟订的计划，先把滇军以剿匪的名义移到滇川交界的地方，待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做“洪宪皇帝”之后再宣布对他进行讨伐。蔡锷是辛亥革命后云南的首任都督，他的到来对云南军民的反袁斗争无疑起到了推动和鼓舞的作用。当蔡锷收到梁启超12月20日由南京发来的电报之后，他和唐继尧等人便决定把起兵讨袁一事提前来进行，12月22日晚间，39名省内外军政要员聚义于昆明五华山光复楼督军行署礼堂，歃血盟誓，共商有关事宜，然后于次日以唐继尧、任可澄（云南巡按使）两人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去劝告他取消帝制、惩办杨度等帝制祸首，并要求“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的电报，25日不见袁世凯有任何反应，于是于当日发出由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贵州督军）、蔡锷、戴戡共同署名的讨袁通电，从

而揭开了云南首义护国运动的序幕。

时隔不久,当梁启超发觉他的笞电可能会对云南起兵讨袁造成不利影响这种情况时,便在1916年1月8日给蔡锷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检讨:“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笞电。”“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笞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果尔,则吾罪真未由自赎。”

云南揭开护国运动序幕之后,由蔡锷统领的护国第一军下辖的六个步兵团和一些炮兵部队,便陆续向川南进发开始北伐讨袁,但由于遭到北洋军的抗拒,除了唐继尧最先派出的两个团于1916年1月21日攻占宜宾外,其余部队均被堵在泸州外围长江以南的纳溪等地。3月初宜宾、纳溪被北洋军收复后,蔡锷只好命令护国军后撤到大洲驿等地防守。因此,蔡锷在他1916年3月31日发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说了这样的话:“此次出征,师行未能大畅,实因宣布过早,动员缓慢,出师计划未尽协宜,以致与京津所预想者竟相啮衄。”

## (二)抢先发表代云贵两省起草的讨袁电文初稿

蔡锷、戴戡1915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的時候,带来了梁启超事先代云南、贵州起草的三篇讨袁电文初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云贵致各省通电》。是梁启超一厢情愿代云南和贵州起草了这样三篇讨袁电文初稿,还是云贵有关人士通过何种渠道托他这样做的,其历史依据现在都已无从查考。

蔡锷收到梁启超12月20日由南京发来的笞电之后,云南正式把起兵讨袁一事提到日程上来,匆忙间将梁启超代起草的前两文合并在一起,经过删节、补充和修改,并按照当时正规电文款式的要求加上必要的用语,形成了于12月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发出的《致袁世凯请取消帝制并严惩帝制祸首电》这篇电文。12月25日云南发出的《为讨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致各省军政长官电》这篇电文,也是在梁启超代起草的第三篇文稿的基础上,经过删节、补充和修改,并按照当时正规电文款式的要



梁启超(1873-1929)

求加上必要的用语后而形成的。由于当时时兴用韵目代日来标明发报日期的做法,因23日的韵目为“漾”,25日的韵目为“有”,所以云南这两通讨袁电文被分别称之为“漾电”和“有电”。

当年曾参加过云南首义讨袁几次会议的但懋辛,后来在他撰写的《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成立》一文中,还记述了当时与会人士争论要不要对梁文加以修改的一段小插曲:“随后由戴戡将梁启超所拟的讨袁通电稿拿出来念了一遍,大家都说好,但认为目前情况与拟电时稍有不同,须略加修改。戴戡说任公(梁启超的别号)的文章,旁人何敢改动一字,须电请他自己改。有人说这不是改文义,而是人事变动,只改点名词,时间迫促,无须周折。李烈钧说,可以不必,在座的任可澄先生就是大笔手,请他改几个字,恐怕任公也不会不满吧?大家同意而罢。”现在将“漾电”、“有电”与梁启超代拟的三篇初稿相对照,当时改动的结果并不仅仅只是“改点名词”、“改几个字”,而是动了比较大的手术。

护国运动初期云南发出的“漾”、“有”两电,由于遭到袁世凯北洋政府和其他省份的严密封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被公诸于世为众人知晓。当时昆明出版的《义声报》虽然刊登了“漾”、“有”两电,但由于云南闭塞和政治上的因素,该

报发行范围极为有限，在全国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当梁启超得知云南起兵讨袁的消息后，便将他代为草拟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两文，在未标明发报日期的情况下，于12月26日抢先同时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接着又于12月28日以同样的手法将他代为草拟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一文，在《时事新报》上加以发表。护国运动刚刚结束的1916年秋天，梁启超在编辑出版他的《盾鼻集》一书时，尽管在上述三文题目下分别冠上了“代”字这样的名分，但仍将这三篇电文初稿原封不动地编入该书，在全国广为流传。这就给后来研究护国运动的史学家和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到底哪才是真正的云南首义讨袁的电文，有的人甚至干脆把梁启超代拟的电文初稿，当成云南首义讨袁的电文来加以引用，并由此做出梁启超“策划和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这样的结论。

### （三）贬低唐继尧为自己和蔡锷开脱责任

云南在酝酿护国讨袁之际，时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认为蔡锷过去曾经是他的上级，现在远道而来，身体又不大好，因而力主由他带兵出征，让蔡锷坐镇后方统筹一切，蔡锷为了避免“占位置”之嫌，则主张由他带兵上前线去打仗。最后按照与会各军政要员的意见，唐继尧留守，蔡锷作为云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统率大部分滇军经四川北伐讨袁。

当时，云南组建有八个步兵团、一个炮团和两个警卫团，总计不到两万兵力的正规部队。起义之后，唐继尧除了把事先已经出发的步兵第一团、第七团划归护国第一军建制外，还把步兵第二团、第八团和新组建的步兵第九团、第十团，以及大部分炮兵部队也划归第一军建制。护国军兴，云南将团的建制改为支队，将旅的建制改为梯团，所以护国第一军由六个支队、三个梯团组成（每个梯团下辖两个支队）。为了支援贵州北伐讨袁，滇军第四团开赴黔北松坎地区，其余三个步兵团和两个警卫团，则分别编入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向两广出兵的护国第二军，以及由唐继尧

兼任总司令、负责保卫云南后方的护国第三军。

在梁启超胥电的催促下，云南匆忙起兵讨袁，这就给部队的调动和军需物资的准备，造成了一时难以应付的种种困难。比如，滇军步兵第二团是1916年1月10日才从昆明出发的，由朱德任团长、新组建的滇军第十团，则是到了1916年的1月18日才从昆明出发的。蔡锷本人，也是到了1916年的1月16日才离开昆明赶赴前线。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兵讨袁之后，袁世凯很快调动北洋三师、六师、七师、八师，以及广东陆军第一师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开赴前线，分别从四川、贵州、广西三个方向形成包抄云南的态势。因此，当1916年2月上旬蔡锷跟随云南护国第一军的另外几个支队赶到川南纳溪，与刘存厚率领的四川护国军汇合向泸州发动攻击时，北洋军和部分拥袁川军已基本上在泸州布下坚固的防线。这之后护国军与敌军各有胜负的战事，在长江以南的纳溪等地成胶着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护国军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帝制，蔡锷于是派人前往泸州同北洋七师师长张敬尧商定，从3月31日起彼此停战一周，继而双方的停战一直延续到6月6日袁世凯病故。

蔡锷率领的云南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作战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梁启超从南京发来胥电催促蔡锷及云南军民匆忙起义，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可是，梁启超却把这方面的责任，全都一股脑推到唐继尧的身上。1922年12月25日他在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的讲演时，就闪烁其词说了这样一段影射唐继尧的话：“我们这几个月的计划，本来预定举义后半个月，我们的兵便到重庆，料定袁世凯调将遣兵，抢不过我们的先着。但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1926年梁启超在为蔡锷编辑出版《松坡军中墨迹》一书时，又在编入该书的一纸所谓《泸州会议兵数计划稿》这样一个材料上，作了这样一段签注：“此一纸非函非电，乃最初由滇出军时所编梯团之分配单。偶藏杂其他纸堆中未散失者，辄附印于此。此即致余

书中所谓第一梯团、第二梯团也。滇中所拨予松公之兵止此。以三千一百三十人当大敌十余万，志决身殀军务劳，悲夫。”

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并未到过云南，虽然他通过蔡锷、唐继尧等人写去的信或拍发的电报，略知云南起兵讨袁的一些概况，但许多事理他是不知底细的，上述两段引语表述的内容就跟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当时，云南的兵权掌握在唐继尧手上，恐怕蔡锷也不便避开唐继尧就往大理府一带去调兵，况且当时驻大理的滇军第四团，后来并不是编入护国第一军序列的一支部队。据蔡锷当时的副官邹若衡和其他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蔡锷统率的第一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共三个梯团”，“人数总计不到一万人”，这支部队使用的枪支大多数是从德国或日本进口的新式武器，而且还配备有大炮和机关枪，并不是像梁启超说的是一支由“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组建起来的不成体统的护国军部队。另据蔡锷当时的随员石陶钧后来撰文介绍，梁启超所谓《泸州会议计划兵数稿》这个材料，实际上是1916年3月上旬护国军从纳溪等地败退到大洲驿之后，蔡锷在3月12日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所作的记录。当时，云南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作战一月有余，人员已经有很大伤亡，何况这时又被北洋军打得五零四散，蔡锷笔下的这个记录恐怕也不周全。至于梁启超干脆把这个材料里统计的“三千一百三十人”，当作蔡锷从昆明带出去的所有滇军的兵力总数，那更是出于他中伤唐继尧掣肘蔡锷出兵讨袁这种用意的一派胡言乱语。梁启超一面把蔡锷统领的云南护国第一军的兵力尽量往少里说，一面又极力夸大当时在泸州一带的敌军的兵力。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护国战争期间在泸州一带防堵护国军的北洋军及部分拥袁川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三四万人，根本不存在“大敌十余万”这种情况。

#### （四）把广西起兵讨袁的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

云南于1915年12月25日揭开护国运动序幕之后，尽管贵州于1916年1月27日才正式响应，广西到了1916年3月15日才宣布起兵讨

袁，但从此云南、贵州、广西联成一片，壮大了护国运动的声威。

梁启超与广西起兵讨袁的关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是他于1916年1月25日给未曾见过的广西督军陆荣廷，写了一封约三千字（实际不到两千字）的长信，力劝陆荣廷权衡利弊得失，继云南之后早树义旗；二是他于这年的2月下旬应陆荣廷代表陈协五、唐伯珊之约，于3月初与汤觉顿、吴柳隅等一行七人，从上海经香港等地前来广西襄助义举。

对于广西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梁启超在他1916年3月17日写的《从军日记》（即记述他从上海前往广西的过程中由沪至越北帽溪山庄这段经历的作品），以及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他撰著的《国体战争躬历谈》和讲演稿《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三篇文章中，都抓住要害作了概略的交代。在《从军日记》一文中他是这样写的：“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干卿（陆荣廷的表字）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至今年二月下旬，陆君遣人来迎余入广西，谓俟余至，乃宣布独立，余闻令即行。”1922年12月25日在向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一讲演时，梁启超又这样说：“到三月中旬，陆君忽然派一军官姓唐的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到广西去他才独立。我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早上发表。”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发表”，即发表宣布起兵讨袁的通电。由此看出，梁启超把他对于广西起兵讨袁的身价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似乎离开他梁启超，广西起兵讨袁的事情就搞不起来。

应陆荣廷之约，梁启超于1916年3月4日带领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吴柳隅、唐伯珊乘日轮离开上海，3月7日他们到达香港后面对袁世凯密探的监视、办理护照也相当困难这种情况，只好分散行动。于是，汤觉顿带上梁启超把他的名字列于陆荣廷之后而起草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两文，同唐伯珊一起乘船经广州前往广西梧州、南宁；梁启超和黄溯初藏匿于一日本人运煤的轮船舱内，由香港前往越南海防，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继续留在香港，待机行事。3月16日梁启超、黄溯初到

达海防后,黄溯初按原计划乘坐滇越铁路火车来昆明,梁启超则由海防转移到越北帽溪山庄一日本人开办的牧场里住了十来天,然后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广西,于4月4日到达南宁。

广西有如“十月怀胎”经过较长时间准备而起兵讨袁的行动,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还与各方面反袁人士的大力促进有关。1915年冬天,正当各种进步力量酝酿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的紧要关头,黄兴就从海外致信陆荣廷,动员他“早兴讨袁之师”;国民党方面还专门从香港派遣钮永建、林虎冒险潜入南宁,间接向陆荣廷转述了兴师讨袁的种种信息。1916年2月中旬,陆荣廷也派他的亲信曾彦来到昆明,跟唐继尧联系过广西起兵讨袁的事宜。但陆荣廷的行动,也受到了袁世凯的钳制。云南起义之后,袁世凯除了调集北洋三师、六师、七师、八师等部,组成由四川、贵州两个方向包抄云南的一二两路人马外,还于1916年1月23日任命陆荣廷的滇籍亲家公、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为“云南宣抚使”(继后又于2月8日改为“云南查办使”),让龙觐光带领四千广东部队并携带大批武器、军服进入广西,然后在广西境内招兵扩军,组成近万兵力的包抄云南的第三路人马。1916年2月底3月初,当李烈钧率领的云南护国第二军进至滇东南和桂西地区时,陆荣廷这才命令他的部队和云南护国军一起解决了龙觐光设在百色的征滇指挥部。与此同时,陆荣廷利用袁世凯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的这一机会,摆出讨黔的架势,于3月11日由南宁带兵前往柳州,并于3月15日在柳州向全国发出讨袁通电。陆荣廷还另发电报,将该电全文分别向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以及滇黔护国军各司令作了通报。3月15日这天,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第二师师长谭浩明、桂平镇守使莫荣新及全体军民,也在南宁向全国发出了宣布起兵讨袁、拥戴陆荣廷为广西护国军都督的通电。广西的这两通讨袁通电,都是用表示(3月)15日的“咸”这个韵目来标明发报日期的,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之为“两咸电”。

陆荣廷以及陈炳焜等人分别在柳州、南宁于1916年3月15日发出的讨袁通电,当时昆明出版的《义声报》就刊载过,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

社出版的《护国讨袁亲历记》、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三种典籍,也都分别一一加以录入。细观见诸于上述报纸、典籍的广西起兵讨袁的两通电文,其风格及行文用语跟梁启超在香港交给汤觉顿带往南宁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这两篇文章中的任何一篇都全然不同。据广西有关人士回忆,陆荣廷以及陈炳焜等人的讨袁通电,分别是他们各自的秘书起草的。可是,当广西宣布起兵讨袁之后的3月20日和21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在没有标明发报日期的情况下,抢先依次发表了梁启超起草的两篇广西讨袁电文。1916年9月,梁启超在编辑出版他的《盾鼻集》一书时,不再像收录他为云贵起草的三篇电文那样,还分别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加上个“代”字,而是以主事人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将这两篇文章编入该书。

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一书,其作者在谈到梁启超跟广西兴师讨袁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早在梁启超抵海防前的14日,汤觉顿一行已抵达南宁,谒见了陆荣廷。陆得知梁启超已在赴桂途中,遂于3月15日发出了由梁代拟的广西独立通电。”陆荣廷已在3月11日这天由南宁去了柳州,汤觉顿还哪里能在南宁“谒见”陆荣廷呢?陆荣廷家乡的广西武鸣县政府和县政协,曾于1995年邀集区内外百余名学者举办过一次陆荣廷学术研讨活动,并将部分论文结集为《陆荣廷新论》一书出版行世。可是与会学者仍把梁启超起草的两篇文章当作广西起兵讨袁的电文加以大吹特吹,而对体现陆荣廷自身在护国运动中一大亮点的那份广西真正的讨袁通电却只字不提,这就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 (五)《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非讨袁序曲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写于1915年秋天,并刊载于当年8月22日上海出版的《大中华》杂志第8期。对于此文,梁启超在护国运动结束后撰著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一稿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

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章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1922年12月25日在向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一讲演时,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袁世凯总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了当时最难缠最可怕的,就是我和蔡公师弟两个。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他太看人不起,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绝,把十万块钱璧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即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大概由于当时梁启超这么一吹,所以最近一些年来不少史家也就把该文的出现,评价为“犹如金鸡一鸣,给帝制派当头一棒”;“成为护国讨袁斗争嘹亮的序曲”;“标志着梁启超公然亮出了反袁的旗帜,公开走上了反袁的道路”。本文笔者则认为,这是一篇以反对帝制派变更国体的某些行径做幌子,实为鼓吹梁启超主张让袁世凯在现行国体,即共和制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让他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之际再来复辟帝制这样一种宗旨的文章。

该文在反驳帝制派认为“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这一论点时,这样写道:“我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该文在反驳主张变更国体的人担心如果继续实行共和制则在“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这一

论点时,这样写道:“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之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细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尽管梁启超在自相矛盾的狡辩中极力摆出捍卫共和国体的架式,振振有词说了类似“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孰谓共和利害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这样一些豪言壮语,但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仍然是敌视共和、希望恢复帝制这种意识。当他处于“既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这样一种绝望心境时,便把复辟帝制的理想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于是他这样写道:“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具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据割,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子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

本文写到这里,笔者心里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这样来看待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大作对吗?

(作者为新华社云南分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羈居越南的三万国民党军

● 毛德传

1949年12月,国民党军在湖南、广西、云南兵败后,有成建制部队三万多官兵退入法殖越南,居留长达三年六个月。

—

蒋介石嫡系黄杰第一兵团于湘桂作战失利,余众17000人由昆仑关西撤。12月4日决定沿桂越边开进云南,突闻百色已为解放军攻取,12月9日又悉云南卢汉“投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电示黄杰,当前情势“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以安全为第一”,争取转进海南岛。陈诚自台北电黄称:“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情况看,恐事实上难于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黄杰召集团以上军官会商,一致决心“假道入越,转运回台”。黄遂电禀陈、白,并派员致文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比荣和驻越法军总司令班加吉中将洽假道事宜。12月12日,由黄兵团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谅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法方同意“国军”假道,由越南海防转运台湾。国民党军以500人为一队入越,武器暂由法军封存,法方负责沿途安全警戒及提供食品,国民党军保证纪律严明,不扰法越民商。

黄杰所部经宁明抵达边境爱店,该村与法军筑有碉堡工事的峙马屯相望,中间为隘谷成天然分界。1949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按先眷属、平民,次伤病(法方派有卡车载运病弱),后官兵,自爱店陆续过界。见前面飘蓝、白、红三色法兰西旗,回首再望,不知何年何月重见祖国故乡!死不伤悲。除黄兵团官兵,还有随行湘桂地方团队游杂、警察、流亡学生和平民(后述桂系部队及26军入越,也有上述人员同行),经禄平、谅山于12月18日抵达法方指定的蒙阳,即为法军监管软禁。

蒙阳是废弃煤矿,因三面环山,即使大晴天也只有中午才能见一丝阳光,故名。但见荒烟蔓草,荆棘丛生,蚊蝇蛇鼠呈虐,既无房舍也无水电。官兵人等上山砍木斩草搭建草棚,半个月后稍安顿。法军常来搜抄,银元手表亦夺取。主食法方仅供每人每天米4两,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亡不断。

再,李宗仁、白崇禧赖以纵横神州三十年素号精锐的桂系部队,于1949年下半年遭解放军全歼,灰飞烟灭。桂系残军,主要是张淦三兵团126军张泽湘和徐启明十兵团46军谭何易各一部,由龙州逃入越南,两广地方团队跟进,共万余人,由法军遣去莱姆法郎居住。越北该地自然环境好于蒙阳,生活遭遇与黄杰部同。

又,中央军嫡系26军一部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统率,由云南奔窜越北莱州,为法军送金兰湾羈居。

另外,由越南国民党首领武鸿卿收编广西鲁道源十一兵团一部,组编为越南建国军保大警卫旅,由水口关进越。法帝殖民当局不同意保大皇家编制,将其送到蒙阳。

至1950年1月底,退逃越南的国民党军共33400余人。

此后,又有蒋嫡系余程万留滇东南游击的272师残部2000余人,遭解放军追剿,逃到中越边。1951年7月12日偷渡红河时,为胡志明武元甲越盟武装伏击,师长余启佑坠河死。过河入越后,只剩1023人,由师参谋长张亚龙率队,于1951年7月底抵富国岛。

二

国民党军入越,我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法越当局,指出导致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法方承担。

1950年上半年,驻印支法国殖民军与越盟战

事失利,在越北失主控制力势趋危殆。蒙阳及莱姆法郎处战火边沿又毗近广西,法军感受中共军队和越共武装的威胁,乃将入越国民党军迁禁于西南边远的富国岛,住阳东、介多两营区;1950年8月14日—9月3日,船航南运。

富国岛东邻暹罗湾,面积60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大小金门岛;有居民八千,内华侨近千人。该岛位南海与印度洋交界处,战略位置冲要。日俄战争时,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起航驰援远东,曾泊此岛整补;北航至对马海峡,与日本联合舰队海战全部覆灭。“二战”时,日军席卷东南亚,曾将富国岛作为战略物资储存补给基地,筑有机场。“二战”结束,法帝国主义重占越南,于富国岛驻有法兰西远征军(含摩洛哥、喀麦隆、法属刚果非洲士兵)。富国岛碧海蓝天,椰树婆娑,有日军遗留若干营房。气候炎热,蚊子特多又凶,一巴掌打去少是三五只,多则十几只,瘟病流行。岛上山区系原始森林。国军官兵到此异域蛮荒,头一件大事是向大自然斗争。火烧烟熏,填沟平洼,进深山伐木取藤,兴建成片茅棚房等栖身,大力开发,使富国岛渐离不毛。

在蒙阳和莱姆法郎时,法方欲驱迫“华军”做苦役,但惧中国人团结有力,不敢强逼。为适应环境,仍允派出2000多人(以广西籍为多)到鸿基煤矿和柬埔寨橡胶厂做工。1950年3月,黄杰派员去台湾向蒋介石报告情况。4月13日,蒋致电台湾驻河内总领事馆转黄杰诸人慰勉,孤军远寄艰苦备尝,并发犒赏金2万美元。国民党军迁居富国岛前,朝鲜战争已爆发,美海空军协防台湾,予蒋军援经援。蒋介石政权垂死回生,于1950年10月派国策顾问林蔚“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空军少将”一行专程富国岛宣慰。自此,留越官兵处境生活有改善,可领衣服、书籍、药品,每人每月发越币30盾津贴零用。此后,不时有台湾“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及社会名人来慰。富国岛地近芽庄旅游胜地及柬埔寨金磅逊港,亦有欧美游客政要闻讯来访。羁越官兵保持了建制,与岛民相处和睦,还受西贡堤岸、河内、顺化华侨出于同胞的照应。

### 三

1950年12月,蒋介石任命黄杰“中将”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官”,辖三个管训处,下设总队、大队、中队编制(相当于团、营、连),学习训练生活有序。

黄杰,字达云,是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抗日名将。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黄为中央军第2师中将师长,在南天门、八道楼子抗击来侵日寇。1937年,任税警总团长(时,孙立人为所部上校团长),参战淞沪。1944年,黄杰任远征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反攻滇西歼敌,光复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在缅北与美英盟军和中国驻印军胜利会师。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长沙起义,蒋介石立即任命黄杰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兼湖南省主席。黄杰策动陈明仁辖若干军、师反水,弃陈奔黄拥蒋,黄杰重组第一兵团,湘桂战败入越。

副司令官彭佐熙“中将”,广东罗定人,黄埔二期。

副司令官王天佐“中将”,山东单县人,出身保定军校三期,1947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参谋长何竹本“少将”,湖南醴陵人,黄埔六期,曾任18军49师师长战徐蚌。

政治部主任谢惕乾“少将”,湖南湘潭人,黄埔六期,曾任县长、师长。

黄杰部组织进山伐木,建好民房营舍,造好可容2500人的木棚中山堂;对军官士兵轮训,以木制坦克、枪炮练兵;开办国文及英法日越语进修班;开办中华学校、豫衡联中(师资有的是),培育随军小孩、学生,岛上华侨也送子弟入学;办起油印《护国报》;组建了中州豫剧团(台湾“海军陆战队”飞马豫剧团的前身)。修整富国岛阳东机场,已可起降中型客机。有黄杰诗《富国行》,“编茅以为屋,削木以为兵,晨闻闻号令,夜半有书声。征衣慰游子,温于父母情,长幼皆有序,众志成城。”

朝鲜战争扩大,华盛顿和巴黎曾多次磋商留越“国军”处置问题。美方提议,武装部分“国军”加入与越盟作战。法国顾忌由此会引发中共军队介入越法战争,拒之。法国未能强制国民党军遣返大陆,又不送去台湾,欲用做棋子,望取法国外交利益。而留富国岛国民党军逐步适应环境,力争早日到台湾。

## 四

早在1950年10月林蔚赴富国岛宣慰时,曾到西贡与法殖当局商洽,和驻印支高级专员比荣谈判,不得要领。1951年春,法军在越北惨败,巴黎特派名将塔西尼中将接任法军总司令兼印支高级专员,对台方及通过美国所提转运台湾事,塔西尼拒绝考虑。1952年4月,台湾“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有关部门参加,密商对法交涉、接运督导、划拨安置事项,加速运作。而由台湾驻法“使馆”与法国外交部交涉,及由台“外交部”与巴黎驻台北“代办”罗嘉凯多次交涉,不成(北京与巴黎于1964年始建交,互派大使)。黄杰众官兵乃策划于1951年12月25日,正值耶稣圣诞节,举行大规模绝食行动,以引起国际关注。12月25日当天,万余官兵和眷民齐集阳东机场,灶具列一旁锅底朝天。驻富国岛法军早有准备,将枪炮锁入军械库,表示任由华方处置;从岷港、金兰湾派来法舰在富国岛周围监视,法战机低飞示威。午后,终于出事。一士兵因仇恨法兰西当局苛待,冲入法军营房夺下卫兵枪支并刺伤该法兵,事发后,双方均冷静处理,未有更大冲突。

1952年,塔西尼病亡,由黎多诺接任,林蔚再访越南商洽,黎多诺原则同意。1953年初,巴黎政

府正式通知台北驻法“临时代办”段茂澜,同意富国岛“华军”赴台。黄杰秘密赴台报告请示,安排接运安置作业(取名“富台计划”)。特在台北、桃园、台中、左营、花莲分别建好“富台新村”。

1953年5月14日,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电告黄杰:“留越国军即全部船运台湾归国,第一批船15日出发。”由“海军”派舰艇载运,头批三舰艇于5月23日抵阳东,共七批次船运。至1953年6月28日,管训总处在列32457人,除千余人自愿留越外,三万余官兵眷属及平民抵台,分赴新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为祖国宝岛建设作贡献。留越官兵眷民在恶劣生活环境水土不适缺医少药,死亡者千余人。

黄杰在越曾赋《忆江南》:“南国梦,异域莫勾留,栏外笙歌空渡曲,关山难越使人愁,月满望乡楼。南国梦,夜静露华浓,壮志未酬归未得,千愁万绪付千钟,独坐月明中。南国梦,望断是斜阳,西贡城中灯如锦,暹罗湾上月如霜,微醉立苍茫。南国梦,长忆故国秋,何日金陵逢故旧,秦淮河畔月当头,横笛泛中流。”对祖国山河故乡眷恋情深。

黄杰回台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信任,为台湾北区“防卫部司令官”,升“陆军总司令”,晋衔“一级上将”。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部长”诸要职。

(作者为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按需出版

2004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300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重印在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 继续征稿 (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基本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 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

● 薛开震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几篇记述“不宜录取”政策与事件的文章，披露了颇为重要而又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许多读者在叹息之余往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宜录取”政策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

## 反右、不宜录取与文化大革命

紧随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不宜录取”事件是遍及中国大陆的高考乃至中考政策。不过，有的省用的是“不予录取”，虽有一字之差，但实质是一样的，只要是高考政审表上被盖上“不宜录取”或“不予录取”印章的考生，尽管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优秀、优异，甚至是当年省文科、理科“状元”，其结果必然是“名落孙山”，连两年制的大学专科也不能上。

除了被划为“不宜（予）录取”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当然是可以录取的，但是也严格地被划定为不同的等级：在“可录取机密专业”之外，又分为 3 个等级，即“可录取一类学校”（指重点大学），“可录取二类学校”（指一般本科院校），“可录取三类学校”（指三年制、两年制的大专，乃至中等专业学校）。被划为三类的考生，即使考分再高，也只能上个专科；被划为二类的考生，即使考分再高也只能上个一般的本科；而被划为一类的，即使平常学习成绩很差，尽得 2 分，被同学戏称为“鸭子队长”，高考总分很低，实在上不了、二类学校，也可以上个大专。1959 年高考中，开封育才中学文科班有几位高材生，其中江雪被划为“不宜录取”，尽管他高考总分全省第一，却什么学校也不能上；另有几位由于被划为三类，最后只能被两年制的开封师专录取，而且改换为“数学专业”。其中一位入校后偶然接触到他的考生档案，上面就盖着“可录取三类学校”的印章，同时他还发现，与他同班的一位

外地考生，其高考数学成绩竟然是“0”分！此事让他十分吃惊、哭笑不得，记忆犹新、至今不忘：这样成绩的学生怎么能当数学老师呢？为什么校友中那些在数学竞赛、物理竞赛中屡屡获奖者却连个二年制的数学、物理专科也不能上呢？

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宽严程度各个省市各个中学并不一样。然而，在大张旗鼓反右派、紧锣密鼓反右倾的极左氛围中，宁左勿右则是一种潮流。在执行“不宜录取”政策很严厉的学校，其“不宜录取”的比例相当高。据开封育才中学一位 1958 年高三毕业生统计，当年该校两个高中毕业班“不宜录取”的比例达 30% 以上。另据开封某重点高中一位 1958 年高三毕业生统计，他当时所在的一班，有三类学生被“不宜录取”，加起来超过全班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一、该班出身不好的只有一人被一般本科录取；二、出身是小业主、小土地出租、自由职业者等的考生，也有不少被“不宜录取”；三、出身虽好，但在整团交心、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的，也被“不宜录取”或被划入第三类的学生。河南省新乡市某高中 1959 年毕业班一位学生，其父是老红军，他本人学习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是共青团员，还当过班长。该班另一个小学弟平素有点调皮、不大守纪律、好和老师顶个牛，在反右倾运动中竟被学校开除并送去劳动教养。这位班长出于爱心、宽容，为这位被开除的学弟说几句公道话：“那不是什么问题，为啥非这样处理呢？”结果被校方批判为“同情右倾分子”，给予团内警告处分，随后校方又将其划为“不宜录取”。1959 年高考，这位老红军的儿子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却什么学校也不能上，由此让他一生艰辛。

大批遭受“不宜录取”的学生的身心受此摧残，一生坎坷艰辛。比起家在城市的“不宜录取”者，家在农村的处境就更惨了，因为在农村，“五

类分子”子女更受歧视(有些地方,“地主”的“帽子”要让其子、孙继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在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后就成了“地主”,还要参加五类分子会议)。有的还能去中小学当个代课教师,有的只能当农民当一辈子了。开封该高中一位1958年毕业生,被“不宜录取”回到家乡东明县农村,备受歧视,想不开,不久就上吊自杀身亡。

反右斗争是极左政策的体现,紧随反右的“不宜录取”与之一脉相承,这两者像两根巨大的大棒、大棍,让众多优秀的人才与人才苗子遭遇了“打闷棍”的陷害,同时更搅乱乃至破坏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人才培育的正常运转。

反右斗争公开地打击、迫害了众多的老中青知识分子与在校大学生,“不宜录取”则是隐秘的打击、迫害了众多的初中、高中学生(其中大多是未成年人)。可以说,“不宜录取”政策是反右斗争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延续与扩大化,这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摧残,也可谓是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先声与铺垫!

## “不宜录取”政策的由来

目前,人们尚无法得知“不宜录取”政策出台的详细缘由与具体过程。但是,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资讯,经过分析研究,可以肯定地说:文革前“不宜录取”政策来自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旨意与结论。

笔者查阅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该书中有两段指示、结论,显然是“不宜录取”政策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其一,是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该书第195—217页),该结论中特意指出:“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地方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

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该书第212页)

在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中,高小毕业、初中毕业的地富出身的青年顶多只能当个教农民识字(扫盲)的文化教员,能不能当尚可研究商量;但是绝对不能当社里、队里的会计,这是不容研究商量的,这是结论!在这个结论的笼罩下,“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还能上高中、上大学吗?当然不能!否则,他们如果上了高中则很可能还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学了相关专业,毕业后他们是要去当中学乃至大学教员以及到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当会计、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或者更重要的职务的,按照毛泽东的结论与逻辑,那岂不是更加危险的事情了吗?!

其二,是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作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该书第333页)这种情况如何改变?这篇讲话中没有指明。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在中考、高考中制定并贯彻执行“不宜录取”政策了。

试想,有了毛泽东1955年10月以及1957年1月在那么高级别会议上的这两段最高指示,再加上1957年夏天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而且在大学生中也揪出许多右派的反右运动,有关部门怎么能不积极响应、紧密配合、迅速出台、抓紧落实相关的“不宜录取”政策呢?中国当时的许多极左行为与政策,正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下边只敢搞扩大化,决无创造政策的胆量。

## “不宜录取”政策的延续与终结

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不宜录取”者已经被所在各个学校于暗箱操作中划定,但是由于“文革”爆发,当年的高考招生停止,而且1966—1970年这五年间大学没有招收新生。我们全体老三届统统成了“不宜录取”者!后来能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时

能有幸考入大学的老三届只是少数人。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以1962年高考时最为宽松。这是由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全国上下对极左路线都非常不满,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极左路线及其危害有一定程度的批评、揭露,毛泽东在会上也做检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脱帽加冕”。与之相对应的是,教育界对极左的“不宜录取”政策也有所松动与改变,当年提出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于是,1960年、1961年被划为“不宜录取”的一些往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当年高考,有的还考取了北大、清华的如意专业。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是,品学兼优的遇罗克(1942—1970)却没有这么幸运,身在北京的他于1960年高考遭遇“不宜录取”之后,1962年的二次高考时又重蹈覆辙。正是这双重打击,促进遇罗克更加努力自学并独立思考地研读马列原著以及有关文史哲书籍。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之际,他写出了轰动一时并将彪炳史册的《出身论》,遇罗克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勇士。《出身论》实际上否定了“不宜录取”的合理性、合法性,本质上是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相悖逆的。结果,遇罗克由“不宜录取”升级到“不宜存活”,被抓捕并处以极刑。遇罗克可谓遭受“不宜录取”迫害最为惨重的第一人。

“不宜录取”有松动,仅仅是1962年一年而已。1962年下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

阶级斗争,重提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更加强、升级,直至提升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页)的巅峰极限,“不宜录取”就更加有了理论依据,就只能一直延续下去,乃至更加变本加厉!

1971年至1976年这六年中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实际上“不宜录取”仍在延续并扩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了,不仅对原来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视,当然不能被推荐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诸多考生因为“不宜录取”政策仍在延续而落榜,尽管他(她)们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比如,开封市有一位孙女士,她与妹妹自学成才在1977年分别报考河南大学(当时为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和美术系,二人成绩都很优秀,其妹妹还通过了复试,但是最终却因其父仍背着“特务”等罪名而双双落榜。等到1980年其父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姐妹俩的大好时机已错过了!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特例。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7年高考时就因刘少奇冤案当时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准予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1页)。又据著名记者陆铿回忆录中记述,其子在恢复高考后在四川省报考医学类研究生受阻,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陆铿不顾一些朋友的劝阻,大胆地上书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批示后该问题才顺利解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68页)对科学的追求,对进步的追求。他告诉我,他一生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一书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虽经无数坎坷,他的抱负和希望依旧。

谢学锦院士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他的一生。在交谈中他鼓励我说:铁流先生,你还年轻,一定要看到国家的希望,无论怎样说,现在

总比毛泽东时代好,你能办《往事微痕》留下历史,我能搞科研并负责重大项目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进步!我们要承认这个进步。

中国传统的知识人多伟大!多光明!多有人格魅力!哪像而今某些迎合权势、窃名窃利的“大师”。这时,我想起吴祖光难友生前为我写下的那幅单条:“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谢学锦老师就是这样的楷模。

(作者为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

● 铁流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家编《往事微痕》，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问：请问找谁？找铁流同志。一个苍老有力的声音。我就是，有事吗？我看到你们编印的《往事微痕》，很好！能寄几本给我吗？

当然可以，请问姓名、地址、邮编？……他一一回答了我，我记下后，补充一句问：你也是五七年的难友吗？对方没有作明确回答，只说：你到网上搜索下“谢学锦”就知道了。

我不便再问，立即打开“谷歌”，敲上他的名字，一行醒目的介绍跳入我的眼帘：谢学锦，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勘查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执行局委员，现还任国际地球化学勘查杂志副主编，国际地科联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组指导委员会委员、分析技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我心里一阵惊喜，想不到《往事微痕》竟然引起了科学院院士的注意。第二天我叫司机开车，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带上厚厚一叠“往刊”找了去。敲响门铃，保姆把我引上楼，一位比我年长十余岁的长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行走不方便，慢步移到沙发前坐下，待我吮了口茶后，他翻着我带去的《往事微痕》说：铁流同志，你们真了不得，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大事，把尘封的历史留了下来，让后人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有反右斗争这场大灾大难……

他说话的时候不断咳嗽，显得中气不足。我不插言，耐心地听着。他慢悠悠说：要是没有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把那么多有才华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今天我们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唉，人才呀人才，右派分子多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我试探地问一句：谢老师，你是搞技术的，从事地球化学研究，一定远离政治，不像我们当记者的老和命运缠在一起？

他轻轻地笑了笑说：在那一切讲政治的年代，哪个人能躲开政治么？纵然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过问你。我与我父亲和你一样，在地质部双双都打成右派……

他不再说下去，似乎不愿意让过去那凄凉伤心的往事打乱他平静的思绪，妨碍他眼下正在研究的重大世界性的科研课题……

此后我连续几次去看望他，每次去都带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书送他，他也将他编写的书送我。他的书皆是地球化学话题，数百万字的字里行间几乎找不出涉及个人问题的东西。虽然我们多次接触，他的身世总是个谜。近日偶然读到燕凌等老师编写的记实回忆录《红岩儿女》中第三部中的《欢乐和悲欢交织的人生——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又得阅旅居国外友人黄河清先生编撰的《国史简纲》资料，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 1. 说真话和坚持科学观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在抗日战争期间，谢老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在战时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民运，1946年在重庆工作时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解放后回避了这段“光荣”历史，为了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全力投入地球化学工作，反“右派”前夕被当做党的发展对象。哪知到了“大鸣大放”出了事，他所在的地质部那个小组，大家都为

储安平“党天下”叫好,他还批评说这话说得有点过火。后来别人问他“储安平是谁”他说解放前他办过《观察》,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一位党外的英才。

一天部里请他去鸣放,他不愿去,但不能不去,去了却一直没发言。会快开完的时候,部长助理李轩对他说:“你发个言吧?”他这才讲了两点: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让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派没有写论文的人去。

“反右”开始了,物探所让他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到了部里开会,那会是批判他父亲谢家荣的会。他父亲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时任地质部总工程师。所里头头就跟他说:“你还是回避一下。”哪知就在批判他父亲的第二天,他过去的一位同事到部里去发言,说谢学锦和谢家荣父子唱的是一个调子。就因为他说了这位同事没有论文倒去了苏联开会那回事,被怀恨在心。

这位同事的发言在“快报”上一登出来,部里的政治部门马上打电话到物探所,查问他现在是什么状态,物探所马上批判他了。在批判会上,他把那个同事说的话一一反驳。批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谢学锦很好,怎么可能是右派呢?停会一星期,整顿内部“右倾思想”。最后,一个人把他说的“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揭发出来了,说这跟储安平的话是一个调子,特别是他还说过“储安平是党外英才”。这一下有“重大突破”,“反党”罪名成立,“反苏”罪名是现成的——因为他曾因业务观点不同,和苏联专家辩论。还有,他的实验室对面有一个厕所,经常往外漫水,他说过:“怎么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上纲上线地说:“这句话可厉害了,说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于是他就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宣布他是“右派分子”之后,副所长冯善俗马上找他谈话。冯说:“虽然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工作还得做,你还得做你的领导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傻乎乎的,领导工作就照样做下去了。

当时他是室主任,每星期开一次例会,然后各组在会上汇报研究工作。汇报以后看看还有什

么问题,讨论讨论,怎么解决。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忽然一天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谢学锦这个右派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于是撤消了他的室主任职务,换一个行政干部来领导。

后来地质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三个人。一是他父亲,一是李春昱,他们被称为“翁文灏的哼哈二将”:一个是矿产测勘处处长,一个是地质调查所所长。第三个人就是谢学锦。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但还让他做技术工作。他壮志未已,就扩展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开始研究热液矿床原生晕。

什么是原生晕?比如说,在地下深处,铜、铅、锌这些元素的热液在某个位置上富集成矿了,它们的残余的流体还会向上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矿的四周形成一圈,像圣者头上的光环一样,这就叫原生晕。地质工作人员只能看得见露在地表的矿石,如果矿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浅层对土壤或岩石进行分析,发现上升的残余流体中沉积下来的元素,从而推测下面有什么矿。这就是“原生晕找矿法”。

他和所里邵跃一起在辽宁凤城青城子勘探。那里有个铅锌矿,已经开采完了,露出一层厚厚的大理岩。那里工作的地质学家都认为下面根本没矿了。他们分析它过去的一些钻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晕,发现大理岩下面还有矿。钻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矿体。这个本来要宣布死刑的矿山复活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质科学院的院长朱效成很重视,要在青城子开现场会议。到了那里,不让他做报告,得让别人做,还得要他教他如何做——那个时候他没有资格露面。

“原生晕找矿法”一炮打响以后,冶金部马上推广。开了好多次现场会。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请化探方面的负责人审查,竟然压了一年。他跟那位审稿人在业务上经常有冲突,弄到所长那去,所长总归是赞成他的意见。所长人很好,来了运动,说是“重用右派”。于是谢学锦又变成了“人还在心不死,想夺权”。运动一过,又用他了。下一次运动来了,他又是“人还在心不死”的“右派分子”。这样反反复复的拉锯局战闹了几

年,白白耗费了他人生不少时间。

## 2. 一心为国家探矿找油,父母含冤双双死于文革

“文化大革命”前,他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系统地大面积采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绘制成图。这叫做“地球化学填图”。

他就去了四川,在现场做分析工作,结果在四川找到一个大锡矿。写了一个《区域化探调查报告》,建议开始研究使用多元分析的定量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地球化学探矿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电话、电报从四川把他召回北京。他回来一看,满墙都是批他的大字报,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那血腥岁月,凡是有“家”和“者”头衔的人,没一个不遭到批判斗争。

1966年8月8日上午,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红卫兵”摆下战场,揪斗“牛鬼蛇神”,做了十年右派的谢家荣、谢学锦父子两人与其他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黑压压地在坝子里跪成一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谢学锦眼睁睁地看着68岁的父亲被人呵斥,因为年老身体不好,下跪的动作不利索。

8月12日半夜里,再次召开批斗会,把部里三个科技精英揪到现场狠斗。这三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

“老修”谢家荣,“中修”郭文魁是谢家荣的学生,“小修”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斗争会开得很猛,又打又骂又戴高纸帽和挂牌子,没把人当人,谁受得了?当天夜里,68岁的谢家荣含恨服安眠药自杀。由于自杀是一项“自绝于人民”的罪行,罪至鞭尸。

8月13日早晨,谢学锦发现父亲去世了,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在清理现场发现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他母亲的:“依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他母亲名叫吴镜依)。

“父亲是自杀!”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他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销毁了,也没有让母亲看,对外说是服过安眠药。“红卫兵”不相信,把他父

亲的遗体送到医院解剖鉴定,解剖后遗体拉出来的时候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解剖医生心地善良,出据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他们一家还是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和保姆,因为自杀要祸及家属。

谢家荣,曾考入国民党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在北大教过书。1930年就有著作《石油》一书出版。1945年到台湾开发了油田,1948年与李四光、叶企孙、胡先骕、汤飞凡、饶毓泰等科学家,一起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数理组和生物组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他们又被遴选为中科院第一批院士,其中只有胡先骕因政治原故落选,故能善终。谢家荣还出任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副主任;1952年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应用地质学家,自杀前夕正在编写的《中国矿床学》一书随他逝世而流产。

谢家荣不是第一个自杀的院士,早在1958年9月30日,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自杀,那是一场对在反右派运动中漏掉的权威们的补充打击,叫做“拔白旗”。汤飞凡没成为“右派”,却免不了被拔白旗。汤飞凡是发现重要病原体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人,在汤飞凡死后的半个世纪里,再没有一个中国人取得过那样的成就。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在谢家荣之后,饶毓泰也上吊自杀了,时间是1968年10月,据说是在北大校园的一个厕所里,时年已77岁。

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其中叶企孙也惨死于“十年文革”。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曾派飞机接饶去台湾;由于与胡适关系较好,胡适也劝他离开。饶断然拒绝,却没有想到后来走上这条凄惨之路。

## 3. 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人类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父亲去世后,谢学锦的母亲就搬到妹妹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他父亲一样。母亲给他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

“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他妹妹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妹妹急匆匆找到了谢学锦。等他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5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母亲吴镜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抄家,被打斗,尊严的人格一再遭到侮辱,只能以死来反抗。

谢学锦失去了值得尊敬又无限关爱他的父母,他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他到现在。但人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文革”中他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他的专业。“文革”后期,又让他干业务了。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他就动身南下,到广州就看到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他心里一阵高兴,似乎看到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自始至终的信念,是爱国家、爱人民,其最大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和他父亲就是怀着这个抱负而活而生,不在于个人得失与荣辱。

他父亲经常告诫他说:“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说“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他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重视细节,而是说,细节很重要,应该研究;但是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细节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这个告诫对他非常起作用。从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地球化学还只是处于一种战术地位,只是跟在地质工作后头走,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找矿方法。他认定,这门科学应该取得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十

几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终于又可以做了。他要把地球化学演变成为全球的战略性的科学。1979年初,地质部批准了他提出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就是“地球化学填图”。

1980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

一,国家地质总局也批准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

二,他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化探。

三,当选为院士。他父亲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岁。他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57岁。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所致?

四,入了党。领导人要他入党。他说入党开会太多,耽误时间。领导就说:你可以少开会。这样他就入了党。

五,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参加第8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去了一个5人代表团。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in China (《中国的地球化学勘查》)。大概有500来人听报告。他讲完以后,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一大堆人围上来提问题。他一一回答。这次会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后他做副所长那段时间,所里欣欣向荣。任人唯才。他反对勾心斗角。促进全所工作开展。

好景不长,领导物化探所的勘察设计院被取



谢学锦(左)与本文作者铁流

消,他们归物探局领导了。此后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由物探局负责按规范要求,他就受到冷遇。随着各省大量资料的积累,大量矿床的发现,他不断提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总是无人理睬。只是由于中国的全国扫面计划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才使他得以经常出国,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新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项目, International Geotogcal Cogrelation Program, 就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鼓励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合作的,有一个执行局,有12名委员。他当了6年执行局委员。这些年他基本上在国外活动,用国外提供的资助在国外参加会议,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他没有经费。

过去30年地球化学填图只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0%,按此估计,世界各国陆续完成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后制作全球地球化学图,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他和芬兰、挪威的两位同行于1987年共同提出建议:在全球大陆上大约每3万余平方公里采集1个组合样,以大约5000个组合样大致覆盖全球,以使用较短时间、较少费用,初步制作出来全球地球化学图。各国学者对此大为惊讶,但无人支持。1999年他在布拉格作报告,展示出一幅全中国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图。全场哗然。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支持这项建议。

终于在河南上官找到大型金矿,各省纷纷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为提高。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地球化学除用于勘查矿产外,在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方面也应当广泛地应用。1995年,根据他和刘东生院士的建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了“地球化学定时炸弹与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会上介绍了奥地利科学家提出的“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世界上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经过200年的工业化,污染得非常厉害,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空气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积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视。要知道,土壤并不是藏垢纳污的无底洞。当污染物累积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大量污染物就会像爆炸一样被“喷吐”出来,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东德、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

鱼类死掉了。这就是“地球化学定时炸弹”区域性爆发的结果。这项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98年4月13日晚他出了车祸。在医院卧床半年。他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资料。到离开医院的时候,病房里面他的资料已经堆积如山。

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地球化学填图肯定将成为21世纪地质学发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尚有待发展,谢学锦将以自己的余生为它的发展奠定基础。

谢学锦说,有些“右派分子”到后来棱角磨尽,时光也耗尽了;他呢,棱角还是棱角,时光也没有白白耗费。他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束星北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后来被打成“右派”以至“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非常可怜。80年代初恢复名誉时已经老了,一生没有机会发挥天才。

#### 4.他一生为什么不绝望?

我写完这篇文章惟恐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决定去拜望谢学锦老人请他校正。他家里人告诉我,他患了脑梗塞住在博爱康复医院。我拨通他的电话,当他听我的声音后十分高兴,但提出一条警示:不要买任何东西。我履约只带去一册书法家张飙的书法年历送给他,他送给我的是一页“圣诞快乐新年好”的明信片。这是他向所有朋友拜年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说:“他正为他科学的英文著作 Geochemical Mapping-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做准备:“4月份‘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将大大推动中国环境农业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会上有关土壤碳储存成果的报告,催生了我们在物化探所建立碳循环与壤碳储存研究中心的思想。……正当一切工作都顺利进行时,10月22日,我突发脑梗塞,左侧支体失去了活动能力,这给本年度所有成功的工作投上上阴影,但我的右侧肢体、我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受到损害。……2010年春天来到,大地复苏,我将重新站立起来!”

他一生频磨难,从未终断过他(下转63页)

# 文革中彭德怀二三事

● 陈幼松

文革时我在北京航空学院任焊接专业三年级班主任。1967年7月上旬希望学生不再外出串连,提出“复课闹革命”,规定班主任要和学生三同。于是,我便和该班学生在一起活动。在闲聊中,该班北航红旗的勤务员(即领导成员)张寿山和另一名姓叶的同学,告诉我1966年11月他们等4人赴四川想把彭德怀抓到北京的经历。

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批斗罗陆杨大会。在大会主席台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对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说,听说你们北航红旗很利害,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去成都把彭德怀抓回北京来。

井岗山是焊接专业二年级学生,回到北航后便把任务交给张寿山等4人(其中姓叶的和另一人都是我班上的学生)。当时,戚本禹也不知道彭德怀的具体住处,学生也只知道彭当时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正好当时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被北航红旗关在北航,学生从张处打听到彭德怀的地址。

于是,张寿山等4人便拿着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介绍信赴成都(文革中北京先后成立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前两个被中央文革认为是保守的,不久便瓦解了)。到成都找到彭德怀的住处,那里有一个警卫班保卫彭的安全。他们拿出介绍信,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一个身着军装的彭德怀秘书接待他们,看完介绍信要学生们等一下,他要向上级请示。不久他出来,让学生把彭德怀带走。

当时正在全国大串连,火车既拥挤又混乱。因

此学生们设法联系飞机将彭带回北京。在联系到飞机前,他们借到成都地质学院一间大教室,将彭秘密安顿在这一教室内,他们4人24小时轮流看住彭,吃、住都在这里。

张寿山等说,在关押在大教室里时,彭德怀每天都在教室里练习跑步。学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彭说他相信总有一天还要为党工作,所以他要坚持锻炼身体。他说自己没有儿女,除了为党工作外,没有个人打算。

学生承认自己使坏,当彭在跑步时突然往彭胸上打一拳。学生说彭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换别的人,这一拳准把他打得踉跄摔倒,可是他仍纹丝不动,可见他身体之好。

学生问他三线建设情况,他总是说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他说自己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承认自己一生犯过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抗日战争时发动“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实力,招来日寇扫荡,削弱了革命力量。第二个错误是解放战争期间奔袭国民党后勤基地的西府战役,虽然险胜但过于冒险差点失手。第三个错误是朝鲜战争期间的第五次战役,因过于冒进使志愿军遭到重大损失。

当学生们联系到飞机,准备把彭总带回北京时,消息外泄。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红卫兵,仗着人多,把彭总抢走。以后的情况,张寿山等人也就不清楚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

● 黄 铭

梁漱溟一生深爱自己的祖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的各个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个阶段。抗战时期，他奔走国内当时政治对立的各方，呼吁共同抗日。胜利后，他又为和谈奔波，向各方陈述自己的主张。建国以后，他又以党外人士、共产党诤友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建立献计献策。可就是这样一位以拳拳之心爱国报国的老人却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与他相交数十年，被尊之为人民领袖的也是梁漱溟本人十分尊敬的人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乃至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是“拿笔杆子杀人”，“野心家，伪君子”。这次冲突虽已载入历史，但重提此事，仍有借鉴于后人的意义。本文拟就这次冲突的伏笔，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内容做一分析，以求专家指正。

## 一、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之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想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这方面也想听听

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毛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中都有详细论述）。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对于这本书，毛泽东在一天时间内，应该说还是认真看了。因为据梁自己回忆，第二次见面时，毛的桌上放了一沓纸，纸上記着梁书中的话，有些还用红蓝笔划了圈。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两人观点出现严重分歧，虽然谈话的气氛尚可，但分歧毕竟给二人以后的共事产生了影响。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性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作用。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毛听了后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

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毛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随即反驳,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我以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诚然,后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打碎了他这一梦想。梁漱溟的劝和也给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即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曾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在梁漱溟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出供国会讨论时,却未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当时有一个参加和谈调停的东北无党派人士莫德惠提出,可以承认当时已被中共所控制的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东北共产党军队驻地,但东北铁路沿线共41个县,20个县在共产党方面,21个县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政府可以派县长带警察去接收共产党所控的那20个县的政权,以达到全铁路线的行政统一。莫认为,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这样可以照顾到共产党方面。这样国民党政府能接

受,共产党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梁漱溟考虑时间紧迫,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民盟的名义,拟写三份提案,一份送给马歇尔,一份送给国民党政府,一份送给共产党代表团。共产党的这份是梁漱溟亲自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周看后,面色骤变。梁要解释,周忙用手拦住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周还问梁:“我们彼此商量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今天为何失信?”梁无言可答,只好立即收回提案,并让人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处也拿回另两份,此事终未造成后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误会,也难怪七年后周恩来能重提旧事。尽管梁漱溟后来为这事一直内疚,但这成为冲突的第三支伏笔,已成为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刚从苏联回来,即邀请梁漱溟到他家里做客。席间,毛邀请梁到新政府工作。梁考虑自己一直是以第三方人士调停国共争端,今后大局如有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而如果进入新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说法的机会。故他拒绝了毛的邀请:“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遂有不悦之意,冲突发生时,毛也就此事做了阐发。这是第四支伏笔。

建国初期,毛知道梁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解放区农村考察,没有想到梁考察回来后,即向毛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并不以为然。他一直是以为“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来评论自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因此他认为梁提到的问题是个别现象,而且情由可原,不必大惊小怪。他说:“贫穷农民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只要我们执行好土改政策,出不了太大偏差。”以后,梁和毛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见一次面,深谈一次,类似的问题提了不少。这大概是第五支伏笔。这五支伏笔如果单个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但要联系起来看,就会对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产生看法。所以当后来,梁漱溟再要提批评意见时,

遭到毛的严厉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 二、冲突的过程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紧接着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梁漱溟在分组讨论时发言。他肯定了周总理的报告,随后又谈到要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向负责人指出,党的政府也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让梁漱溟在明天的大会上讲一讲,梁欣然同意,并做了充足的准备。他的发言是拥护总路线的,并满怀深情地讲述自己一生的建国理想,但他又认为,周总理的报告中只讲了建设重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计划,希望想听到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计划,这是观点一。接下来他调转头转向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发展农业要靠农会,但农会在土改以后作用就减弱了。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但现在的乡村干部,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问题,质量上都不太够,因此要下大力气教育农民,单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这是观点二。第三个观点,梁认为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后,乡村变得空虚,近几年来,城乡差别拉大。他做了个比喻,认为城里工人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最后,他又劝诫共产党过去依靠农民,现在进了城,不要嫌弃农民。梁的这三个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梁毛冲突的导火线。9月12日,毛泽东参加大会,在彭德怀做完抗美援朝报告后,即席发言。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政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这时的讲话,还未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已听出是在说他,这时他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既感意外,也不服气。自己明明是拥护总路线的,只是讲了几句心里话,怎

么会变成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呢?他立即在会场就写了一封信,当场交给毛泽东,毛约他当晚谈话,谁知晚上是看京剧,只是在开演前20分钟两人碰了一下头,梁无法讲完自己的观点,只是要求毛消除误会,而毛坚持说梁反对总路线,两人语言激烈,冲突频频,不欢而散。后几天的大会,梁要求发言,在得到毛的允许之后,梁上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接下来9月17日的大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用过去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国共和谈的那件事,说明梁漱溟一贯反动。在周讲话中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后来收集在毛选五卷中的插话,言辞非常激烈。主要观点是(一)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梁漱溟的立场是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二)梁要多知道些计划内容,我不赞成(三)梁提出“九天九地”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四)台湾的香港的电台称“梁漱溟是有骨气的人”,被敌人所称赞,那就只能把梁划入反动一类(五)梁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六)梁讲我们忘了农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七)对梁不能搞自我批评,而只能是批评。毛插话时,席间一片谴责梁漱溟的声音。对毛这样的批评,梁是更不能接受的,他决心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要求当场发言,得到主席的允许,明天大会发言。大会的最后一天,梁登台发言。他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主席的口气很重,肯定我是恶意。”他认为这证据不足,说我一贯反动,我就要交代历史。接着他就解释了和谈的过程,并要求给他充裕的时间发言,这时场下一些人打断他的讲话,不让他再往下讲。梁就把手伸向毛泽东,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毛讲,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又接着说,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如果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接着说,有一点“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梁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听了非常生气,你如果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梁又接着说,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要考验一下领导党。两人你来我往,一句接一句,会开不下

去了。毛要梁再讲十分钟，梁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的人反对，最后只好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让梁是否讲下去。投票结果虽然毛也投了赞成票，但反对者终归多数，梁漱溟被轰下台，冲突结束。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私人关系也就结束了。

### 三、冲突的内容分析

冲突过去后，梁漱溟在家闭门思过。据他后来说，他也有自我批评，他对政协工作人员讲：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望，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当，那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在后，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多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后来，梁漱溟为了保护毛的威信，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从未向人提起这桩事，也不解释当时的过程，真可谓是一位顾全大局、品德高尚的老人。毛泽东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和“雅量”，梁的言行仍停留在“思想反动”范畴，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戴上帽子，打入另册。这对梁漱溟来讲是幸运的。但这件事毕竟在党内外开了一个先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外的不同声音随之逐步消失，政治空气渐渐死板，僵化。

分析冲突的内容，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原因，其实历史很简单，就是那么几件事，关键是怎样看，带上有色眼镜看，怎么看怎么反动。二是性格使然。每个人都有性格，一旦坚持一种观点，又被争论对方，或是不同意见方面的言辞激烈所激怒，这种性格就暴露出来，梁、毛二人都是有性格的人，都比较认死理，相比较之下，毛作为政治家就欠缺一点风度了，尤其对方还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翻阅毛选五卷，毛能用那么激烈的语词批评梁，联想到后来和彭德怀互相骂娘，就不足为怪了。是个性所致。这两方面都不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点是他们二人的政治分歧。

谈梁、毛二人的政治分歧，无外乎是两点：一是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并用之统帅一切。二是农民问题。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毛泽东来讲，可谓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这一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带领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这无疑是成功的。建立新中国后，毛仍然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这个旗帜举得更高，轻易将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结论废掉，以后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无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一个接一个，最终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害苦了中国老百姓。对于梁漱溟，早年他是不赞成阶级分析法的，如前所述，在访问延安时就和毛泽东辩论过。但他后来的思想有变化。承认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他不赞成用阶级斗争一个道理来证明一切、统帅一切的主张，为此还遭到过围攻。他曾经引用过恩格斯的一段话，即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相互斗争，而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自然作斗争时，人类就还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他根据恩的论断，联系党的八大《决议》，他说：“我原以为在我国完成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后，就不应该把人的力量用在彼此间的斗争上，而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同心协力，把矛盾指向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这样才能使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因此对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在思想上不理解。

谈到农民问题，实际上对立的梁和毛，在一些问题是相同的。他们二人都是在2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农民问题。梁曾经说过：“农民运动是目前中国肯定必须有的，假如有人忽视农民运动，即他就不了解目前情形。毛泽东出身农民，也就在这个时候，关注农民运动，亲自在农村调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又开辟农村根据地，展开武装斗争。二人都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农民，梁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农民把他们变成了不能胜任任何社会教育工作的寄生虫。”毛说：“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和广大农民相结合。”那么两人的分歧点在哪里呢？还是在重视农民的指导思想，毛主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梁主张“伦理本位”，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农民。这样一种农民观，在延安访谈时就被毛指为改良主义。毛也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梁的乡村建设理论。梁一直关注中国的农村，关心农民的生活。也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

有点发言权。所以提出了不要忘记农民这样的建议。农民和工人是“九地九天”，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毛对农民运动的基本评论，一直是“糟得很”和“好得很”的模式，对农民的过火行为一直是忽略不计，而认为只要大方面正确就行了。他始终认为90%的农村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的只占10%，你梁漱溟把这10%夸大了。再者，你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是不够格的，你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为地主富农服务的，你根本代表不了农民，你这样帮农民说话，目的是挑拨农民和工人的关系，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细分析起来，梁漱溟的用意还是为共产党好，为共产党献计献策，可是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完全被误解，今天看来，是十分可惜的。

梁漱溟之所以受人尊敬，是由于他的刚直不阿，为真理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是一贯的。当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强调不能用阶级斗争作为一切的立论根据，不赞成大抓阶级斗争。当别人围攻时，他斩钉截铁地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随声附和。”文革期间，他不理解一下子怎么能把那么多党政要员打成走资派，他认为这些人如果说早混进来的，还是后来变质的都不好简释。他举例，这些人过去有九十九个小功，难道抵不上当前反党这一大过？1970年修宪时，他又提出《宪法》序言中写上个人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不妥

当，宪法是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要遵循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有个人超然在宪法之上呢？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有人要他批判林彪的反动路线，他说林彪是鬼不是人，没有人格，哪有什么路线，刘少奇、彭德怀，不管对不对，他们有路线，有为国家设计的方案，而林彪没有。”江青让他批林批孔，还拿北大的一名儒学教授，现在也批孔引做例子。梁漱溟写信批评了这位曾是他学生的著名教授。信中说，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尚且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工作，是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这封信让这位著名教授十分汗颜。梁自己走上讲堂，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当有人批判他的言论时，他以沉默来对抗，一再逼问他的态度，梁漱溟脱口说了一句让今人想起来都十分震撼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展现了他本人的铮铮铁骨。

中国应为有这样一位爱国老人而骄傲，中国历史应为有梁漱溟的经历而丰富多彩。

（作者为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更正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刊出之《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一文中，第37页23—25行，将“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的规定，说成“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显然是将减少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最高不超过收获量的37.5%）错成减少收获量百分之二十五的租额。即将“二五减租”错成了“对半减租”。与此相关之40页右栏3-4行“这样，佃农应缴租额就又比此前百分之二十五提升了”、第41页右栏34-35行“在百分之四十与百分之二十五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附带补充一点有关史料：湖南省在程潜于1947年主政后，曾推行“二五减租”政策，也难以全面落实。1949年解放后，作为土改前的过渡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我

那时初参加工作，就下乡宣传和贯彻这一任务，叫做“二五减租、三七五限租”，不但明白易懂，也落到了实处。

湖南读者 彭传杰

本刊今年第2期第4页右栏第4行“前国防部长赫尔利”应为“前陆军部长赫尔利”，第66页左栏倒数第4行“90九十年代”中“90”应删去；第3期第5页左栏第18行“这些价值观念的核心就人的价值和尊严”一句的“就”字后面漏了“是”字；第32页右栏倒数第5行“修改稿”应为“修改稿”；第39页图片说明应为“书法家石开手书聂绀弩诗词”；第57页图片说明中的“左格尔”应为“左尔格”；第77页左栏倒数第2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应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第87页黑龙江读者任振邦的《我的一段回忆》曾在2009年第10期读者来信栏刊登过。

感谢热心读者给我们纠错，提出批评建议，我们将进一步提高责任心，减少差错，以不辜负广大读者。

# 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

● 孙建人 王祖远

建国初期的储备粮,主要囤积在全国基层各区县的粮库。“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中央规定,基层一级政府对这些储备粮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这项义务,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可是,在当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死神手中夺回普通百姓的生命,重庆一些基层共产党员干部,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建国以来首例“开仓放粮案”。

## 恶噩频传:水肿病大爆发

196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重庆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川东产粮大县长寿县城,在这春节前10天,城区竟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在明急匆匆来到县委,推开门,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

纪俊仪闻讯后立即驱车渡舟区。事情立刻明了——离区委不远的孙家,就横卧着两具尸体。死者刚刚抬出来,还来不及掩埋。死者穿戴并不算太破,但面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仅一层皮包着骨头。纪俊仪一看就知道,这是因水肿病致死的。

到渡舟区的徐家坪——一个离县城不远的生产队,又见到几具尸体……

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长时间营养不良,四肢会肿胀,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到此地步,若不及时补充营养,脏器就会萎缩并丧失功能,最终导

致患者死亡。某医院曾解剖过一个水肿病尸体,其肝脏已变得只有拳头般大。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

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不过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每月尚有19斤商品粮供应的长寿县最高官员——纪俊仪本人,也没能逃过劫难,而且他66岁的老母亲以及正在怀孕的妻子,也无一例外!几个月来,纪俊仪和县委以及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眼前的事实说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看着报表,纪俊仪心一阵阵绞痛。

1941年5月,年仅17岁的纪俊仪在山东省海阳县的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并升任某营教导员,多年的革命生涯,早让他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深深镌刻在了心灵深处。但现在,在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在自己直接管辖的范围内,竟然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这对纪俊仪来说太残酷了!他心里隐隐有犯罪的感觉。职责和良知告诉他,绝不能麻木听任可怕的局面继续下去。然而他又十分为难。1957年的反右,1958年

的大跃进，1959年的本欲纠“左”结果大反右倾，连续三年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把“左”推到极端。在这种局面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

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重庆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李唐彬当即就亲自打电话到纪俊仪办公室来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纪俊仪，你怎么搞的，长寿县死哪么多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经过深思熟虑，早已作好最坏思想准备的纪俊仪镇静地回答：“李书记，这是真的。”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饿死的。”

李唐彬急了：“一个县饿死哪么多人还得了呀，不但要撤你的职，你还该坐牢！”

纪俊仪回答：“李书记，我就是坐牢也要实事求是地向你汇报，长寿县是饿死了哪么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死亡，若不及早采取措施，后果更加严重。”

## 究其起因：是天灾还是人祸？

建国初期，长寿县属四川省涪陵专区管辖，各项农村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在川东算得上是底子比较厚实的大县。但到了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左风”也自上而下刮到了长寿县。

1958年10月，涪陵地区通知长寿去领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县委书记纪俊仪、县长宋敬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没有通知长寿县的情况下，涪陵行署擅自向中央报了长寿粮食亩产八百斤的喜讯。同年，长寿县组织了10多万劳动上山砍树、挖矿石，搞土法炼钢。对于当时50万人口的长寿县来说，这几乎是他们全县的劳动力。为此，全县几乎荒废了所有的农耕生产，更直接导致第二年粮食减产以致出现饥荒，引发水肿病，造成大批饥民饿死。

应该说，来自农村又有四五年管理农业大县经验的纪俊仪，从1958年秋天起，就在担心长寿县出现饥荒了；同时也在多方面努力，防止不该发生的事情出现。1958年11月14日，长寿县委

接到通知：长寿县由涪陵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同时划归重庆市管辖的还有綦江县、巴县。同年11月15日，纪俊仪、宋敬武怀着复杂的心情赴重庆，去见新的上级领导。他俩商量：到重庆后，一定实事求是地汇报，争取得到新领导首肯，将上山炼钢的10多万劳动力撤下来，赶快收粮食、种小麦；如可能，再把以前虚报的粮食产量指标降下来。他们还商定：如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就由他们两人承担。当时，重庆市委主持工作的是书记任白戈、鲁大东、李唐彬、辛易之，市委常委廖书华等人。他们集体接见了纪、宋二人，并听取汇报。纪俊仪如实汇报了情况，说粮食亩产只有500多斤，不到600斤。并要新领导同意他们将全县10多万在山上的劳动力撤下来，搞小麦播种，获得任白戈等人的首肯。当天下午，纪、宋就马不停蹄返回长寿，组织实施。然而，因错过了节气，全县大部分红薯、晚稻烂在了田地里，长寿县这一年丰产却没能丰收！紧接着忙小麦等小春作物栽种，也晚了，到12月初才种完。这直接导致1959年的小麦大量减产。更严峻的事情在后面，因一个冬季没有蓄水，多数水田成了干田，第二年秧苗栽不下田。直到五六月雨季才匆忙犁田、耙田、蓄水栽秧，待全县栽秧完毕，已过了夏至。无情的现实更是这一年的七、八、九月，恰恰是多年少见的大旱天。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这年长寿水稻总产量从过去的3亿多斤锐减到1亿多斤，加上小麦、玉米、红薯、豆类等的损失，全县的粮食总产量降到2.5亿斤，减产幅度达40%以上。至此，饥荒已不可避免地发生。

## 屋漏更遇连阴雨：救灾粮指标被神秘押扣

1959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重庆搞调查，在涪陵专区垫江县的海棠乡发现农民缺口粮。从海棠出来，他直奔长寿。纪俊仪早就赶到与垫江县相连的长寿县葛兰乡候迎了。他要截住这位四川最高长官，向他如实汇报灾情，争取救灾粮指标。在车上，纪俊仪如实汇报了长寿县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然后说：“农民的粮食已经吃不到明年小春了。”李井泉问纪俊仪还差多少粮食才能度过

饥荒。纪俊仪答：“要4000万斤。”

随后，李井泉一行在长寿狮子滩的重庆市委招待所住下，并叫来川东及川北的涪陵、万县、江津、达县四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重庆的任白戈、辛易之和重庆市委的一个部门负责人，纪俊仪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粮食减产后的农民生活问题。会上，纪俊仪再次汇报了长寿县的灾情，再次提出需要4000万斤救灾粮。然而，就在会中纪俊仪请求拨救灾粮时，一个参加会议的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抢过了话头，说：“我是四川人，了解这里的情况。灾情是有，但我们四川就是三分粮七分菜。粮不够、瓜菜凑嘛。”好在与会的领导同志都没在意，会上决定给长寿县调拨4000万斤救灾粮。同时确定集体食堂每天保人均4两粮、3斤菜、半斤代食品。纪俊仪带着好心情离开了狮子滩招待所，然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不久，长寿县因缺粮出现水肿病，再过段时间，水肿病已发展得相当严重了，省里决定给的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还迟迟不见消息。纪俊仪十分着急，打电话给具体管这件事的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对方说：没有救灾粮指标。纪俊仪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却是：四川省给长寿县的救灾粮指标，早就下到了重庆市。

纪俊仪急忙赶到重庆，找市委主管农业的书记辛易之要粮食，辛易之看来也无可奈何，但他给纪俊仪出主意：直接给四川省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纪俊仪依计而行，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事是李政委（指李井泉）定的，你们市里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纪俊仪一头雾水。这话说得含糊，让听的人也犯迷糊——“李政委定的”在此是指什么？是指李政委定下的事其他同志不好插手？还是指李政委自己更改了在狮子滩作的决定，这粮不给长寿了？或者，给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这件事是李政委早就拍板定了的，重庆市就看着办吧？但既然李政委已经定了，怎么还要“市里看着办”呢？纪俊仪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事又岂能马虎，这可是长寿县几十万人的救命粮呀！纪俊仪满腹疑团，心急如焚。

纪俊仪万万想不到，在他给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之前，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早就给李副省长打了电话。而且很久以后纪俊仪才得知，

四川省当时确实是给了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但指标却被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扣了2000万，另2000万也没落实下来！

## 开仓放粮：坐牢杀头一人承担！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人。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长时间饥饿，人们极度虚弱，他们普遍感觉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门走一走，或者找点东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几步又浑身发软，总想蹲下来或坐着休息一下，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来了。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全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

到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腊月二十九即为大年三十），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却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饿死鬼”。有的甚至全家无一幸免，连尸骨也无人收敛。纪俊仪心如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饿，惟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没有，但敢动吗？

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但纪俊仪这一级县政权只有看护的义务，无权动用。

一边是党的纪律，一边是群众的利益，本应是保障和目标的关系，如今却在特殊条件下变成了一对矛盾，尖锐地摆在纪俊仪面前。两相权衡，纪俊仪心灵深处那朴素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不管怎样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仓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为此自己个人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重庆，找到辛易之书记：“辛书记，哪么多人在饿死，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无语，有办法他早就办了。下午5时30分，下班了。辛易之劝纪俊仪说：“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去过年吧。”纪俊仪说：“县里的干部、区社的书记们还在等着我带回去好消息，空起两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给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给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换了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回去吧，家里老小还等你过年呢。”

我明天上午到长寿来。”当天 23 时 30 分，纪俊仪回到长寿。

第二天(1960 年 1 月 28 日，农历正月初一)一早，纪俊仪乘车到黄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际，黄草山的杨家垮死了 3 人。纪俊仪起初还有点纳闷，死了 3 人怎么没听见哭声。后来才知道，死的这一家，一共就 3 口，3 人都死了！周围邻居也早变得麻木，见惯不惊；况且大家都被饥饿折磨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力气管得了这类事了。

杨家垮的死人让纪俊仪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尽头，希望辛易之书记快一点到。纪俊仪还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后经南川、涪陵到的长寿。车路过涪陵的李渡等地时，车窗外的死人惨景，使这位重庆市委农业书记震惊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车终于到了。纪俊仪急忙迎上去。双方没有多作寒暄，甚至辛易之来不及吃饭——他一路赶来还未吃饭，纪俊仪就带着辛易之去看杨家垮才饿死的一家 3 口人。随后，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后辛易之问：“还有没有饿死的？”纪俊仪答：“还有。”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 4 点多钟，辛易之又匆匆乘车向重庆奔去。在回渝时，途经江北县路段，辛易之又看见了摆在路边的几具死尸。

这一夜，纪俊仪守候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边。饥荒中的农村的冬夜似乎异常地寒冷，纪俊仪在寒风中彻夜未眠。耿耿长夜，饥饿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他的心，让他迹近虚脱。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动用国库，早一分钟放粮，就将挽救多少濒于死亡的村民！寒夜里，他的手边上只有一盅些许炒盐调的开水，他不时抿一口，与其说在抵御咬噬他肠胃的饥饿，不如说借以缓缓烧灼他心田的火。他盼着电话铃响起，但他不知道，电话响后会

是什么结果，但他已横下一条心，如果还得不到粮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书记，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领导，再不然，就……

对于死亡线上挣扎的村民们，如此关切的党的基层干部，又岂止纪俊仪一人？于此同时，已有一个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干起来。这人是纪俊仪治下的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

双龙区是长寿县的产粮重点区，正常年份，双龙上交的征粮就多达 3000 万斤，约占全县近两成左右。但在饥荒中和长寿的其它区一样，也不例外地发生了饥荒，而且还由于是平坝，后果更严重。就在 1960 年那个除夕的下午，区委书记张开华一直守候在他的办公室。他知道，县委书记纪俊仪正在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那里要救灾粮。此时张开华的全部希望都在办公桌上那台电话机上，他盼望铃声响起，也许，响铃过后就是发粮的好消息。但下班了，电话铃未响，夜幕降临了，电话铃仍未响……张开华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纪书记没要到救灾粮，否则电话早就响了。张开华深深地吸口气。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无法预测，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实施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十分清醒他将“严重违纪”，而一旦追究下来，轻则是党纪处分，如果重处，就是坐牢！“但纪律是为什么制定的？”张开华想，“不就是为了保证宗旨的顺利实施么？”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为了把那些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拉回来，张开华决定铤而走险。他没有向县委请示，他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况且，干这种事儿，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当！除夕之夜，张开华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取出了 300 万斤粮食赈救饥饿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深谙县情民情的纪俊仪。当事后张开华有些激动地对他说：“纪书记，说老实话，我开国库了。我接受组织的处理，坐牢、杀头我都没意见！”纪俊仪差点哭了。他拍了下张开华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谢谢你，没你的事了，开国库的责任我来负。”这时是张开华差点哭了。事后果然有人追究张开华私自开仓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前后三次专门来长寿县调查，意欲“严肃处理”张开华，还责问纪俊仪是否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纪

俊仪以“长寿县委”的名义对张开华开仓承担了责任。纪俊仪还在向辛易之汇报时特别强调：“张开华没经请示就开仓是不对，但他的开仓减少了人员死亡，也是件好事，不应该处分这样的干部。”张开华最终被保护下来，并受到重视。大难考验干部。从这件事上，长寿县委发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后话。后来，张开华先后担任了长寿县委组织部长、长寿县人大副主任，直到脑癌手术失败去世。

196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亲自打电话来了：“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的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照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经历过残酷战争环境的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旦猛吃，极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开仓放粮的效果非常明显，初二开仓，初三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初四更见减少……

这一年，长寿县共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与纪俊仪事前向李井泉汇报时提出的“需4000万斤救灾粮”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粮，纪俊仪就处在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好心情中，这下几十万人终于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这好消息告诉挚友——相邻的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在电话里，侯尧礼也十分高兴。涪陵县也大范围饥荒，侯尧礼正为此坐立不安，有长寿的先例，侯尧礼胆就壮了。电话一挂断，他就拨通了涪陵地委书记办公室……可是一套申请、审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县开仓放粮，已是长寿开仓之后一个星期了。涪陵县为这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

重庆市近郊的三县两区（长寿县、綦江县、巴县、南桐区、北碚区）在那场灾荒中，是川东、川北饿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节过后不久，纪俊仪的二儿子出生了。在这场饥荒中，纪俊仪四处奔走使长寿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孩子母亲怀孕时的水肿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满3岁了，按理该上幼儿园了，纪家老二却还不会走路。

## 冒险开国库 放粮谁与评说？

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正是党的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像纪俊仪这样、像张开华这样，在人民危难的关头，置个人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是大有人在的。涪陵地区的秀山县县委书记杨文堂也是这样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区最边远的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个省在这里交界，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场饥荒中，这个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牟平汉子，像纪俊仪一样不忍秀山县饿死人，未经请示，就直接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动用了3000万斤国库粮食救灾。虽然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也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杨文堂的“私自开仓”，使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大大地少于周边各县。然而，杨文堂可没张开华那样幸运，因为他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没人能为他承担责任。涪陵行署将此事汇报到了四川省，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当即亲临秀山处理。这位副书记根本不听杨文堂解释，也不详细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口认定杨文堂犯有“严重错误”，责令杨文堂“老实交待，听候处理”。谁知那位省监委副书记在回省里的路上，于白马山翻车摔死了，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秘书和司机。杨文堂闻讯后直拍手，连说“该死”。这下，麻烦大了。省委领导震怒了，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亲自到秀山处理这个“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的县委书记。

廖志高认真听取了杨文堂的分辩，又到实地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当即对杨文堂表态：“你做得对，当时如果是向上级请示也不会有结果，你的果断开仓使秀山县少死了人，你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杨文堂于是平安无事。几个月后，杨文堂被提升为涪陵地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

那场灾荒过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扣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肯定：市里当时扣这4000万斤指标是错误的。1966年，纪俊仪调任重庆市委农林政治部副主任，尔后又任重庆市农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杨继缙）

# 清末“永平秋操”

● 高智勇

时下,被炒滥的“清朝那些事儿”多是些帝王风流韵事或是王府豪宅内的糜烂生活描述,以及阴宅建筑奢华考究……除了戏说就是后代强加的所谓研究或是猜测。但长期隐而不彰、少人闻晓的军事题材却是空白。今天俺向诸位侃一段涉及晚清军事的“清朝那些事儿”。

前清政权在灭亡前夕,风雨飘摇的危局中,搞了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旨在炫耀武力——崇尚暴力,震慑天下,吓唬民众,抵制即将爆发的革命。

公元1911年10月初(宣统三年八月仲秋,农历辛亥年)。清廷在直隶永平府(今河北省唐山地区,相当今唐山和秦皇岛二市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滦州、卢龙、迁安、昌黎、抚宁、乐亭、临榆六县。史称永平七州县。府衙设在卢龙县城。自古是内地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集结六万多兵力,在滦州以西的柏树庄至拐子山以北的广阔地带,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举行了代号“永平秋操”的军事演习。阅兵场设在坨子头村南,方圆十余里的广阔地面上,大兴土木,起造阅兵台(当年叫做搭龙棚)格局盛大,募用工匠甚众(至今,该村南仍留一村,名曰军营庄,即昔日屯兵遗址)。

此次军演意义重大,非同寻常。这是清政权高层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残局中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无论是军演的投入、规模、级别均高于以往历次军演。

考晚清军史,自光绪时代起,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曾确定“间岁会操”制度,即根据情况需要,不定期举行军事演练,比试战阵之术,应付万一。光绪帝在位时,曾在安庆和彰德搞了两回大规模军演,但效果并非理想,受邀外宾观后“冷嘲热讽、百般讥笑”。这次一定要重振军威,宏扬国威。

为确保军演圆满成功,万无一失,清廷作了详细、周密的布置、安排。制订出多项实施方案、细则。临近军演前的数月,清廷先后颁布《军官随

观秋操规则》、《学生人民随观秋操规则》、《秋操总监处勤务规则》、《秋操陆军警察服务规则》……内容具体、详尽,可说是做到了“处处防范、事事小心”如要严密监控军演区域周边“要路道口、民居民户、树林、围篱、掘穴、凹道、孤立农屋”等等不留任何死角。“雇佣人夫要严密监视其举动,与周遭附近茶馆酒肆之关系”,遇有落伍士兵或可疑人员,应即询明,如系逃亡,即行逮捕。总之要把可能发生的事态、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军演前夕,清廷拟定各省派赴现场参观军演官员名单(由报纸予以公布),各省督练公所、各镇司令处(凡是涉军部门)可派3—5名武官前来“观操”。实际上,除贵州、库伦(今应叫蒙古乌兰巴托,当年属大清国版图)只派员一人而外,其余各省皆5人以上。

军演指挥部及综理处设在开平镇守史署衙。英商所办的开平矿务局特为北京前来高官、大员设立了临时行辕,供休息、打尖。国内新闻媒体记者接待处设在开平镇东大街,另在西大街设外宾照料处,专门接待各国驻京公使馆派来“观操”武官2员或1员。“以上各处,每到夜晚门前均有水月电灯,照如白昼”。

军演前,“监国摄政王”载沣颁旨:对于中外报纸,要尤为注意。中国记者由参观照料处接待,外国记者由外宾接待处供应。以务求“名扬中外,重振国威”。为此,在正式军演前的9月底,在北京德胜门外的黄寺教场举行“预演、彩排”。摄政王载沣(溥仪之父)亲自检阅“大清国皇廷禁卫军”。同时任命军咨大臣(相当国防部长)载涛(溥仪七叔)为“恭代大皇帝亲临阅操大臣”。贝勒载涛受命后乘马车(检阅车)绕场一周巡阅,军乐高奏,摄政王亲自为各军将领授旗……同时恳切嘱咐:“此次与国家前途大有关系,当务慎重。”

直隶地区、永平府地方官吏为军演极力奔

忙,凡皇亲、高官、京城大员、外宾经过之区段,每里设置巡警10名,陆军警察10名,淮军马队10名,互相配合,交替进行“循环巡逻”“往返巡逻”和“穿行巡逻”。每值勤点间距在20丈至30丈左右,此举可集中值勤人员视线,扩大巡视覆盖面,减少对警戒区域内的空间与时间的失控。排查可疑物,监控可疑人员,在巡逻中发现可疑人时,迅速出击,采用“日”字阵势,将“可疑人”纳入“日”字当中,这样能有效防止其夺路逃跑,牢牢控制嫌疑人。军演现场周边三邻五村内的“重点人物”不良分子、可疑人员(包括精神恐慌、言行可疑,着装与其身份明显不相符或与季节不合者,身份不明,随身携带物品与其身份不相符者,到处流窜,窥探重要目标,伪装镇静者,传播小道消息,聚众煽动者,呆傻精神疾患者)严格限制在固定区域,严禁外出流窜,不话乱说乱动。否则要追究地方官吏及三邻五村保甲长之责……同时,四处遍贴安民告示:“官军购物兑银一律不得抬价”。“闲散游民不得擅闯警戒区”……严密设防,万无一失。

总监阅操大臣载涛在随从官员簇拥下由北京直赴永平府滦州开平行辕当天,直隶总督陈夔龙率天津全城司、道、府文武各官、巡警道署、差遣队、军乐队、体育社团等,齐集车站,奉陪迎接。滦州知州朱佑葆特率本地学生910人,学董77人,警董40人,名商会长40人,自治会职员42人,各村镇正、副84人……夹道迎接,学董均着制服,有的甚至不远60里、凌晨五更起身而来“恭呈颂辞一篇”。

军演部队分东、西两军。东军是以汉人为主的“新式陆军”,这是光绪年间以重金聘请德国教官训练出来的。总指挥是时任“军咨使”的冯国璋,副总指挥分别为“陆军第廿镇统制”吴禄贞与“陆军第廿镇统制”张绍曾。西军是以满人为主的“皇廷禁卫军”。总指挥为“陆军部正参议”舒清阿。副总指挥分别为“副军咨使”哈汉章和“军咨官”田献章。东、西两军除步兵外,酌配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后勤兵及卫生队。两军总计6万余人。

军演开始,西军由北京开拔,向东北方向行进,日夜兼程,进驻丰润至开平一线。东军由天津出发,进驻山海关至滦州一线。两军基本是沿京

奉铁路相向行进,边行军、边操练,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次日两军在坨子头村相遇交火,西军首先战败,向西退却至雷庄以西石佛营,东军猛追,迫使西军一直退却至古冶镇。第三日起,西军开始反攻,转败为胜,东军大败。退却至坨子头村重新集结。第四天起,两军将官议和,标以下各自操演战法(晚清军队建制为:镇、协、标、营、哨、棚。分别相当现代的师、旅、团、营、排、班)。第六日举行大规模“会操总阅兵”,检阅各军兵种战阵之术及综合协调能力。第七日罢操,将校级官员聚餐,犒赏参演部队。第八日各军返回原驻防地。

清廷不惜血本,为这次军演拨出经费为银元1800万枚。共动用山炮608尊,陆炮720尊,步枪28582杆,马枪2196杆,弹药车(畜力)452辆,接济车(畜力)320辆,骡马3612匹,炮弹28800发,枪弹2076190发,雇用民夫19488人次。尤其是刚从德国购买的“克鲁伯机关枪”和从美利坚引进的行军电话同时“亮相”。引起来宾广泛关注,令人“耳目一新”。这两件尚属世界一流水平。

机关算尽,万无一失。正当军演正酣之际,平地一声雷:中国腹地湖北爆发“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其震撼力远超出湖北,波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惊惶失措的清廷急电滦州:“阅操大臣载涛,武昌吃紧,率部速归……”

“永平秋操”戛然而止。

但止而不静,又起一波——部分参演部队抗命不归,在滦州举行起义,与湖北的义军遥相呼应,对北京形成南北夹击……各地纷纷响应,清廷内部分崩离析。顷刻间,这个有着二百六十余年悠久历史的大清帝国覆亡也。

是那么突然,谁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更正

贵刊2009年第10期“来函照登”中有刘导生先生关于贵刊同年第8期中《一二·九运动》一文中的一个错误做的纠正。刘导生先生笔下的那位敲响了北大红楼后面平日用来上下课报时的铜钟的王德昭,正是家父。但是由于笔误,将“王德昭”误写为“汪德昭”,请贵刊予以更正。

钟敲响之后,家父即刻取了传单到校外分发。但是很快就被警察逮捕,并在牢里关了两周。出牢时,“一二·九”运动已经过去了。

王其允 2009年10月5日

#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 金 津

我小学六年所在的北京育英学校是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其学生家长不是中央或各部委高官,就是长期出使在外的共产党干部,如新华社的、外交部的、中央调查部的,等等。我们班的慧敏,以及要好的小萍、小玲,都是中联部的。好像隐隐约约知道她们是外国人。中联部这样的孩子前前后后有几十个,都在育英。

直至文革后期,那时我们早已升入中学,才互相从同学口中知道,他们都是东南亚共产党即当时中共“兄弟党”的子女,有泰(国)共的、缅甸(甸)共的、印(度)尼(西亚)共的、日(本)共的、马(来西亚)共的、越(南)共的,等等。由于中联部是负责处理“兄弟党”事务的部门,所以这些孩子都由中联部管理。

再相见,就是去年育英学校六十周年大庆了。在相逢的欣喜中,才知道小萍、小玲是泰共的孩子,而慧敏是马共的孩子。慧敏的爸爸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代任马共总书记,一直是马共的领导者之一。慧敏姐弟五个都是育英的。她对我说:不管今天的社会怎样评价毛泽东,我们都会永远感激他。

一句话,把我深深地带进一段历史中。

我非常好奇的是她父亲现在怎样了?马共现在怎样了?马共武装还有吗?中共对马共的支持是怎样结束的?她们为什么那么感谢毛泽东?这些同学离开育英、离开中国后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现在都在做什么?……

## 我心中因为那“为双方”翻涌着无限感动

2009年12月初,我同已经定居在香港的慧敏到了泰国南部的合艾市,随她一起参加纪念《合艾和平协议》二十周年活动,不但见到了慧敏爸爸(92岁高龄)和慧敏姐弟,以及其他马共子弟的育英学友,还见到了作为传奇人物的马共总书记陈平(86岁),以及那么多的前马共人民军成员。

纪念活动是由前马共人民军成员发起的。在他们的邀请下,泰国军方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并致祝贺,共同纪念《合艾协议》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布景是这样:最上方横幅是“《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二十周年纪念会”;正中一行大字“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显然是主办方意愿的表达;在这两句话的中间,则是那张著名的照片——泰军方查哇力上将、马政府旺西迪拿督和马共的陈平总书记,三方首席代表当年签署《合艾协议》后握手相庆的历史时刻。舞台布景全部是用泰、马、中、英四种文字;下面会议主持者即前马共人民军成员,也是用这四种语言主持纪念大会。



照片正中为泰军方代表、时任泰国三军副统帅兼陆军总司令查哇力上将;左为马政府代表、内政部常务秘书旺西迪拿督(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全国总警长为代表团团员);右为马共代表、马共总书记陈平。

在陈平、泰军方代表和马政府代表走进会场时,真的是掌声雷动,四五十架摄影机对着他们,准确地说,主要

是对准陈平。这位带着马共人民军在丛林中抗争了几十年的传奇人物，吸引了无数记者。我带着相机根本挤不进去，干脆掉过头来拍照那些蜂拥的记者。那两天，闻讯而来的记者把合艾所有的酒店都住满了。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宣布：“为双方在武装冲突中牺牲的人员默哀一分钟”。此时全场起立，肃静默哀。那一刻，我心中因为那“为双方”翻涌着无限感动，——丢掉历史仇恨，像对待自己失去的亲人一样对待冲突中的对方死难者，和平历史的前行，是多么需要博大与包容啊！

之后陈平在他坐着发言时，又一次以老迈的身躯独自缓缓站起，特意“为在冲突中无辜死去的人默哀一分钟”。

这是《合艾协议》带给我们的永远的感动。

## 没有尊严的谈判导致马共武装重新回到丛林中，拿起武器

我曾经问过慧敏：你父亲对于马共最终没有取得政权，有没有失落感？慧敏说她也曾经这样问过她的父亲。她父亲对这一切都非常看得开。她父亲说，我们共产党当初搞革命就是为了使社会平等，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如今现在社会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变化，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马共是于1930年，在当时第三国际代表胡志明的见证下正式成立的。当时马共开展了反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日本军队打进马来亚后，作为统治者的英国人不战而降，马共采取联英抗日政策，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发展到1万多人，解放了全国一半土地。战后，陈平等由于其抗日功绩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马共的这段历史，被马来亚社会广泛认同，至今没有人去抹煞它。

但是，英国恢复了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把马共当死敌。在马来亚本土，要求马来亚独立的有多种政治力量，英国人退出势在必行。关键是它怎么退？它到处讲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源自外国阴谋，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说，马来亚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了，因此它英国保留在马来亚半岛的驻军是合理的，“是保护，而不是重新征服殖民地人民”（蒙巴顿语）。在那“非东即

西”两个阵营的冷战年代，只要打出“反共”的大旗，就有“市场”；当然反之，只要打起“反西方”的大旗，也一样。那时人们看世界，没有今天“多元”的概念。把对方妖魔化，往往是出于需要。

为此，亲西方的马来亚当局同样不接受马共，同样与马共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955年的华玲谈判，本是马共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向马当局释放出来的和解信息。之前马共领导人去莫斯科，中联部部长部长王稼祥也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共同研究马共武装斗争问题，形成《苏共与中共联和意见》。这份意见书认为，从马来亚的整体形势看，极难开展长期武装斗争，应全力保存自己的干部和游击队，在城市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从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转变为非法活动的斗争形式。

1955年马共与马来西亚当局在马来亚北部吉打地区的一个小镇——华玲举行了谈判，史称“华玲谈判”。马共提出的最高要求是让政府承认马共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最低要求是，放下武器后马共人员行动自由，可以自由参加任何现有政党，可以组成一个新的不叫“共产党”的政党……但是没有谈成。当权者一定要把马共的愿意和谈叫做“同意投降”。这是没有尊严的谈判，马共当然不接受。当权者当时就是这样对陈平说：“如果你要让这个国家有和平，就得有一方让步——不是我们向你们让步，就是你们向我们让步。这两种思想意识——你们的和我们的——是永远不能相容的。”他还拿中国向陈平举例说，马来亚是个小国，而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还有那么一个小岛可以去。

结果就是，马共武装重新回到丛林中，拿起武器。政府不停的追剿，以期消灭马共武装力量；马共武装不停地反击或打击政府武装，在丛林中建立根据地。谁都不能否认，双方都伤及了无辜，双方都失去了那么多的父亲、儿子……

毛泽东：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

陈平：我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

中共真正考虑给马共经济援助,始于华玲谈判以后。

1956年毛泽东接见慧敏爸爸及其他马共领导。慧敏爸爸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说:你们给中联部的报告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在(华玲)和谈会议中,阿都拉赫曼威胁马共投降,陈平同志坚决拒绝,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下去。”这是英雄。

毛主席又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

毛主席讲完,大家没有出声,都默许、领会主席的一番话……

这次会面,让马共的领导又高兴,又心生疑问:中联部提出我们要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

1957年8月,马来亚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1959年,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减到600人左右,被迫转移到泰国南部。

1961年,苏共和中共关系已破裂。毛泽东认为苏共已成为修正主义政党,世界革命的重担责无旁贷的落在中共党的肩上。那年陈平前往北京途中经河内,见到刚从北京回国的越共领导人黎笋。黎笋对他说,几天前,毛泽东亲自告诉他,革命很快就会席卷东南亚诸国。毛泽东预测越南、柬埔寨、泰国及马来亚政权都会垮台。这是当时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解读,它导致了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武装的直接经济援助,也就是所谓的“输出革命”。

1961年7月,陈平等马共领导受邀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会谈。他有书回忆过这段。

邓小平打开话匣子。他通知我们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剧变。……邓小平深知缅甸、老挝、泰国以及印尼共产党同志的心思和算盘。这些兄弟党当时都在中国维持重要的训练设备。

邓小平强调说,就策略上而言,东南亚的整体形势对我们马来亚的斗争越来越有利。他力劝马来亚共产党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我们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

我在一瞬间震惊了。……

心理上,我们发觉处于更加艰难的窘境。我

们在昔罗经历了好几个月思想上的挣扎,才敲定结论,认为我党生存的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我问:“如果我们恢复武装斗争,中国能够给我们哪些援助?”

邓小平显然有备而来。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都在关注马来亚共产党的处境。……邓小平向我保证,如果能够达成协定,中国会支持我们。

……在此之前,每每提及向中国要求直接援助的事情,我总是觉得尴尬。然而,在北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后,我察觉到中国一直都在资助东南亚国家的兄弟党。这些兄弟党都有派驻代表在北京,也有大批人员参加各种训练计划。

陈平与在国内的马共领导反复磋商后,决定放弃18个月前拟定的准备“转”的方针,接纳北京的建议,重振武装斗争的旗鼓。

因此,当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交谈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立场就是,马来亚共产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我们直截了当表明不要武器和弹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运送这些配备到马来亚会遭遇什么难题。我们要的是货币。

我们和中央联络部的磋商历时几个星期,非常成功。这是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以来,党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得到保证。

……我们每年向中国提交经费要求。预算案是以美金计算,但是我们可以提取我们所要的货币。北京会随着需求的情况相应增加我们的预算。这些总体安排一直维持到中国1989年终止援助为止。

1967年1月,中国正在文革的高潮中。康生代表中共与马共召开党对党会议。康生在会上对陈平等人大讲中共在马来亚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一条是王稼祥执行的刘邓反革命路线,即是指王稼祥带马共领导人赴莫斯科与苏共联络部讨论马共革命后形成的上述“联合书面意见”。康生说这个意见的“中心问题是否定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大批王稼祥,还大批印尼共领导人艾地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武装斗争等。

同月,毛泽东再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时表示:他们(指刘、邓、王)这样大胆,要你们转变

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向我请示过,没问过我的意见。

但是这次的接见,又给了马共极大的帮助。慧敏爸爸是这样记的——

毛主席问:党对党会议开得怎么样?

陈平抓住这次的好时机,一开始就切入主题:这次拜见毛主席,想向毛主席提出一点要求。

毛主席:说吧。

陈平:我们想向毛主席要求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

毛主席尚未开口,康生迫不及待的说:你们和泰共共用一个怎样?

陈平及我们几个一行人不约而同说道:不行,很不方便。

毛主席听后,不容置疑地说:就给他们一个吧!

康生便连连答道:好,好。给一个,给一个。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我们终于获得了我们迫切渴望已久的强大宣传工具——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毛主席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吗?

陈平:请主席能增加给我党我军的援款经费。

毛主席非常爽快地答应批下来:好,要多少给多少。康生,你去办。

陈平:感谢毛主席。

接下来,毛主席把接见我们代表团的谈话带入了他的主题。

毛主席:马共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调了两个师进来北京。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我没有办法,只好依靠群众。你们帮我们一手啊!

后边都是在讲他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给马共的广播电台设在湖南的一个深山里。中国提供全部设备及日常开支,马共的人负责编写文章和播音。慧敏就是那个时候从部队到了广播电台的,还在那里找到了终身伴侣:对方也曾是育英的马共孩子,后来上了人大附中,初三没毕业,就被马共派到越南,接受越共的军事训练(越共当时在为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培养军事人才),之后到了广播电台。慧敏妹妹也去了那里。

一段时间,这个电台对马来西亚武装革命起

到了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需要与街坊邻居相安无事

中国发生政治巨变起源于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逝世。他们带走了那个对抗的时代。

终于跳出“左祸”的包围,邓小平独自面对自己对中国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是极其现实的。他要中国不能再“左”下去,不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自己想给谁就给谁,他要带领中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因而,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他同时考虑的是,不想让周边国家都反对中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的环境,需要与街坊邻居的相安无事。当然为此街坊邻居也会以“相安”做交易,给中国施加压力。

陈平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记载:

1979年,我从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口中得知,中国已正式要求泰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调低对当时泰国政府的批评,具体说就是要求泰共电台别再发表言论贬低当时的泰国总理。泰共不肯这么做,还选择关闭了电台。我聆听这些事实,但不妄加评论。(中国给泰共的广播电台建在昆明。)

……1980年之前,我们的电台广播从未间断。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见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广播电台。早几个月前,北京领导人为李光耀到访营造非常友好的气氛。在中国首都普遍感受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十分成功。

我认为邓小平对我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共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都没想要见我。此时约见一定是要与我讨论非常敏感的事情。

我在当天早晨步入邓小平的办公室。……一番寒暄过后,他语锋一转,说道:我把您请到这里来,是想和您谈谈你们电台的事。我们要您把它给关掉。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我谨慎聆听邓小平叙述他与李光耀会谈的过程。我不高兴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认争论毫无意义。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这么对邓小平说:“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身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邓小平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这次会面商定电台关闭的时间是1981年6月底。

实际上,邓小平已于1978年就访问了吉隆坡;已经鼓励马共寻求和平方案。进入1982年,中联部向陈平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武装斗争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并从此开始有计划的递减。

### 《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1980年代东欧联盟正在解体,冷战即将结束,世界趋于和缓,对立走向沟通。

《合艾和平协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达成的。

马共在与政府的武装对抗中,根据地已经迁到了泰、马边境的泰国一方(北马到泰南)。泰、马政府曾组成联合部队围剿马共人民军。但马共人民军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一向表示尊重泰国政府及泰王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并没有像马政府与马共人民军之间来得那样深仇大恨。

在80年代中期,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互相发出过愿意和谈的信号,并有了接触。两三年后在泰军方的促成下,马政府也开始进入接触,是为三方会谈初始。

之后,经过五轮艰苦的三方高级会谈,一系列细节问题达成协议。1989年——柏林墙倒塌

那年,“六四”那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解体那年——12月2日,在泰国南部的合艾市,该协议签署。

说来真令人感慨。马共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还和华玲谈判时一样,而且远比华玲谈判时的细节令人满意得多。真的是时代不同了。被冠之以“多元”的政治时代到来了。

《合艾协议》在讲到停止武装斗争时,是这样用词的:

本协议将有效地和光荣地停止马共在泰国境内的武装活动;

这项光荣的和解将为泰马边境地区和马来西亚带来繁荣、稳定和安全;

宣布马共停止在泰国境内的武装活动是一项理性的行为,不在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声明中使用诸如“投降”或“妥协”之类毁誉性的字眼;

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装部队的马来西亚公民成员,可以自由参加政治活动,包括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组织政党(当然还是不能叫“共产党”)……

对马共的要求主要在销毁武器、提供准确的人员名单(用以为其办理合法证件及得到各项安置待遇)等等。

和解,说的是公平合理地解决争端,没有任何一方存有所谓“失败”或“投降”之意。这是《合艾协议》的实质所在。马来亚人民军是自行解散的,其武器是在泰、马双方官员的见证下(注意:不是监督下!)自行销毁的。这是马共向国际社会表达本身和解诚意的一项积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对马共来说,是多么有尊严的放下武器!

泰国给愿意留在马共根据地泰南勿洞乡的前人民军成员之安置待遇非同小可:

为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建立4个新村,都叫和平村。并给他们下列支援:

每户拨给土地15莱(每莱为1600平方米),作为耕种之用(后来大多数家庭是种植橡胶树,割胶,这两年卖胶的价格非常好);

每户拨给四分之一莱(即40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房舍面积;

每村拨予相当于全村面积的10%的土地作为公共用地;

每户拨予建筑材料2.6万铢(当时大约25

铢等于1美元)；

每村拨予建筑材料用于建造：一所宗教礼拜场所，一间会议室，一个医疗中心；每人每日22铢的生活补助，为期3年……

乐意接受并向那些不愿意回马来西亚或前往第三国家的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施加援助，允许他们在这4个村庄里定居，并享有与众人一样的权利等等。

我在看到这些文字前，就已经知道，慧敏爸爸和慧敏的两个弟弟，以及绝大多数前人民军成员，就是在勿洞和

平村这样生活的，生活得欣欣向荣。我真不敢想象，政府不怕这些共产党聚在一起再闹事吗？他们怎么敢让这些人在一起？还不得一人塞一个地方，让你们谁也找不着谁！可是人家说，有共同经历的人才会有共同语言，才会觉得生活有意思。

这纯粹是由前马共成员建起的和平村，现在已经成了“仙境般的”旅游胜地，景点包括挂有马、恩、列、斯、毛画像的当年的党校课堂，当年的军事指挥部，等等。泰王后去过，诗琳通公主去过，朱拉蓬公主更是去过。她们都去看望那些前共产党人民军，谈他们的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等，对这些新泰国公民充满了关爱。和平村以前是由军方管理的，自朱拉蓬公主去过后，就改为由政府管理，也就是在朱拉蓬公主的名下管理，为此把这4个和平村命名为朱拉蓬公主村。朱拉蓬公主多次拨出款项帮助村里建设。

还有让我瞠目结舌的呢！合艾的纪念活动结束后，我和慧敏姐妹到曼谷（慧敏的姐姐现在在马来西亚生活，她的妹妹则在曼谷）与小萍、小玲相聚，还有其他在曼谷的育英学校学友，当然大多是泰共的孩子。他们现在的工作，多与他们良好的中文、泰文有关。他们大家AA制请我们育英同学吃正儿八摆泰国大餐，我们同去的育英同学有好几个是像我这样的——和马共、泰共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因为是育英，仅仅因为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听小萍小玲讲起，她们又要进山到泰共当年打游击的根据地去了，每年一次纪念活动，连做



左起：作者、慧敏父亲、慧敏。作者手里拿的书是慧敏父亲写的回忆录

旅游，十分尽兴。我很好奇：没有人干涉你们吗？

“怎么会呢？我们还会请地方官员或当地驻军一起参加呢！又唱又跳！”

“政府还出钱，让我们在森林边的地方把当年我们游击队的营房、靶场、食堂等等复制出来，让游客看当年游击战争的场景，因为之前我们的营地都在深山里，不方便旅游。”

真不可思议！

看来执政者的宽厚与包容心态，才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本要素。

那个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对于马共和他们的后代来说，当今时代生活的主题已经是互联网、环保、挣钱、教育，等等了。

只有我，还是在想着“政权”。我问慧敏：如果马来西亚共产党当初夺取了政权（上个时代的主题），那么今天有可能认同民众选举吗（这个时代的主题）？如果被选下来了，是否要专政？是否会说“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无数生命打下来的”？慧敏和我相互对望，突然我们都笑了。

我为此敬佩马来西亚共产党。它不以夺取政权作为衡量自己革命是否胜利的标准。它与《合艾和平协议》一起光荣地留在了历史中。

这样一个协议，相信也能够对发生在当今地球上的各种武装冲突，利益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个人文集  
家史传记！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

丛书范围

一、个人文集：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生平传记：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 3、学术著作：思想理论、学术专著；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二、家史传记：

- 1、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录音、摄像，遗作汇编。
- 2、家史传记：家族大事记、家族先贤传，家谱族谱、家史档案等。
- 3、传家宝盒：百年家族史、家族图片册，家史光盘、家族音像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出版附赠光盘，需录音摄像另行协商）。

基本价格

-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 基本价格：二百页出版50本两千元，三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设计、排版与加印彩色插页费用另行计算。
-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办理出版书号的我们编辑、设计制作样书后另行安排。

欢迎“代理组稿”

“个人出书、老人出书、家族出书”价格便宜、出版快速，深受各地离退休老干部、老教授与民间文化人的欢迎和支持，每月汇编个人文集、家史传记50余部。为方便地方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设立“地方组稿分站”，请有组稿资源与编辑经验者来函来电洽商合作。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时代文化出版机构：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 | www.grcsw.com |  
老人出书网 | www.lrcsw.com |  
家族出书网 | www.jzcsw.net |

长途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 《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

2010年2月26日上午，《炎黄春秋》杂志社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关心杂志社的老老朋友欢聚一堂，畅谈了新年的新想法，对进一步办好《炎黄春秋》杂志提出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建议。出席联谊会的有（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东 马立诚 马仲康 马国川 王才 王也扬 王克明  
 王宏志 王金凤 王俊义 王海光 王强华 冯健 刘玉  
 刘仰东 刘志琴 孙大午 朱良 江平 牟广平 纪希晨  
 何方 余焕椿 吴象 吴薇 宋以敏 张鸣 张天来  
 张秀平 张思之 张培森 张惠卿 李乔 李杨 李普  
 李锐 李宝光 李昌平 李树桥 李耐因 李胜平 李维民  
 杜光 杨杰 杨天石 苏双碧 谷秀敏 辛子陵 邵燕祥  
 陈国华 陈震峰 周良宵 季音 林蕴晖 金雁 姚力文  
 姚监复 施亮 赵淮青 赵德润 钟沛璋 展江 袁鹰  
 资中筠 郭道晖 钱行 顾菊英 顾骧 高放 崔卫平  
 曹思源 章立凡 彭迪 曾彦修 舒元璋 蒋彦永 谢恒  
 韩钢 鲁諄 新望 蒲志强 雷颐 燕凌 薄会川  
 薛德震 戴煌 魏久明 魏群

韩钢、王海光、李锐、丁东、何方、资中筠、江平、杜光、李昌平、章立凡、冯健、李维民、孙大午、张思之、杜导正等同志先后在会上发了言。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聚会。



韩钢



王海光



李锐



丁东



何方



资中筠



江平



杜光



李昌平



章立凡



冯健



李维民



孙大午



张思之



杜导正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0年第**4**期

**朱良：从三个联合公报看美台军售**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高沟事件” 始末**

**网络问政三人谈**

**羁居越南的三万国民党军**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